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出版

◎ 第九期 ◎



圖下：「王世杰日記」手稿本中有關談判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之記載（詳見本期通訊陶英惠教授之文）

三十一年八月
趙英游行日記

八
月
九
日

卷之三
一
卷之三
一
卷之三
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九期・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

學術會議	「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研討會.....	林美莉・陸啟超・李君山 3
	「中共革命的新透視」研討會.....	12
學術演講	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質.....	溝口雄三 17
	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現況和教科書訴訟判決問題.....	姬田光義 22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一覽.....	174
學人簡介	戴玄之.....	林能士 29
	Hommage à Wolfgang Bauer.....	Ursula Ritcher 34
研究概況	Papers on China.....	林滿紅 46
	The Case Against Reform: Some "Conservative" Reactions to Feng Kuei-feng's <i>Chiao-pin-lu k'ang-i</i>	Philip A. Kuhn 57
	關於戰前十年舉借外債的基本估計.....	鄭會欣 59
	最近美國的民國史研究：國民黨治下的中國.....	William C. Kirby 著 賴惠敏・張力譯 74
史料介紹	山東文史資料的內容分析.....	張玉法 81
	「王世杰日記」.....	陶英惠 9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六）.....	楊同慧 105
	「謝彬先生遺著」簡介.....	賴惠敏 110
	政大社資中心有關中國近現代史資料介紹（二）.....	陳方中 113
	章太炎先生研究論著索引初編（二）.....	章念馳 123
	四川保路運動中極其重要的史料——《西顧報》.....	戴執禮 152
新書評介	資中筠：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	張淑雅 158

Denis Fred Simon, <i>Science and Technology</i>	
in Post-Mao China.....	王 萍 163
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	黃自進 167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	
論文目錄 (1988-1990).....	173

大事記要 一九八八年七月至一九九〇年三月近代中國史	
研究大事記要.....	李宇平輯 175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	李宇平輯 183
------------------	----------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任主委員	張玉法
編輯委員	張玉法 王 萍 林明德 蘇雲峯 陳存恭
	陳永發 楊翠華
執行編輯	陳存恭
助理編輯	賴惠敏 張 力 李宇平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半年刊 第九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 168 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 250 元 美金 9.5 元



學術會議

「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有關明清與現代史論文介紹——

林美莉・陸啓超・李君山*

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研究所及藝術史研究所主辦之「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已於1989年8月1日至3日在臺灣大學視聽教育館舉行。會中發表論文83篇，其中檢討明清至近現代歷史的研究現況者達20篇之多；由於討論場次分散，現將諸文暫分為一般史、專題史及社經史三組分述：

- (+) 1. 山根幸夫，「八十年來日本的明史研究」
- 2. 林麗月，「從政治史到社會史——論四十年來臺灣地區有關明代政治制度的歷史研究」
- 3. 趙令揚，「近四十年來中國大陸之明史研究」
- 4. 黃培，「清朝初期史研究的回顧」
- 5. Giovanni Stary, "The Study of Manchu-Ch'ing History in Italy Since 1921."
- 6. 辛勝夏，「民國以來中國史研究在韓國」
- (-) 1. 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的回顧」
- 2. 汪榮祖，「戊戌變法九十年：1898-1989——研究成果的檢討」
- 3. 林毓生，「史華慈先生思想史學的意義」
- 4. 莊吉發，「民國以來中國秘密社會史的研究評估與展望」
- 5. 劉鳳翰，「抗日戰史的編纂與研究」
- 6.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的幾個層面」

* 均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 7.查時傑，「民國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
- 8.朱浤源，「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假定」
- (二) 1.陳慈玉，「六十年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一般經濟史為主」
- 2.王業鍵，「戰後研究明清時代人口與耕地之檢討」
- 3.陳秋坤，「明清土地所有權結構和租佃契作行為研究的若干問題」
- 4.賴惠敏，「明代賦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顧」
- 5.岸本美緒，「清代物價史研究の現状」
- 6.吳金成，「再論明清時代的紳士層研究」

以下即按此次序依次介紹。

山根幸夫一文回顧日本「東洋史」的研究，認為最早可追溯至日俄戰爭後日本取得旅大和南滿鐵道租借權的時代。當時滿鐵社長後藤新平根據他在臺灣總督府擔任民政長官職務的經驗，成立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並以東京大學的白鳥庫吉主持其事，在白鳥指導下從事調查研究者如箭內亘、松井等、稻葉岩吉、池田宏、和田清等人，日後都成為日本研究中國史的中心人物。在1910年至1920年期間，和田清研究明代滿蒙史，其成就不作第二人想；清水泰次則專心於明代政治及社會史研究。此外，內藤湖南的兩大弟子宮崎市定和田村實造也有貢獻，宮崎的成就是在政治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而田村在滿蒙史方面。

1930年以後，日本學者的注意力逐漸轉移至經濟史和社會史。譬如，中山八郎之於鹽法、織造，百瀨於白銀流通，星斌夫之於明代漕運，藤井宏之於明清鹽法，酒井忠夫之於秘密結社、民間宗教、善書，均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由1940年至1965年，日本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不但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而且在關懷方面擴及政治、思想等層面。這段期間內成名的學者很多，如小畑龍雄對鄉村地方統治型態，島田虔次對王學左派，西島定生對松江府棉紡織業發展，谷光隆一對明清馬政、科舉和河工，間野潛龍對佛教、道教及監察制度，岩見宏、山根幸夫、栗林宣夫對徭役制度，田中正俊、佐伯有一對絲織業、寺田隆信對山西商人商業資本，野口鐵郎對白蓮教，太久保英子對泰州學派及書院制度的研究等，都有相當成就。

1965年以後，著名學者如森正夫對明代江南官田及土地制度，濱島敦俊及川勝守對均田均役及水利問題的研究，均仍在前期發展範疇中；這是新的發展。但谷口規矩雄、西村元照、佐藤文俊等著名學者已注意到此外，鶴見

尚弘研究里甲制、魚鱗圖冊及黃冊，奧崎裕司研究寶卷、善書、紳士層的思想，以及袁凡宗族發展，均必須特別一提。至於新生代學者，則在以上諸範疇之中續求發展之外，更另闢蹊徑，如軍制史、官制史、政治思想史、都市史等等，並有結合中國哲學、文學作多樣研究的趨勢。

林麗月評介民國三十八年以後臺灣學者有關明代制度的論文，認為大體可分中央政制、地方政制、選舉制度三類。中央政制方面，歷年來最受注意者殆為朱元璋的廢相及內閣制度的形成，研究者以吳緝華成就最大，其他大多缺乏創意。地方政制方面，作者特別指出，四十年來在研究上最感不足的還是在於里甲和老人制。選舉制度方面則根本乏善可陳談到問題與展望，作者指出，研究者往往對制度名詞極為熟悉，而於其功能與內容則一知半解。今後制度史的發展應該注重「權力」的分析與解釋、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借重、組織與實際權力運作的釐清等等。同時應留意地方和鄉村政治史，把政治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將之置於整個「社會之歷史」的背景下來考察。

趙令揚之文將中共的明史研究分成三個階段。1949 年到 1966 年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萌芽」、「農民起義」、「中西往來」等問題上，但對文化思想的探討則近乎白卷，只是贊揚王夫之的唯物史觀及批判王陽明的唯心哲學而已。從 1966 年到 1976 年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儒法鬭爭」的歷史觀當道，學者繼續批判王陽明，並歌頌李贄的叛逆精神和張居正的以法治國。自 1976 年迄今，尤其是 1979 年之後，研究多集中在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少數民族、邊疆問題、農民戰爭、對外關係和人物評價等方面。在結論中，趙令揚指出，40 年來大陸明史研究病在於「為政治服務」，論點往往令人難以信服；範圍上也太偏重明初與明末而忽視史學史、學術史及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儘管如此，作者仍稱許中共學者對於個別明史人物資料的整理和出版。展望未來，他認為如果能够擺脫意識型態、多閱讀外文材料，則倭寇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及耶穌會會士來華等問題仍將可能有所突破。

黃培檢討由努爾哈赤起兵到雍正末年（1583-1735）這一段清史的研究概況，認為 1912-1945 是奠基期，孟森、謝國楨和日本的東京、京都兩派各領風騷。研究集中於清代的先世與開國、初期的君主皇族和官員、清初制度、明末遺老、文字獄等方面。歐美則重視語文、史料、中西交通等方面。第二期（1946-65）是清初歷史研究的成長與轉型期。大陸方面的貢獻在於史料的整理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日本方面則是史料的注釋和工具書的編纂。另外歐美方面也有新的發展。舉凡政治、社經、宗教思想、民族主義都有人研

究，尤其雍正朝受到充分的注意，成為本期的特色。第三期（1966-85）則是成熟階段。臺灣和大陸有領先日、美的趨勢。不管是史料的刊布還是學術期刊的出版都有長足的發展。課題上則集中在滿族的興起、滿洲的社會組織、清初戰役、滿蒙和清韓關係、清初諸帝傳記、明末遺老和社會經濟等。最後黃培在結論中指出，吾人尚可在研究方法上求突破，並努力探知別國的研究現狀，同時不應再強調滿人的殘暴，這樣清初歷史的研究才能有更大的進步。

義大利因為是教廷所在地，擁眾多傳教士所遺留的記載，所以也有研究漢學的傳統。威尼斯大學 Giovanni Stary 教授一文所討論的，實際上只限於近十年來威尼斯大學滿洲史的研究成果。作者在文中提出幾個爭議頗多的名詞用以說明義大利漢學研究狀況。例如「滿洲」(manchu) 一詞，經作者研究，有「茁壯」(growth)、「偉大」、「強大」和「權力」的意思，和，《北史》中的「瞞咄」和高麗史料中的「滿住」有關連。

韓國方面中國史的研究起步較晚，直到1970年代以後才開始。辛勝夏一文指出當本世紀剛開始時，由於日本的殖民地統治，韓國的中國史研究無以發展。由韓國獨立到韓戰結束，全國陷於混亂，研究工作也無法進行。雖有高柄翊、全海宗等人組織了「歷史學會」，但所謂研究只是感想性的史論，談不上真正的史料研究。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韓國各大學開始設立研究所，同時有許多學人出國，研究風氣漸開。六十年代以後更形活潑，1965年「東洋史學會」成立，出版《東洋史學研究》。七十年代由於中共和美國的關係解凍，加上教育政策的改變和韓國本身經濟的發展，研究者與研究機構大增。到了八十年代各種研討會逐漸成立，尤其是「東洋史學會」所組織的幾個斷代史研討會最為出色。在研究成果上，1975年以前，是以中韓關係史與史料的整理為主。此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才逐漸增加。但論文的水準、方法論、研究範圍過於集中、關心範圍過於狹窄，這些都是問題。而展望未來應當朝向擴大東洋史的範圍、增加研究人員的人數與改善研究水準等方面發展。

胡平生則檢討清末以來有關陝、甘、寧、青、新、綏六省的史地名著，全文共分三節。「晚清」一節分別就清儒的研究成果、西北方志的纂修與外人對西北的考察著述三方面列舉重要著作，介紹徐松、張穆、何秋濤、潘若伐斯基、斯坦因、李希霍芬、斯文赫定與橘瑞超的作品、並分省詳列各地方志。第二節民國時期，作者指出民國二十到三十四年是近年代西北史研究的鼎盛時期，再分別就有關的通論性著作、分省之論著、民國續修之方志、期

刊雜誌、西北之報紙等五項列出各自的特點與內容。第三節則分就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大陸及臺灣兩方面的著作加以介紹。大陸因有大量的材料，加上西北為邊防所寄，同時又有民族、宗教、經濟等問題的存在，故四十年來西北研究極受重視，但嚴謹之著作並不多見。臺灣學界在這方面則不够熱衷，因為區域史的研究，往往是以鄉土情感為動機，加上其本身不如政治、社會史吸引人，材料又缺乏，乃使人望而生畏。其實臺灣目前所擁有的珍貴資料已經不少，如果再加上大陸所出版的著作和資料，則近代西北史的研究仍然大有可為。

汪榮祖在〈戊戌變法九十年，1898—1989：研究成果的檢討〉一文，首先指出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在學術上的研究，就量而言，遠遜於其他重大史事。作者又認為由原手史料，尤其是大量的檔案著手，是研究戊戌變法真象的重要方法；作者並以大陸學者孔祥吉的新作《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黃彰健先生所書《戊戌變法史研究》，以及由哈佛大學出版的鄭兆江博士論文《百日維新萬花筒：人物、政治、與思想》三書相比較，進而論證新出檔案在歷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

其次談變法的背景，作者認為戊戌變法不僅是一政治運動，也是一思想運動。也指出變法思想與經世思想不同，與自強運動的洋務派亦不同，變法是除了西方技器外，更要吸收西方政教，改變祖宗家法。大陸學者對戊戌變法的研究，以文革為分水嶺，後有不同觀點。在研究成果上，對重要報刊及學會均尚無專門性的研究，從社會史與思想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戊戌變法前各個報刊與學會的組織、活動和影響，更有待來者。

作者對康有為及光緒皇帝在變法中的積極性均持肯定之態度。認為對政變真象的發掘有助於對變法運動的了解，而真象發掘則有賴於檔案資料的開放。在變法失敗的原因方面，作者對「命定論」持否定的看法，認為戊戌變法失敗有其他原因。在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上，作者認為不能僅從變法運動本身觀察，必須更從整個近代中國史的發展來角度觀察。大陸自文革結束以後，雖然出現不少前所未知的史料，但新資料尚須觀點配合。如何從中國（甚至世界）近代史的宏觀視野來定戊戌變法的位置，如何從戊戌時代各方面的微觀角度，來深入發掘時代精神與趨向，應是正確的研究途徑。

〈抗日戰史的編纂與研究〉一文為劉鳳翰所作，作者首先說明廣義的抗日戰史應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開始，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本無條件投降止。而在抗日戰史的研究上以日本為最早；臺灣方面，國防部史政

局及黨史會資料在近十年才陸續開放，中國大陸史料的公開則較臺灣還要晚兩、三年，因此這兩個地區在編研方面，都是起步階段。

本文隨即針對《抗日戰史》、《空軍抗日戰史》、《海軍抗戰事蹟》、《抗日禦侮》等四部書之編寫及內容做一簡介。此外並就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所藏資料之出版情形予以介紹。作者對日本和中共方面的研究均有介紹，惟對日本出版之《戰史叢書》在原始檔案、資料引證、內容充實各方面予相當高的評價。在本文結論中，作者指出軍方史政單位無專業人才之培養，故出版品水平多不高。而民間出版品多以回憶錄為主，時有誇大之嫌；其他則是通俗性作品，毫無學術價值。最後作者指出，如果抗日戰史的空間領域甚大，加以中、日史料的配合研究，則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當可有突破性的看法。

李雲漢先生之〈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的幾個層面〉一文，對國民黨黨史的研究做了一番清楚的回顧。認為研究中國國民黨黨史要對以下三個問題有正確的觀念：(一)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地位；(二)黨史與國史的分際；(三)史料、史述與史論。關於研究狀況方面，作者分中國人的研究和外國人的研究兩個部分來討論。前者就學術價值較高的黨史專著，依類別性質介紹，所有專書、論文集，甚至重要的博、碩士論文均在包括之列。外國人研究中國現代史較中國人早，對中國國民黨的研究比例亦頗高；作者就美洲、歐洲、亞澳三區之研究情形，分別予以簡介。此外，針對異議人士的挑戰，作者對(一)黨統的連續性問題；(二)辛亥革命的主流和本質問題；(三)國共關係問題；(四)反叛人物的地位問題等具爭議性的四個問題作一討論。

最後，作者指出中國國民黨黨史的研究，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環節，而國內對此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困難較多。不過，國民黨黨史研究為一亟待開發的新園地，國內從事此方面研究，方便之處亦多，研究者不應踟躕不前。

查時傑先生之〈民國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一文，首先對中國基督教史分作廣、狹義的界說。如果就基督教一詞採廣義所說，則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應上溯至唐代的景教；如果採狹義界說，則研究上限只需溯及十九世紀初年。本文採廣義說，然後根據研究上的需要，將工具書、書目、索引、期刊資料、手冊、年鑑、報告書及縮影資料一一介紹。

民國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在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易色以後，並未形成中心，乃呈多元化發展。因政治之因素，海外地區的研究較大陸為好。然而大陸出版的工具書與史料非常之多，如果能廣加蒐集，並善加運用，則中

國基督教會史當有更豐富、更輝煌的研究成果。

林毓生在〈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先生思想史學的意義〉一文，首先指出，史華慈先生「以世界史的眼光，對中國古代思想，〔作〕全景的複雜的多樣的透視」，繼而指出，史華慈先生對思想史的見解有兩個基本核心，簡單的說，一是思想史學者要「盡可能獲得對他研究的對象的內在世界完整的了解。」史華慈教授認為，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掌握客觀的真實，可是並沒有任何一條道路可以確保研究成果的客觀性。不過由於思想資源與研究技能是為道德態度服務的。所以他強調「道德與理知的整合。」二是「他並不特別著力於建立一個對歷史事件的緊密的因果關係的解釋架構，他也不特別著力於說明他研究的對象對於後世的影響。」基於上述對史華慈的了解，林毓生先生認為史華慈「幾乎無可避免地要應用像巴士噶 (Pascal-like) 那樣不固定的、多元的、沉思的途徑來治思想史。」而「他之所以使用巴斯噶式的探討模式，主要是因為這個模式提供了有效的資源，這項資源順暢地為他的道德態度提供了服務。」

林毓生先生亦指出「史華慈教授的成就蘊涵著一些內在的限制。事實上，他的成就與限制乃一事之兩面。」作者以史氏之《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為例，指出本書就是「以作為思想史研究另一途徑的，韋伯的『理念型（或理想型）分析 (ideal-typical analysis)』做為分析架構，來提出一些特定的問題。」儘管林氏對史華慈之《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提出若干批評，但認為此書「的重要貢獻在於對中國古代思想內容的廣大領域提出的豐而複雜的分析。它是一部將繼續刺激吾人對其反應的大著。」

朱泓源先生之〈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假定〉一文，以「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這樣一個題目為基準，取與此題完全相同之兩本著作予以介紹（作者一為大陸學者邵德門，一為大陸學者桑咸元與林翹翹），並加以討論。其次，分別評介日本學者、歐美學者、國民黨轄區學者（包括1949年以前之大陸及之後的臺灣）、以及大陸其他學者的研究。

在結論中，作者指出數十年來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從基本假設看來，可以大致分為兩派：一為正統「馬克斯——列寧——毛澤東主義的共黨派」，一為正統「孫中山——蔣中正主義的國民黨派」。前者可稱之為集體論的社會主義派，後者也可稱之為集體論的自由主義派。但在1980年以後，雙方都有顯著的改變。

陳慈玉一文介紹16位日本史家所寫通論性質的明清民國經濟史著，並以

1949年為界，分述前後兩期著作的不同意識型態，前期作者如內藤湖南、羽仁五郎、森谷克己、小竹文夫、平瀬巳之吉等人均為「中國社會停滯論」者，研究缺乏史實分析；後期作者由於面對中國共產政權成立的巨變，要重新尋找中國打倒日本的原動力，其中重要者如加藤繁、村松祐次、山名正孝、橫山英、北村敬直、田中正俊、重田德、百瀨弘、Linda Grove、Christian Danielgs、濱下武志，都認為中國社會雖有其結構上的特質，但有亦發展，絕非停滯。

人口與耕地，是尚未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基礎，王業鍵一文綜述1959年至1988年中外學者如何炳棣、Dwight H. Perkins、梁方仲、王其策、張德信、林金樹、G. William Skinner、趙岡等人對明清時代人口與耕地總數的相關研究，並且據其本人近年研究成果提出修正。作者認為明末至現代中國的人地比例是緩慢下降而非急遽惡化，其提出的新估計如下：

年別	耕地面積（百萬畝）	人口（百萬人）	每人平址耕地面積（畝）	趙岡估計之每人平址耕地
1400	600	80~100	6.0~7.5	8.7
1600	1,000+	200	5.0	4.0
1930	1,800	500	3.6	2.3

文末作者強調，關於人口與耕地總數的計算，迄今未有共識或定論，但由於這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基礎，實有加以深入研究的必要。

陳秋坤一文討論明清時期土地所有權結構、租佃關係本質、政府收取租稅各項問題。其重要論點歸納於下：(1)儘管地權分配不均，但由於「一田二主」制度等分裂地權的作用，大地主的地產有逐漸分解為中小地主農戶所共有的趨勢。(2)地主和佃農之間，有極複雜的權利的義務關係，這種關係受時間、土地、水利資源供給、人口成長及區域性農業結構變化等因素影響，因此「剝削」一詞實不能完全形容租佃制度的本質。同一套租佃制度在不同環境可以帶來迥異反應，無論是「負債論」或是「繁榮論」都各有所見，也各有所失。(3)國家一方面保障地主的地權，一方面將地主納入賦稅體制，以便約束地主的權力。傳統王朝對農業墾殖以及農村生活其實無法完全控制，反而必須依賴租佃制度來提供稅收以及維持農村聚落秩序。由於依賴這種土地租佃制度，王朝政府也面臨了一些無法克服的困難，譬如土地大量隱藏，而人民分類聚居常有土客相爭；前者侵蝕王朝的稅源基礎，而後者則對地方秩

序造成破壞。

賴惠敏一文歸納學者對明代賦役制度研究的四大要目：賦役制度的演變過程、賦役改革前後的鄉村社會面貌、商品經濟發展與賦役改革的關係、賦役改革中國家角色的評估。第一項包括明代田土統計、明中葉土地丈量及一條鞭法改革等等，而以一條鞭法為研究重心。大部分學者認為一條鞭法貫徹田畝清丈、簡化課徵程序，並且適應貨幣發展的需求，用銀納稅，其結果是除了賦稅公平之外，增加國家稅收，並形成近現代中國田賦的主要結構。第二項說明明初實行里甲制，在地方上導致新的社會領導階層出現，鄉村社會同時也成為具有經濟和法律作用的共同體；到一條鞭法推行里甲制崩潰，鄉村社會轉為鄉紳控制的局面。第三項討論商品經濟發展與貨幣流通如何影響一條鞭法改革的情形；第四項則為說明，一條鞭法原本來就是各州縣因地制宜的結果，後來才變為中央政府的法令通行全國，朝廷在此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並不突顯，反而其各種政治弊端以及軍需加派後來嚴重破壞了此稅制的改革。

岸本美緒一文首先討論各種物價史資料的運用情況，這些資料包括官方報告、私人隨筆、商店帳簿、宗族會計簿、地方貿易統計報告及報紙等等；其次討論物價在明清時期的長期趨勢問題，並且對各項物價的變動的研究（如米價、棉價、生絲價、田價及工資各項）均做了回歸分析；再次則探討物價的地區性差異與短期波動情形、物價與經濟結構變化的關係、貨幣流量對市場景氣調節機能及市場構造變化等課題。最後，作者指出，物價史的研究基本反映兩種不同的經濟發展理論，此即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內發論和外因論」，前者認為明清時代中國有自生的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傾向，故其研究關注於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部結構問題，後者側重於明清中國的商品經濟及其如何與當時的外在條件配合的問題。

吳金成一文把紳士定義為「由科舉、捐納及學校等各媒介出現並在政治及社會上的支配階層」，包括「官職經歷者」（即紳）及「未入仕的持學位者」（即士）。作者強調藉由「同類意識」的凝聚，明清紳士由出現而擴展，再終至階層固定。在此過程中，朝廷以紳士為維持鄉村社會秩序的輔助手段，而紳士則出於士大夫的公家意識而對國家權力發揮輔助作用。紳士階層的輔助作用反過來又使得他們更加深和官府的關係，以擴大自己的支配力，維持鄉村社會秩序，並進而保護私人利益，甚至於把他們追求私利的行動合理化。

「中共革命的新透視」研討會

由荷蘭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 (Interna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主辦的中共革命的新透視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討論會，於1990年元月八至十二日在阿姆斯特丹和萊登兩地舉行。與會人士包括美蘇、歐亞各地學者，他們利用中共最近出版的史料，討論中共革命的幾個重要問題，如共黨國際對中國的影響、延安時期的中共、共產黨與抗日戰爭，及中共內部鬭爭等。現將原定議程依次列下：(案實際開會時，曾有更改)

一、議 程

1月8日上午 開幕式

第一次會議 主席 Jan Bremen

1. Lawrence Sulliva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Doctrine, 1921-1949."
2. Frederick Teiwes, "The Formation of the Maoist Leadership: From the Return of Wang Ming to the Seventh Party Congress."

評論人：Tony Saich, David Apter

第二次會議 主席 Kathleen Hartford

1. Hans van de ven, "The Distribution of Authority in the CCP and Chen Duxiu's Leadership until the Third Congress (June 1923)."
2. Christina Gilmartin, "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 Yves Chevrier, "The Emergence of the Peasant Question in CCP Ideology."

評論人：Lawrence Sullivan, Timothy Cheek, Leo Douw

1月9日

第三次會議 主席 Christina Gilmartin

1. Kathleen Harford. "Fits and Starts: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Hebei, 1921-1936."

2. Gregor Benton, "The Three Year Wa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3. K. W. Radtke. "No Time For Revolution: Canton Provin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評論人：Lucien Bianco, Chen Yung-fa, Yang Bingzhang

第四次會議 主席 Tony Saich

1. Lucien Bianco, "Peasant Responses to CCP Mobiliza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2. Leo Douw, "The Rural Economy Study Association (1933-1951) and its Historiography."

評論人：Fritjof Tichelman

第五次會議 主席 Tony Saich

1.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Party History o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Political Train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PRC."

評論人：Gregor Benton

第六次會議 主席 Fritjof Tichelman

1. Steven C. Averill,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2. Lyman P. Van Slyke, "Peng Dehuai and the Battle of the Hundred Regiments: Problems of Command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3. Ben Yang, "In and out: Changes in the Military Line after the Zunyi Conference."

評論人：Frederick Teiwes, Kathleen Hartford, Kurt Radtke

1月10日 自由參觀活動

1月11日

第七次會議 主席 Hans van de Ven

1. David E. Apter, "Discourse as Power: Yan'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 Chen Yung-fa,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the Ye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

3. Timothy Cheek, “The Honorable Vocation: Intellectual Service in CCP Propaganda Institution in North China, 1937-49.”

評論人：Enrica Collotti-Pischel, Lyman van Slyke, Steven Averill
第八次會議 主席 Roderick MacFarquhar

1. Tony Saich, “Interpreting China: The Case of Maring.”
2. Dr. Shevelyof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3. Manoranjan Mohanty,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Indian Communist Movement.”
4. A. M. Grigoriev, V. I. Gluni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oviet Studies: Some New Trends.”

自由討論：Lucien Bianco, Roderick MacFarquhar, Tony Saich
閉幕

二、部分論文摘要

Lawrence Sullivan 利用中共 1921-1949 年的行政組織，來研究共黨如何從委員制式的集體領導轉變成毛澤東一人專政。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中央及地方的領導階層結構採委員制，但經歷五卅慘案及清黨活動，共黨擴大編制，也提高陳獨秀個人權威，所以1927年以後中共中央有權力集中的趨勢，地方則仍是集體領導。1929年李立三欲獨攬軍事指揮權，遭到留俄學生反擊，他們相信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才是新的統治方式。至於在鄉村蘇維埃方面握有實權的毛澤東，基本上是反對委員制的。遵义會議後，毛澤東的聲望提高，他帶領了地方黨員反對中央委員會，至1943年這種由下而上的權力鬭爭，終於讓毛澤東贏得黨主席頭銜。作者分析毛澤東成功背景，強調 1930-1940 年間大量貧困農民的加入共黨組織，並認為毛澤東英雄式的領導風格，符合中國父權社會的傳統。

Hans van de Ven 所探討的問題是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前，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基本上，他認為陳獨秀雖是共黨初期領導人，但影響力限於上海一地。其它如廣東、湖南、四川、北京等地的共黨組織，各有其單獨領導的工人運動，為強大的地方勢力，非中共中央所能隨便指揮。面對此一局

面，陳獨秀雖有意集權中央，實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但無法落實。一直到中共第三次大會後，中共的整合工作才順利起步。作者強調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的強大，與俄國十月革命時的情形大不相同。

Christina Gilmarin 研究中共成立初期的婦女角色。最初加入共黨的女子，大都家世背景良好、受過高等教育。從地域上看來，籍貫為湖南省的最多，其次是江浙地區。這些婦女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擁抱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思想，她們希望加入共黨後，獲得解放且享有投票權。作者進而檢討一些共黨組織中高階層女性的實質地位，發現她們依然是次要角色，或許在非正式的權力結構上顯得地位崇高，然而一旦失去丈夫的庇護，其地位立刻動搖。

Leo Douw 利用1980年代編撰的農村經濟史論文集，來討論1933至1951年成立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該會由陳翰笙、馮和法等人組織而成。本文除對陳翰笙個人生平詳加介紹之外，更重要的是說明該研究會的宗旨。國民政府時代，中國農村問題備受矚目，研究會成員分析此問題後，認為其癥結在於生產技術落後，及資金匱乏。其它像托洛斯基派和中產階級的學者亦有類似看法，主張中國引用外資來促進經濟繁榮。不過，關於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上，研究會成員反對托派所說中國是半封建社會，地主仰賴農奴耕種，收取地租，他們認為鄉村的生產力主要來自雇工。所以當時共產黨主張土地收歸國有，及建立蘇維埃政權，是與研究會的觀點相左。作者也有意澄清研究會受中共組織控制之說，認為該組織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其實都非常淡薄。

Lyman P. Van Slyke 以百團戰役說明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和彭德懷衝突的問題所在。作者首先介紹1940年前後共軍在華北的分佈形勢，八路軍人數號稱四十萬，其實也不過二十萬上下。活動地點約以山西、河北為限。八路軍的將領與當地的黨政領袖關係良好，但與延安方面卻因通訊設備過於簡陋，聯絡本已不多，加上又怕機密消息為敵方偵悉，故更少和中共中央聯絡。在百團戰役時，彭德懷結合中共地方黨政領袖對日作戰，這是當時地方分權情況下的自然表現，並不表示他有意奪權。

陳永發的論文是對過去學者所推崇的「延安模式」創造經濟奇蹟，提出質疑。他探討中共在 1941-1943 年間的經濟危機，認為大生產運動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只是一個解決辦法，鴉片生產和貿易則是另一個解決辦法，重要性決不稍遜。在從事鴉片生產和貿易過程中，中共能夠維持幹部的紀律，而且

能够堅持政略目標，這是它和其他政黨或軍閥不同之處。

Dr. Shevlyoff 討論共黨國際的幾次會議對中國的影響。首先，他肯定共黨國際推動中國社會革命的貢獻，如蘇聯輸出武器援助紅軍、派遣紅軍加入城市戰爭，及協助中共成立各種組織等。其次，作者分析共產國際會議決議如何影響中共發展，特別強調1920年代共產國際對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反帝國主義戰線的貢獻。不過，1927年國民黨清共，也導致共產國際部份成員對列寧輸出俄國革命經驗表示異議，中共因此也對共產國際的決策抱持懷疑態度，所以往後儘管共產國際仍有幾次決議，對中共發展卻沒有明顯影響。至1937年，共產國際終於瞭解到中國社會的複雜性，認為必須透過幾個步驟，方能在中國實現共產社會，而中國革命第一步是不得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故允許蘇維埃地區有商人、資本家從事貿易活動，並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合作。等抗日勝利後，中共又走回民主革命路線。總之，本文者基本上是肯定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發展所起的作用。

Manoranjan Mohanty 的論文，比較中共與印共運動的性質，認為兩者皆由共產國際策劃，且屬布爾什維克革命。但是印度共黨分立，內部各派鬭爭激烈。對於革命路線該走城市暴動，或農民起義並未取得一致看法。不過，在中共政權建立四十年後的今天，其革命方式已成為印共的借鏡。中共在延安時期，聯合地主和資本家的力量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印共亦思效法，認為從外資充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獨立，必須聯合中產階級和大地主勢力，共同來領導政權。

A. M. Grigoriev, V. I. Glunin 論述主題是1920-1930年間，共黨國際對中共發展策略的檢討。過去的研究都高估了中共與共產國際合作之重要性，如協助中共成立紅軍、提供武器，及訓練幹部等。本文從共產國際的幾次會議決議著手，指出決策者並沒認清中國當時的政治環境，所作出來錯誤決定反而妨礙中共發展，同時造成中共領導階層內部分裂。影響最深的一次是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加入國民黨，試圖將後者轉變成工農政權，發展出東方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變結果與預期南轅北轍，統一戰線的方針遭挫折。不過在共黨國際的第六、七次大會中，支持中共的農民革命，及決議國共合作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路線，對中共軍事發展貢獻頗鉅。

一九八八年七月至一九九〇年三月世界各地舉辦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之重要會議，請參見本期通訊「大事紀要」欄。



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質

溝口雄三*

本報告的目的，在於探討中國近代民權思想的特質，並主要結合傳統思想（儒教的政治思想）來討論。

其特質列舉如下：

- 一、反君權的民權思想
- 二、以地方分權為目的的民權思想
- 三、作為國民權的民權思想
- 四、作為生民權的民權思想

以下，就此四項進行探討。

一、反君權的民權思想

日本明治時代的民權運動，並非要推翻天皇制中央集權制下的國家體制，而是要求參與國家體制而引發的運動。具體地說，就是設立地方議會及國會，並且要求參加選舉的運動。其結果是成立以天皇為君主的國會，而這個以天皇作為絕對君主的帝國議會一旦設立，民權運動也就消聲匿跡了。

在中國的民權運動中，立憲派的本來目標是在皇帝專制下的中央集權體制範圍中設立議院，而孫文等革命派則以推翻清朝的皇帝專制本身而樹立共和政體為其目的。

日中兩國民權運動的相異之處，由以下兩段類似的言論對比可明顯地表現出來。其一是福澤諭吉（1834-1901）與陳天華（1875-1905）的比較；另一是中江兆民與鄭觀應（1842-1922）的比較。（一）福澤氏與陳氏，將政府與國民的關係比喻為公司的幹部與職員（或是股東）的關係，因而介紹了歐洲

*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科教授

的社會契約論。在此比喻中，福澤氏認為幹部與職員有意見不合時，職員要絕對服從幹部。他論述到：「即使國法不合理，也絕對不容許以此為藉口而違背它」（『勸學』七編）。另一方面，陳氏認為假如幹部有不對的地方，各股東有「糾正他們的權力」。他論述到：「如股東也聽他們胡為，是放棄了股東的責任，即失了做股東的資格。君與臣民的原由，即是如此。」（『獅子吼』第三回『民報』第七號所收）（二）中江氏與鄭氏，將天皇（皇帝）與民的關係比喻為舟與水之關係。作為日本激進派著名的民權思想家中江兆民，在其比喻中說：「天子至高無上，萬物與比。……與神同樣。」把天皇絕對神聖化。又說道：「不論內閣的更迭，抑或國會的爭論，皆宛如海裏的波濤，天子好比堅牢的鐵艦；不論波濤如何洶湧澎湃，鐵艦是堅固不破的。」（『平民的目標』第二章）另一方面，鄭觀應主張設立議院，他論道：「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伊古以來，盛衰治亂之機總此矣。」（『盛世危言』議院上）鄭氏此一比喻，亦見於『荀子』書中，並且在中國，自古以來屢為人所傳誦。

從以上二者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的民權思想中不存在對於天皇及國家政府的叛亂權。相比之下，中國的民權思想，是以傳統的易姓革命思想為基礎，包括對於皇帝（乃至國家、政府）的叛亂權；故此，在這點上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民權思想具有類似的特質。

二、以地方分權為目標的民權思想

日本在明治維新中，推翻了幕藩制封建領土體制，創立了天皇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對比之下，在中國，例如黃遵憲（1848-1905）認為：「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縣專政之弊，由一府一縣，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軌。」（『湘報類纂』所收）或是康有為：「夫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今者昇平，封建其眾人，聽民自治，聽眾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公民自治篇」『新民叢報』第五、六、七期）所說的那樣，在清末以反封建為名義，盛行以地方自治與共和為目標的運動。

汪精衛認為：「中央集權云者，全國之政治上之權力集一於中央政府，而地方行政機關御承其意旨，以為之隸役之謂也。地方分權云者，政治上之權力分配於地方，使地方團體自任其措施之責之謂也。」又說：「滿洲政府

所以謀中央集權者，以少數民族制駁多數民族所不得不然之結果也。」試圖通過漢民族來瓦解清朝的中央集權體制。

這樣，中國的地方自治與地方分權，一方面主張反滿族；一方面主張反專制，進而發展到辛亥革命時期的省獨立運動。

像這樣以反封建為名義而主張的地方自治的運動，早已見於明末清初顧炎武的『郡縣論』。經過清朝中葉主張設置鄉官等建議（鄂爾泰「議州縣不必設副官鄉官疏」『皇朝經世文篇』卷一八參照），纔發展到清末地方分權化的局面。

總言之，日本的民權運動是向強化天皇制統治下的中央集權體制的方向而發展；而中國的民權運動卻向摧毁皇帝專制下的中央集權體制方向而發展。然而，其後由於軍閥割據，列強瓜分等危機，國民黨與共產黨採取了加強中央集權體制的政策。所以，作為制度的地方自治——譬如地方首長的選舉、地方議會的充實等便受到了阻礙。

三、作為國民權的民權思想

自古以來，在中國，國家便是朝廷。就像顧炎武所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課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正始」『日知錄』卷一三）。民眾並非一國之民而是天下之民。

但在清末出現了亡國=亡種等見解。國家應屬於君主的抑或人民的議論非常盛行。「滿洲人之中國」對「中國人之中國」（張繼「讀“嚴韋留學生密諭”有憤」『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君主之中國」對「中國人之中國」（「公私篇」『同』第一卷下）；「朝廷之私國」對「國民之公國」（「新廣東」『同』第一卷上）；呈現出這種對立的構圖。這裏所說的「中國人」「國民」是對外主張自種族、自民族的主權；對內則主張人民對於君主專制的權利的主體。

其結果是天下之民這一見解，被當作「散沙之眾」而加以否定。民權作為國民權，而得以主張此國民權之特質，在於多數漢人對少數滿人；全體國民對一人君主；全體中國人的抵抗對白人的壓迫。也就是，較其個人更為注重多數、全體的權利。

「吾脩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箇人之自由者也。以箇體之自由解共和、毫釐而千里也。共和者亦為多數人計，而不得不限制少數人之自

由。……惟欲求總體之自由，故不能無對於箇人之干涉。……現政府之所為，無一不為個人專制強橫專制者。其干涉也，非以為總體之自由而但以為私人之自利」（陳天華「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民報》一號）

「要將來能够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

「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

「這一個大團體能够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孫文《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二講）

從以上二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謂「總體的自由」、「團體的自由」是謀求反專橫、反利己的自由。即一方面是人民形成集團，排除專橫者（國內是皇帝、豪強，國外是列強）抑壓下的「自由」。另一方面，是指為了鞏固集權，在內部克服每個人的「一盤散沙的自由」。

就是說，國民權的民權，其特質不是個人的人權，而是團體的民權；不是個人的私權而是全體的公權。

但在此與日本比較下，需留意到中國清末的國民意識，是在否定皇帝專制的方向上而形成的。日本明治時期的民權思想是在天皇制的範圍內釀造出來的。國民意識也收斂在天皇制下的帝國主義的國家主義之中。中國卻作為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而發展起來。日本的國家主義是侵略性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是反侵略性的。其差異是與兩國的「國民」意識的分歧不無關係。

換言之，對於日本來說，「國民」是隸屬於天皇的國民；而中國的「國民」則是以「打不平」的「公理」為基礎的平等的國民。

四、作為生民權的民權

在中國，民是天生之民。因而被說成是「民以食為天」，即民在本質上不歸屬朝廷，而是具有以食為生的生存自然權。但此自然權，明末的呂坤（1536-1618）認為「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不均之故耳」（《呻吟語》卷五）是基於「均」的原理的。

不歸屬朝廷=國家，以「均」原理的生存自然權為天與的生民觀，在清末，被無政府主義者繼承下來。而且這個「均」的思想，與劉師培（1884-1919）的「必盡破貴賤之級，沒豪富之田，以土地為國民所共有」（「悲佃篇」『民報』第一五號）所提出的地主否定論；或者是「所謂民權者，實富權也。……自由者，富者之自由也。平等者，富者之平等也。而貧民之困苦如故。自由平等，於貧民乎何有？」（「伸論民族、民權、社會三主義之異同」『新世紀』第六期）的民權否定論，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即在此成了少數與多數的對立，地主與佃民的對立觀念，從而將民權分化為富民權和貧民權。

毛澤東的革命是以貧民權為至上，徹底抑壓富民權的。故此，在地方自治運動中剛剛發展起來的紳民權被否定，議會制的民主主義也在富民權的罪名下被否定。

於是，只有貧民才是國家的代表。其結果，自古以來的生民便成為隸屬國家之民；生民本來作為天賦與的生存自然權也被國家所掌握了。總之，生民因成為國民，其本來具有天賦予之自由、無政府主義之自由、散沙的自由便全部被剝奪。而另一方面，富民與紳民連成為國民的權利也告喪失了。

但是，以上之事只是中國大陸的狀況，並非生民權本來具有的面貌。

生民權本來具有「均」的自然權，作為中國式的人權，是最值得注目的。

淵源於生民權的人權之特質，在於人具有生于天的權利：

「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雖有智愚強弱尊卑疎戚之等，其與我同類；而皆有欲立欲達之心，則一也。奚必智者強者尊且戚者乃得為人，而愚者弱者卑者疎者之概無足比數乎。」（邱秀瑞「卹臧穫議」『切問齋文鈔』卷九）

以上，是清初主張奴隸同樣是人的一段文章。這裏「人」的普遍本質，是在於「皆有欲立欲達之心」，即可以淵源到「均」在人的道德的本質中，作為人的權利也是以道德的調和性為根據的。

筆者希望作為反君權、地方分權、國民權三者而發展起來的中國民權，今後，以民權為媒介，發展成基於各人道德之本性上的人權。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現況 和教科書訴訟判決問題*

姬田光義

一、前言——關於報告題目的若干說明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現況和教科書訴訟判決問題」，首先要簡單地說明一下這個題目的內容。

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特別是注重江西蘇維埃時期的黨內權力鬥爭、紅軍的戰鬥和羣衆鬥爭等方面的問題，我也出版一本『獻身於中國革命——一個共產國際的德國人軍事顧問』的書，來介紹我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嘗試從一個日本人的觀點來研究中日戰爭史，尤其戰時日本軍對於中國和中國老百姓的殘暴行爲。這個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喚醒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感，並且讓日本人不要忘記這段侵略中國和亞洲的歷史和歷史教訓。在這方面，我也出版一本『證言·南京大屠殺』的書，此外，1987年我也曾經在紐約「『七七』五十周年紀念研討會」上做過一篇報告。在這個報告裏，我本人指出以下幾點：

第一點，1982年夏天以來，由於教科書檢定問題，日本受到了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各國的嚴厲批判。之後過了五年，教科書的檢定問題不但沒有什麼改善，而且愈來愈糟糕。這是由於日本國民對於中日戰爭的認識逐漸模糊。另一方面也由於日本國內各界的保守派包括政府、自民黨、財界、教育界等等各方勢力透過各種方式，刻意地把這個歷史事件淡薄化的緣故。他們當中，許多人主張「日本無罪論」、「日本自衛戰爭論」，或者是「戰爭責任『時效』論」等等，這樣的主張給日本民眾很大的影響。

* 本文為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姬田光義於民國79年1月20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的學術演講。

第二點，爲了反駁這樣的主張或者思想，我認爲應該建立對中日戰爭的巨視史觀。我本人所謂的「巨視史觀」意味着以下幾點：

1. 中日戰爭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特殊性資本主義政策下發展的結果。這樣的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建立在壓搾亞洲各國及各民族的利益之上的。

2. 但是這樣發展方式並不是日本唯一可選擇的道路。如果當時日本能理解到亞洲各地區的民族運動，那麼就應該會考慮其他的選擇。

3. 正因爲日本不能理解亞洲的民族運動，所以被以中國爲首的亞洲反日、抗日的民族運動以及反法西斯國際聯合戰線打敗。但是，大多數的日本人直到今天，仍然認爲日本的戰敗是由於美國造成，而不是由於亞洲各國及各民族共同抵抗的結果。日本人對於亞洲的輕蔑感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想法和感情之上。

4. 如果把中日戰爭的原因和結果，用「中日戰爭巨視史觀」來看的話，我們可以說，近百年來，由於日本不關心亞洲各國及不理解亞洲各民族與日本是一種生死與共休戚相關的關係，以致於長期以來有輕視亞洲的習慣。

1987年以來，我自己一直堅信上述的看法，但是非常遺憾的是這樣的史觀，並沒有成爲歷史學界或者思想界的主流，恰恰相反的却是日本各界輿論的保守化傾向愈來愈明顯。比如說去年（1989年）10月3日，東京地方高等法院的判決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點以下將會兩次提到）。

總而言之，以文部省（就是日本教育部）爲首的日本政府與退伍軍人等的組織匯合一起，共同否定日本過去的侵略事實，包括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三光作戰等等在內，這樣的態度和思想隨着日本當前的經濟發展有愈來愈明顯的趨向。

對此，我最近出版一本『另一個三光作戰』的書。這是針對當前日本朝野的保守趨向而出版的。很高興這本書在日本的學界及民間都有良好的反應。除了我的著作以外，去年也有兩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出版。所以圍繞着這個歷史事件，日本國內的爭論可能會再度激化。

接下來，我想對這個纏繞二十幾年的日本教科書訴訟做個檢討，並且，介紹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這兩本新書，最後，希望藉此機會，向在座的各位歷史研究專家報告，作爲一個現代中國史研究的日本學者，對中日戰爭所做的一些思考，期待能和在座各位女士先生互相討論，敬請多多批評指教。

二、關於教科書訴訟判決的若干檢討

首先，我要對1989年10月3日，日本東京地方高等法院所做的關於第三次教科書訴訟的第一審判決，略作說明。

原告家永三郎，是東京教育大學的名譽教授。他在1965年，以日本教育部所實行的教科書檢定制度違反了憲法及教育基本法，對國家和教育部提出了告訴。之後，經過二次訴訟，第三次是1984年1月所提出。關於這次訴訟，日本的教育評論家，德武敏夫做了以下的評論：

這一次的判決，是日本高等法院對日本教育部的教科書檢定制度所進行的第一審判決。從這判決中可看出，國家對教育的內容能有多少程度的干預，以及法院對日本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所抱持的態度和見解。因此，此判決深受日本國內外各界的關切。

判決的結果，引用原告家永三郎的話來說，就是原告方面「全面的敗北」。他並且說：「現在的教科書檢定制度是被一羣由教育部長所任命的教科書審議會委員，和少數的教科書檢查官所任意把持，極度缺乏公正性，這樣事前審查的檢定制度等於是認可戰前的檢閱制度，違反了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他又說：「教科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關於十五年戰爭（就是意味着『九一八』以後的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記載。判決文中對原告方面所主張的關於『南京大屠殺』、『婦女暴行』、『七三一部隊』、『沖繩攻防戰』等的內容似乎並未反對，但是在途中把議論方向一轉，却得出教育部在檢定時所做的修正要求並無違法之處的結論。法院是否害怕得出和行政當局相反的結論呢？此種判決，將導致失去司法制衡行政權的動用。甚且可以說，這是司法者和行政者的互相結合。我並不是說他們之間曾有過協調，而是司法方面竟然自發性地和行政方面站在同一邊，這是令人心寒的結局。家永先生又說：「做為一個研究者、教育者，這是一本我投入全部心血所完成的著作，罔顧作者本人的意志，而由權力者任意要求改寫，這對我本人是莫大的侮辱。」

而另一方被告教育部對此判決結果作了以下的評論：「這一次的法院判決重新確認了教育部所實行的教科書檢定制度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我們今後將會為了使教科書內容更加適當而繼續努力。」

以上是雙方當事者對判決結果所做的評論。在這次訴訟中，雙方關於歷

史事實記載的爭論點一共有八處，其中除了一處之外，其餘七個地方，法院都認定了教育部的檢定方針。所以，雙方會有這樣的評論，並不為怪。其中尤其是關於現代史方面的記載，可算是原告方面家永的全面敗訴。今後，這方面的教科書的記載，將會更加受到限制。

其中最大的爭論焦點是在「侵略」或是「進出」這兩個辭彙上。法院方面對此點採取了規避的曖昧態度而不做裁斷，但是教育部却是以較委婉的方式以「改善意見」（較直接的方式是「修正意見」）作為檢定的方向，這樣的做法將會造成對作者和出版社極大的影響。而可以預見的是今後把「侵略」改為「進出」的教科書也將會增多。如此一來，日本人對戰爭的反省，以及防止戰爭再度爆發的努力也將更不重視，影響所及將是日本人自身優越感的抬頭，以及對亞洲各民族將愈加輕視。

三、介紹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兩本書

在這次的教科書判決之後，隨即有兩本關於判決中引起爭論的「南京大屠殺」的書，先後出版。其中一本是由退伍軍官的組織「偕行社」所編的南京戰史及資料彙編。

這本書的出版目的，是「為了提供『南京大屠殺』的確實資料。」在這樣明確的目的之下，更令人驚訝的是，竟然還有比這本書更為保守的強硬的意見反映在這本書的編輯委員會裏。例如：「編輯委員會是以什麼根據斷定對戰俘的處刑是違法的呢？！」，還有「這是對我光榮皇軍的侮辱。」，以及「憑什麼要我們對中國國民道歉？」等等。從這裏，我們感受到日本國內對這個事件以及對侵略戰爭的想法和心態。（有關這本書，去年11月22日的『首都早報』曾做了報導，請參考。）

這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1)他們宣稱為了澄清事實，所採用的資料是第一手資料。可是，他們所謂的第一手資料却都是日本軍部的記錄，並沒有加入中國當事者，特別是現在仍健在的見證人的證言。

(2)他們把軍人、「便衣人員」和俘虜嚴格區分，就是依據國際上的戰時法規，在「戰爭」期間，軍人、「便衣人員」以及逃入南京市內的國際安全區的沒有帶着武器的士兵，還有俘虜都是當然可殺的。他們在這裏解說這是「戰爭」期間，所以這些人被殺也是理所當然的。可是，當時的日本政府所宣稱的却是兩國之間並沒有「戰爭」存在，只是兩國軍隊間衝突性的「事

變」。因此，衆所周知之日本政府是以「事變」的方式來處理當時的狀態。所以這本書用「戰時法規」的論點來謀求「南京大屠殺」的合理化是與事實矛盾的。當時的德國納粹軍隊對於俘虜的敵軍軍官都有一定程度的對待方式，然而，日本却以格殺勿論的方式對待俘虜，當時日本軍方辯稱，因為「中日之間衝突的性質是事實」而不是「戰爭」，所以可以不適用於國際法上的「戰時法規」。在這本書中，也承襲了當時的軍方的說法，認為殘殺俘虜是合理的。以所述的觀點來看，這本書基本上只是探討其最有利的觀點為其立場辯護。

(3)這本書的出版社「偕行社」，在過去曾經在它所發行的「偕行」雜誌中連載了對「南京事件」的研究，在這份連載的最後，它很清楚地表明了對中國人民謝罪的總括意見。然而，在這本書裏，却宣稱他們沒有這樣的「政治性意圖」。並且，這本書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之一，也就是統計出「南京事件」中被殺的市民人數，這本書所發表的數目是有史以來最少的估計，認為只有一萬五千人被殺。此外，這本書也沒有對「南京大屠殺」有任何反省之意。這清楚地顯示了這一羣編作者的保守心態。其原因不外乎是由於退伍軍人將官所施予的有形無形的壓力。此外，教科書訴訟的審判過程及整個政治界和社會的右翼化傾向，也給予這羣編作者一些鼓舞作用。

另外一本書則是由曾經參加南京攻略戰的九份退伍兵的日記和筆記加以整理而成。這本書的出版目的是如以下所說：「在今日日本各界熱烈討論南京事件的情況下，我們公布實際上曾經參戰過的戰時軍人的筆記，不僅意義重大，而且極具有時代意義。」

因為，今天在日本，用自己的真實姓名公開戰時的日記和資料是相當危險的事。這本書的作者及出版社可說是非常有勇氣。鑑於日本國內今日對往日的侵略戰爭欠缺反省，反而有美化戰爭的傾向，所以這些退伍軍人打破沉默，決心公開日記資料，希望已往這種把人類改變成野獸的侵略戰爭不致再度爆發。

此外，這本書的編輯還把這些資料公開後，日本民衆對這本書的反應，以及他們對和平的關心和奮鬥的過程做了一番介紹。這也證明了，在日本除有不少人試圖美化侵略戰爭，同時也有了相當多的人堅決地反對戰爭。

有關「南京事件」的其他在日本出版的重要著作，有一本洞富雄所編輯的書。這是1986、87兩年，在南京所做的實地調查的記錄。1986年的那一年調查，本人也曾參加。此外，還有下里正樹、吉田裕、東史郎的幾本書。

除了「南京事件」之外，關於「七三一部隊」和「毒瓦斯作戰」，加上江口圭一的關於「鴉片」的研究等書或論文也有出版。這些都是針對日本的侵略戰爭的罪惡及其非人道所做的批判。本人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另一個三光作戰』的書，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很遺憾的是，當前，像戰爭肯定論、美化論這種論調的研究著作和論文、小說、隨筆等之類的文章，反而居於主流。特別是在去年一月，隨着昭和天皇去世，引發的天皇讚美或者昭和時代讚美的風潮，更加使得戰爭肯定論和美化論者意氣煥發。

前德國總統 *Weizäcker* 在 1985 年德國敗戰四十周年紀念會上，曾對德國的侵略戰爭做了這樣的反省；「對過去閉上眼睛的人，對現在也是盲目的。那些不想記住以前那非人道行爲的人而言，對於新的瘋狂傳染病將會再次失去抵抗力而被沾染上。」

本人非常遺憾的是，在今日的日本，對戰爭有深刻認識的政府官員可說少之又少。所以，具有這種認識的日本人和保守勢力之間，思想的差距將會越來越大。教科書的檢定問題所引起的對立意見，就是這種日本國內狀況的具體反映。

四、結語

對於歷史的研究和公開發表，我認為應該受到思想、信念、學問研究之自由保障。在日本，包括對天皇制度的批判在內，我認為不應該在歷史研究的領域內設下「禁區」。同時，對歷史事實的認定以及解釋也不應該由特定個人和國家權力所任意決定。而這些解釋不應強加在人民身上。所謂教科書問題的重要性也就在此。

日本學術會議曾對學問研究的基本原則作過這樣的協議：學術研究必須是「自主的、民主的、公開的」。而站在一個外國歷史研究者的立場上，我想這不僅是日本國內的學問研究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和外國學界做學術交流時的原則，教科書把最新的學問研究的成果教授給年輕人，並且能影響他們的精神、思想和情感的成長。所以，教育國民的教科書，是必得經由研究者和教育者之間，以自由、民主的方式不斷地討論和研究所撰寫而成。在這樣的過程中，原本就沒有國家權力和行政介入的餘地，同時也不應該有國家權力和行政介入的餘地。

教科書問題中的一個重要爭論點是中日戰爭史。今後，對於這個領域的

研究可以想見的是將會更加蓬勃。這個領域的研究，其意義不僅限於歷史研究，更在於對日本人的戰爭觀和歷史觀有重大的影響。

就這一點來說，我不僅歡迎臺灣和外國學者對中日戰爭史和對日本有進一步的研究，同時也期待他們能對日本以及日本人也有所建議及批評。這樣的研究和批評，並不是像有一些日本人所謂的「內政干涉」，而是，爲了日本日後的發展，也爲了建立和亞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和平友好關係，我認爲這樣的相互合作是不可欠缺的。

我在1985年到臺灣來參加「中日戰爭四十周年紀念討論會」時，遇到當時的南京軍事法庭的審判長石先生。也拜訪過當時擔任南京守衛部隊的二位將軍。在那時，我很率直地告訴他們，我覺得臺灣學界對「南京事件」的研究似乎不太熱中。這一次，我來到臺灣，受到貴近代史研究所的照顧，我所感受到的是，臺灣對於日本軍的侵略和殖民地政策的研究並不多見。在這次到臺灣之前，我在中國大陸做了一年半的研究工作，我發現在大陸大約有二千多個縣都正在進行日本侵略史實的調查研究。相對的，在臺灣的學界對於日本軍對臺灣侵略所做的研究並不多見，這是我所難以理解的。在這一點，如果我的理解有錯誤的話，還請各位多多指教。

話說回來，在日本的學界對於侵略臺灣歷史的研究也很少見，更不用說有具體談到臺灣侵略事實的證言者。以「南京事件」的例子來說，正因爲有教科書檢定訴訟那樣使日本社會騷動的大事件發生，所以才刺激了我剛才所提到的對戰爭的肯定和否定的互相對立的二種書籍的出版。而在這次的教科書訴訟之中，有關臺灣的記載並不成爲關注焦點的原因，我想並不是這樣的記載不會造成問題，而是因爲根本就對這方面的史實沒有加以記載。這是一個在日本國內現代史界相當被忽略的一個領域。這一點，同國後，我將會向家永三郎先生以及相關的學者專家們直接提出疑問。

關於臺灣方面的歷史，在日本似乎是個尚未被人踏入的研究禁區，我想這個原因當然是在於日本方面。在我這一次來臺灣的目的，就是延續着我出版的『另一個三光作戰』，想要對在戰爭期間日本人在臺灣的行爲做一個調查研究。可是，很慚愧的是一直到今天爲止，由於才疏學淺，只收集了一些資料，還談不上有什麼具體研究。今後，希望能得到近代史研究所的各位女士、先生以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的協助，我將會和我在日本的研究同事們一起在這個領域繼續努力下去。在這裏，要特別向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求教。我今天的簡單報告就到這裏結束。謝謝大家。



學人簡介

戴玄之

□林能士*□

畢生獻身於史學教育與研究工作，並且在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的研究方面卓著成績的戴玄之教授，於今年（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因病在臺北逝世。國內青年學子從此失去了一位誦人不倦的良師，學術界也失去了一位考證周密、見解精闢的史家。

戴玄之教授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於河南省新蔡縣的代灣。先祖原為蒙古人，遷居中原後，世代耕讀傳家。幼年秉承庭訓，接受詩書薰陶，奠定文史基礎。以鄉中教育落後，因此幼少即負笈求學外地，接受新式教育。先入新蔡縣第一小學就讀，小學畢業後考入河南省立汝南第六中學，同縣赴考者十餘名，戴教授是唯一上榜者。初中畢業後，因抗日戰爭爆發，鄉土淪陷，乃轉赴河南許昌第四中學高中部就讀。不久，因局勢吃緊，再轉河南省槐店聯合高中繼續學業。高中畢業後，本擬報考理學院的地理系，終因高中階段在戰亂中渡過，顧慮基礎不够紮實，遂改考入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歷史系肄業。四年的大學生涯雖是一段顛沛艱困的日子，但在藍文徵、蕭一山、陸懋德等史學名師的啟蒙下，戴教授由是進入史學之門，並奠定此後從事歷史研究的堅實基礎。尤其在蕭一山教授的引領下，開始對近代中國秘密社會史發生濃厚興趣。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戴教授從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畢業，先回家鄉新蔡縣立中學擔任教員兼教務主任。三十七年四月，國共軍事衝突擴大，華北局面已動盪不安，戴教授辭教員職南下，先赴南京，再轉臺灣，進入臺灣省立師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服務。初任訓導員，旋被聘為史地系助教。自擔任史地系助教起，在教學與處理行政工作之餘，開始潛心於近代中國秘密社會史的研究。由於研究論著不斷發表，因此很快地由助教（民國三十八年～四十二年）、講師（民國四十二年～四十八年）、副教授（民國四十八年～五十一年）遞升至教授（民國五十一～五十四年）並於民國五十四年出任歷史系系主任（民國五十四年～五十六年）。

戴教授對於近代中國秘密社會史的研究，先由義和團著手。在民國四十年代，臺灣的學術研究環境並不理想，書籍期刊相當貧乏，尤以秘密社會史方面為然。而戴教授卻不辭辛勞，費心蒐集各家之書，比較參證各種史料，從民國四十八年起的短短數年間，在「大陸雜誌」密集地發表了七篇有關義和團的論文。民國五十二年集結成書，得到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資助，出版「義和團研究」一書。此書旨在探討義和團的源流，兼闡勞乃宣「義和拳乃白蓮教之支流」，為「離卦教之子孫徒黨」，是「反政府的秘密結社」的說法之誤。並闡明義和團乃起於咸、同年間的鄉團，與白蓮教、八卦教無關。書中更將盛宣懷與東南互保、董福祥上榮中堂稟、許景澄長跪三疏真偽等疑案加以分析解釋。「義和團研究」的出版，辨明義和團真相，使治中國近代史者，對此事重新評估。因此出版後，得到相當高的評價，日本京都及教育大學皆曾將該書列入「中國近代史料」必讀之參考書。

義和團的研究告一段落後，戴教授轉向白蓮教、天地會等秘密社會之研究。民國五十七年在大陸雜誌發表「天地會的源流」一文，推翻中外學者「天地會起源於康熙十三年甲寅」及「雍正十二年甲寅」之舊說，創立「天地會起於乾隆三十二年，為福建省漳州府漳浦縣高溪鄉觀音寺洪二和尚（鄭洪）所創」之新說。該文後來由美國 Ronald Suleski 教授譯成英文，刊於英國劍橋大學出版之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1, Pt. 3, July 1977)。同年，又於日本東京出版之「中國學誌」發表「白蓮教的源流」一文，推翻日本史學權威矢野仁一「白蓮教為南宋高宗紹興初年茅子元所創」之舊說，創立「白蓮教源出南朝梁武帝時傅大士所創之彌勒教，至元末韓山童將白蓮會加入彌勒教始名白蓮教」之新說。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戴教授受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之聘，最初擔任客座教授（民國五十八年～六十年），其後擔任教授兼系主任（民國六十年～六十二年）、教授兼文物館主任（民國六十二年～六十四年）、教授兼系主任（民國六十四年～六十六年）。南洋大學改成英國制後，戴教授並受聘擔

任最高榮譽的教授一職（民國六十六～六十八年）。在南大任職先後有十年之久，除教學及行政工作外，仍繼續秘密社會史之研究。民國六十二年，〔紅槍會〕一書出版。此書廣泛徵引各種資料，探討紅槍會的源流、時代背景、組織與宗旨、儀式與法術、派別、變質及功能。日本學者酒井忠夫教授評稱：「關於紅槍會，過去雖有人研究過，卻以本書為最詳盡、最具綜合性的研究。關心中國近、現代的農民問題或會黨結社的學者，必可從本書獲得甚大助益。」除了〔紅槍會〕一書的出版，在南洋大學任教期間也先後發表了「天地會名稱的演變」、「白蓮社與白蓮教無關考」、「天地會與道教」、「清幫的源流」、「十九世紀白蓮教亂之剖析」、「朱三太子案」、「一八三五年山西趙城之先天教亂」、「老官齋教」、「咽嚙子」等關於秘密會黨或秘密宗教之論文，或為考證精細，或者獨具創見，獲得國內外史學界之推崇。

民國六十八年八月，戴教授辭去南洋大學教職，返臺定居，並受聘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在政大九年，是戴教授唯一未兼任行政職務的一段期間，因此得能專注於研究與教學。在研究方面，先後發表了「咸豐大錢」、「天理教聯合天地會起兵之分析」、「白蓮教的反元運動」、「清代的奴婢」、「明末的白蓮教亂」等論文。在教學方面，先後在歷史系講授「中國社會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等課。而在歷史研究所講授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一門，啟發重於傳授，帶引了不少研究生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史的研究領域。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的碩士論文計有陳孝淳之「唐才常之生平與思想」、吳惠芳之「民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陳德漢之「山東義和團之研究」、喻蓉蓉之「五四時期之中國知識婦女」、黃靜華之「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亂研究」等。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戴教授趁政大一年休假之便，應香港珠海書院之聘，擔任客座教授。一年期滿後，戴教授在政大申請提前退休，盼望專心著述。不意珠海書院梁永燊校長一再惇懇禮聘，遂再受任為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所長，其後又兼任文學院院長。在珠海書院任職期間，為提高研究生水準，除親自講授史學方法外，並廣聘著名學者至珠海授課。終因教學研究與行政人事百務叢集，不幸積勞成疾，竟至不起，實為史學界之一大損失。

附錄：戴玄之教授著作目錄

一、專書：

1. 義和團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254頁。
2. 紅槍會，臺北，食貨出版社，民國六十二年二月，244頁。

二、論文：

1. 「董福祥上榮中堂稟辨偽」，臺北，大陸雜誌第19卷第12期，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頁5-15。
2. 「盛宣懷與東南互保」，臺北，大陸雜誌第21卷7期，民國四十九年十月，頁5-12。
3. 「義和團源流考」，臺北，大陸雜誌第23卷第9期，民國五十年十一月，頁13-18。
4. 「義和團的本質」，臺北，大陸雜誌第24卷第1期，民國五十一年一月，頁10-15。
5. 「義和團與白蓮教無關考」，臺北，大陸雜誌第25卷第3期，民國五十年八月，頁7-12。
6. 「義和團的變質」，臺北，大陸雜誌第26卷第11.12期，民國五十二年六、七月，頁13-17，頁28-31。
7. 「許袁三疏眞偽辨」，臺北，大陸雜誌第28卷第3期，民國五十三年二月，頁18-24。
8. 「紅槍的法術」，臺北，新時代第5卷第1期，民國五十四年一月，頁28-31。
9. 「白蓮教的本質」，臺北，師大學報第12期，民國五十六年六月，頁119-128。
10. 「天地會的源流」，臺北，大陸雜誌第36卷第11期，民國五十七年六月，頁1-9。
11. 「白蓮教的源流」，日本東京，中國學誌第5期，1969年4月，頁103-118。
12. 「天地會名稱的演變」，新加坡，南洋大學學報第4期，1970年，頁149-165。
13. 「白蓮社與白蓮教無關考」，臺北，幼獅學報第9卷第3期，民國五十九年九月，頁1-17。
14. 「天地會與道教」，新加坡，南洋大學學報第6期，1972年，頁156-161。
15. 「論清幫與洪門的起源」，新加坡，星洲日報學術特刊，1973年一月

一日。

16. 「清幫的源流」，臺北，食貨月刊，第3卷第4期，民國六十二年七月，頁24-29。
17. 「十九世紀白蓮教亂之剖析」，臺北，大陸雜誌第50卷第4期，民國六十四年四月，頁1-9。
18. 「朱三太子案」，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史學論集，民國六十六年四月，頁412-424。
19. 「1835年山西趙城之先天教亂」，臺北，食貨月刊第7卷第3期，民國六十六年六月，頁7-14。
20. 「老官齋教」，臺北，大陸雜誌第54卷第6期，民國六十六年六月，頁7-14。
21. 「啞嚕子」，臺北，朱建民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民國六十七年四月，頁787-801。
22. 「咸豐大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期，民國七十二年三月，頁153-170。
23. 「天理教聯合天地會起兵之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期，民國七十三年三月，頁123-136。
24. 「明末的秘密宗教」，臺北，文壇第285期，民國七十三年三月，頁98-101。
25. 「白蓮教的反元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期，民國七十四年三月，頁45-70。
26. 「清代的奴婢」，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51期，民國七十四年五月，頁1-18。
27. 「明末的白蓮教亂」，香港大學明清史討論會論文，1985年12月。
28. 「社會變遷——人民生活與社會救濟」，載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編一民初時期，臺北，民國七十六年三月，頁1865-1914。
29. 「灤州石佛口王姓（白蓮教世家）族譜之研究」，臺北，第五屆亞洲族譜學會論文，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

「學人簡介」欄徵稿：傳略以二、三千字為宜，應包括出生時地、學經歷、學術貢獻等方面，並請附著作目錄。

Hommage à Wolfgang Bauer

Ursula Ritcher*

The eminent German sinologue Wolfgang Bauer turned sixty! I seize this occasion to pay homage to the teacher and friend upon the completion of a full 甲子 circle. Being one of those energetic personalities who seem to stay forever young, he appears, and looks at himself, as unfinished in the best intellectual sense, restlessly continuing his quest for insight and perfection. Well might he be contented with his copious academic achievements; but he is not given to complacency: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 may yet expect much of him.

Born at Halle on 23 February, 1930, Wolfgang L. Bauer entered primary school in his home town in 1936. Tragedy struck in 1936/37 when both his parents perished. Young Wolfgang was kindly received by relatives in Bavaria and given private lessons until 1946 when he entered the Wilhelms Gymnasium (grammar school) at Munich for a classical education. After "Abitur" graduation in 1948, he enrolled at the East Asian Department of Munich University, reading Sinology with professors Ernst Haenisch, Walter Fuchs, and Herbert Franke; Japanology with professor Hammitzsch; Mongolistics with Haenisch and professor H. Hoffmann; as well as Philosophy, Sanskrit, and Tibetan.

In 1953, he presented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Chang Liang and Ch'en P'ing—Two Politicians in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egree was conferred in July of that year, after which he joined a research project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Haenisch. From 1954 to 1958, Bauer was engaged in research at the same Department,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and, after having been granted his *venia legendi* in 1958 with a thesis on "The Chinese Proper Name", served there as *Privatdozent* (lecturer) until 1960 when he went to the USA to spend a term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as Visiting Professor. Supported by the Carnegie and Ford Foundations, he then did research in the US, Hong Kong, Taiwan, and Japan. From 1962 to 1966, he taught at Heidelberg University as a full professor of Sinology, and in 1966 he accepted the chair of Sinology at Munich University he still holds today. In 1968/69 and again in 1977, Bauer went back to Ann Arbor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Philosophy; he was invited repeatedly t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in 1984 to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nd in the same year to Tsukub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Tokyo, Japan. Throughout the years, he has paid a number of visits to mainland China, Taiwan, Korea, and Japan, as well as the major western centres of Chinese Studies, be it as a visiting scholar, an attendant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r a member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notably, 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since 1953;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since 1961; Gesellschaft für Asienkunde, since 1965; Nihon Dokyo Gakkai, since 1975; Gesellschaft für Kunst und Kultur Asiens, since 1975;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since 1981). Since 1970, he also served various functions with 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German Research Council) and other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nd was among the Europea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Committee for Chinese Studies. In 1985, he was elected a member of the Bav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ost of Bauer's time went, needless to say, into his teaching obligations at Munich, and into his own research as well as editing work.

While the latter two activities are demonstrated in a list of his major publications up to now (attached below), a personal remark

needs to be added. From his published work, the impression may be formed that Bauer's interest in China focuses around Taoism, Chinese esoterics, mysticism, psychology, and the like; while this is certainly true, another major area of his scholarly concern, less evident from his own writings, makes itself vigorously felt in his lectures and seminars—his concern with Modern China, particularly her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during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Thus he was and is encouraging and supervising 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ies on reform-minded Chinese thinkers from Ming and Ch'ing to Republican and Communist China; on intellectual movements (the 1898 Reform, "New Culture", May Fourth, Science versus Metaphysics, Social History, "Hundred Flowers", etc.); on Western (and particularly German) influence and exchange... Most of those who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study with professor Bauer or write theses under his guidance (as I was from 1973 to 1983) will not only have imparted to themselves his respect for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a lasting interest in the fat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But it is not merely in the classroom that Bauer's commitments show: He has been instrumental towards the German publication of numerous books concerning China, be it translations from Ancient or Modern Chinese, or scholarly theses and monographs for a general readership by Western authors. He often puts in the weight of his influence to find a publisher and sacrifices of his limited time to write a foreword and/or assume editorship. Also, he is frequently ready to speak publicly on China in the media. In the spirit of Richard Wilhelm (whom he admires), Bauer feels it one of his duties to spread information on a country still often and widely misunderstood.

How, in view of his workload and obligations, he finds the time to be sociable is his own secret—but his students always find him willing to join their parties, and he does maintain warm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his many friends all over the Globe. Let us join them, wishing him 生日快樂 and Many Happy Returns!

Select Bibliography of Wolfgang Bauer's Publications up to Now

(Not listed are Bauer's copious book reviews)

1. Monographs

Chang Liang und Ch'en P'ing, zwei Politiker aus der Gründungszeit der Han-Dynastie (C. L. and C. P.—Two politicians i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Han dynasty), dissertation, Munich 1953, 132 pp.

Der chinesische Personenname. Die Bildungsgesetze und Hauptinalte von Ming, Tzu und Hsiao-ming (The Chinese proper name; structure laws and major contents of *ming*, *tzu*, and *hsiao-ming*), Wiesbaden: *Asiatische Forschungen* IV, 1959, 406 pp.

(ed. text) *Tsch'un-Tsch'iu mit den drei Kommentaren Tso-tschuan, Kung-yang-tschuan und Ku-liang-tschuan* (The *Ch'un-ch'iu* with its three commentaries, *Tso-*, *Kung-yang-*, and *Ku-liang-chuan*), Wiesbaden: *Abhandlungen f.d. Kunde d. Morgenlandes* XXXIII, 1, 1959, 1026 pp.

(with Herbert Franke) *Die Goldene Truhe. Chinesische Novellen aus zwei Jahrtausenden*. Munich 1959, 1961, 1964, 446pp. English: *The Golden Casket. Chinese Novellas of Two Millennia*, New York 1964.

China—Vom Kaiserstaat zum Kommunismus (China—from Empire to Communism), Stuttgart: *Quellenhefte z. Geschichte u. Gem. Kunde*, 1960, 88pp. 2nd rev. ed. 1963.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ogic in Communist China. Seattle 1963. 21pp.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Work in Communist China, Frankfurt/M & Berlin 1964, 88pp. 2nd ed. Seattle 1966.

Chinesisches Theater (Chinese Theatre), Munich 1965, 44pp.

Chinas Vergangenheit als Trauma und Vorbild (China's past as trauma and model), Stuttgart 1968, 100pp.

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 Paradiese, Utopien, Idealvor-

- stellungen in der Geistesgeschichte Chinas* (China and the quest for happiness; paradises, utopias, idealized notions in China's intellectual history), Munich 1971, 703pp. 2nd ed. 1974. English: *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New York 1976, xvi/502pp.
- Das Bild in der Weissageliteratur Chinas* (Effigies in Chinese prognostic literature), Munich 1973, 73pp.
- A Concordance to the Kuo-yü*, vol. I: Concordance; vol. II: Word Frequency Count, Taipei: *Research Aids Series* no. 11, 1973, 808, 485pp.
- Ghina—Vom Ende des Kaiserreichs zum Kommunismus*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to Communism), Stuttgart: *Quellenhefte*, 1973, 100pp.
- A Concordance to the Jen-wu Chih*, Taipei: *Research Aids Series* no. 12, 1974, 240pp.
- Chinesische Comics—Gespenster, Mörder, Klassenfeinde* (Chinese comic strips; monsters, murderers, class enemies), Düsseldorf & Cologne: *Diederichs Gelbe Reihe* 11, 1976, 236pp.
- Das Antlitz Chinas. Autobiographische Selbstzeugniss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The Face of China; autobiographical self-attestatio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Munich, forthcoming 1990.

2. Articles, Essays, Conference Papers

- “Der Fürst von Liu” (The Prince of Liu) in: *ZDMG* 106 (1956), 166–205.
- “Der Herr vom Gelben Stein (Huang shih kung). Wandlungen einer chinesischen Legendenfigur” (Lord of the Yellow Stone, Huang-shih kung; Transformation of a Chinese legendary figure) in: *Oriens Extremus* 3 (1956), 137–152.
- “Chou Mi” in: G. Debon, W. Speiser (eds.), *Chinesische Geisteswelt* (The Chinese world of thought), Baden-Baden 1957, 230–241.
- “Das P'ai-hang-System in der chinesischen Personennamengebung”

- (The *P'ai-hang* system in Chinese naming of persons) in: *ZDMG* 107 (1957), 595-634.
- “Fürst, Volk und Staat im alten China” (Prince, People, and State in Ancient China), sources, app. to Hellmut Wilhelm, *Gesellschaft und Staat in China. Zur Geschichte eines Weltreichs* (Society and State in China; on the history of an empire), Hamburg 1960, 112-136.
-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Eigentums in China” (Early history of property in China) in: *Zeitsch. f. vergl. Rechtswissenschaft* 63 (1961), 118-184.
- “Der chinesische Eigenname und seine Beziehung zu Wort und Schrift” (The Chinese proper name and its relation to word and letter) in: *Oriens* 13/14 (1961), 256-264.
- “Zwei mehrsprachige Gedichtinschriften Kaiser Ch'ien-lungs aus dem Gelben Tempel' zu Peking” (Two multi-lingual inscriptions of poems by the Ch'ien-lung emperor in the “Yellow Temple” at Peking) in: H. Franke (ed.), *Studia Sino-Altaica. Festschrift E. Haenisch*, Wiesbaden 1961, 21-30.
- “China begegnet dem Abendland. Sinologie—die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 (China meets the Occident; Sinology, the genesis of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in: *Deutsche Zeitung* 167 (21/22 July, 1962), 17-18.
- “Icherleben und Autobiographie im älteren China” (Experience of Self and autobiography in pre-modern China) in: *Heidelberger Jahrbücher* VIII (1964), 12-40.
- “China. Universalgeschichte in Stichworten” (Key-words of world history) in: *Propyläen Weltgeschichte* 6 (1964), 649-659.
- “China—Verwirklichung einer Utopie” (Realization of a Utopia) in: *Summa Historica*, ibid. 11 (1965), 131-196.
- Numerous entries in *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 (Dict. of Literature), Zurich 1965-1971, passim.
- “Chinesische Frauennamen auf Formosa” (Chinese female names in

- Taiwan) in: *Proceeding 8th Intl. Congress of Onomastic Sc.*, The Hague 1966.
- “Der Widerstreit von Mensch und Masse in der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The antagonism of man and mass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in: *China, Reich der Mitte* (The Middle Realm), StAugustin 1966, 9-28.
- “The Encyclopaedia in China”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IX, 3 (1966), 665-691.
- “Erich Haenisch” (Obituary) in *ZDMG* 117 (1967), 205-210.
- “Der hastende Riese. Über die ‘Gross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in China’” (The hasty giant.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 in: *Merkur* 231 (1967), 518-535.
- “Posthumous Names, Value Change, and Biographical Stereotypes in Traditional China” in *Papers of the XIX Intl. Con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Bochum 1968, 129-136.
- “Synoptische Übersicht 2000 v. Chr. bis 1800 n. Chr.” (Synopsis 2000 BC to AD 1800) in: *Propyläen Kunstgeschichte* (Art History) 17 (1968), 339-351.
- “China und das Gesetz der Bewegung” (China and the law of motion) in: *Merkur* 272 (1970), 1103-1115.
- “Orientalistik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Sinologie” (Orientalistics, past and present; shown at the instance of Sinology) in: *ZDMG* 120 (1970), 213-228.
- Preface to R. Wilhelm, *Frühling und Herbst des Lü Bu We* (Lü-shih Ch'un-ch'iu), Düsseldorf 1971 (2nd ed. 1979), V-XXIII.
- “Ko Hung's Rede über die ‘Kunst des Innehaltens’” (Ko Hung's oration on “The Art of Leaving-off”) in: L. Brüll, U. Kemper (eds.), *Asien. Tradition und Fortschritt* (Asia; Tradition and progress), Festschrift H. Hammitzsch, Wiesbaden 1971, 1-22.
- “Lao-tzu” in: *Die Grossen der Weltgeschichte* (Great Personalities of World history), vol. I, Munich 1971, 364-381.
- “Probleme des Kulturlebens im heutigen China” (Problems of cultural

- life in today's China) in: *Ostasiens Tradition und Umbruch* (East Asia's tradition and change), Zurich 1971, 57-83.
- Ed. and Preface to M. Gálik, *Preliminary Research Guide, 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Munich 1971, I-III.
- "Goethe und China. Verständnis und Missverständnis" (G. and China;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in: H. Reiss (ed.), *Goethe und die Tradition*, Frankfurt/M. 1972, 177-197.
- "China in der modernen Welt" (China in the Modern World) in: *Meyers Enzyklopädisches Lexikon* 4 (1972), 583-588.
- Numerous entries in *Der Große Brockhaus* and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encyclopaedia) since 1972, *passim*.
- Ed. and Preface to R.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R. W., mediator between two Worlds), Cologne 1973, 6-38.
- Ed. and Preface to R. Wilhelm, *I Ging, Text und Material* (The *I-ching*, text and materials), Cologne 1973, 3-14.
- "Zur Textgeschichte des T'ui-pei-tu, eines chinesischen Nostradamus" (On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T'ui-pei-tu*, a Chinese N.) in *Oriens Extremus* 20 (1973), 7-26.
- "The Tradition of the Pao-kung an (Lung t'u Kung an)" in: *Oriens* 23 (1974), 433-449.
- Ed. and Preface to K'ang Yu-wei, *Ta T'ung Shu, Das Buch von der Grossen Gemeinschaft*, Düsseldorf, Cologne 1974, 9-24.
- Entries on Chu Hsi, Li Ju-chen, Lin Shu, Liu I-ch'in, Pan Chao, Pan Ku, Yang Hsiung in: J. Prušek (ed.), *Dictionary of Oriental Literatures*, London 1974, *passim*.
- Entries on Anarchism, Sino-German relations, Chinese encyclopaedias, and family, in: W. Franke (ed.), *China Handbuch*, Düsseldorf 1974, 18-20; 245-255; 292-293; 339-347.
- "Prophecies as Means of Legitimation and Delegitim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Traditional China" in: *Proceedings Intl. Symposium, 30th Anniversary of Korean Liberation*, Seoul 1975, 103-115.

“Ackerbau im Paradies -- Glücksvorstellungen im Alten und Neuen China” (Tilling the soil of Paradise; Notions of Happiness i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China) in: *Was ist Glück?* (What is happiness?), Munich 1976.

Preface to M. Granet, *Die chinesische Zivilisation* (German trl. by C.C. Müller of M. G.,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1929, 1968), Munich 1976, 5-10.

Ed and Preface to W. Mohr, *Die moderne chinesische Tagespresse* vol. I (Modern Chinese daily press), Wiesbaden 1976, 1-2.

“Users of Eastern Materials in Europe: German Experience” in: *Proceedings of IFLA Worldwide Seminar*, Seoul 1977, 351-360.

Ed. and Preface “Herbert Franke und die deutsche Chinasforschung nach dem Kriege” (H. F. and German post-War Chinese Studies) in: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H. Franke, Wiesbaden 1979, 7-17.

“The Problem of Individualism and Egoism in Chinese Thought” in: ibid., 427-442.

“Das erwachende Einhorn. Konstanten und Perspektiven für das China von heute” (The awakening unicorn; Constants and perspectives for today's China) in *Merkur* (1979), 19-31.

“Chinese Glyphomancy (ch'ai-tzu) and its Use in Present-day Taiwan” in: *Legend, Lore, and Religion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Wolfram Eberhard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San Francisco 1979, 71-96.

“Triebkräfte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Driving forces in Chinese history) in: A. Rummel (ed.), *Funkreport China* (broadcast report), Berlin 1979.

Ed. and Introduction to *China und die Fremden. 3000 Jahre Auseinandersetzung in Krieg und Frieden* (China and the foreigners; 3000 years of confrontation in war and peace), Munich 1980, 7-41.

Introduction to R.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The Soul of China,

- Berlin 1926; English: *The Soul of China* (trl. H. Reece; poems trl. A. Waley), New York 1928), new ed. Frankfurt/M. 1980, 7-22.
- “China und die westliche Literatur (C. and Western Lit.) in: *Forschung und Information -- China* (Research and Inf. on China), Berlin 1980, 46-56.
- “Krankheit und Heilung bei Lieh-tzu” (Lieh-tzu on illness and healing) in: H. Franke & W. Heissig (eds.), *Heilen und Schenken* (Healing and giving), Festschrift G. Klinge, Wiesbaden 1980, 1-11.
- “The Hermit’s Temptation: Aspects of Eremitism i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3rd and Early 4th Centuries AD” in: 中研院 (Proceedings, Intl. Conf. on Sinology, Section: Thought and Philosophy), Taipei 1981, 73-116.
- “China und Europa” in: *Anno Journal* I, 8 (1981), 4-10.
- “Ethik und wissenschaftliches Denken in China” (Ethics and scientific thought in China) in *Studium Generale*, Heidelberg 1982, 36ff.
- Ed., Essay of/in: *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 Bibliography*, Wiesbaden: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24, 1982, 510 pp.
- “Vorsicht beim Alleinsein und Beobachtung des Inneren Selbst: Philosophische Aspekte des Einsiedlertums im Konfuzianismus” (Caution of being alone, and observation of one’s inner Self;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eremitism in Confucianism) in: *Ch'en-yüeh chi*, Festschrift T. Grimm, Tübingen: Werkhefte d. Univ. Tübingen B, 1983, 313-331.
- “Die Rezeptio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 Zugänge zu einer geschlossenen Welt” (Per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rmany and Europe; Approaches to an hermetic world) in: *Neues 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23 (New handbook of lit. studies) Wiesbaden 1984, 159-191.
- “Antikulturelle Bewegungen in China” (Anti-cultural movements in

- Ch.) in: "Kultur" -- *Begriff und Wort in China und Japan* ("Culture": notion & term in Ch. and J.), Symposium *Forschungskreis für Symbolik*, Salzburg, Berlin 1984, 203-216.
- "Wolfgang Mohr" (Obituary) in: *Nachrichten d. Ges. f. Natur-u. Völkerkunde Ostasiens* (Newsletter, Assoc. Ethnol. East Asia) 127/28 (1984), 10-13.
- "Das heutige China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seiner kulturellen Tradition" (Today's China coming to grips with her cultural tradition) in: *Studium Generale*, Heidelberg 1985, 104-115.
- "Das 'Allein' als eine Metapher des 'Ich'" ("Alone" as a metaphor of "Self") in: *Fernöstliche Weisheit und christlicher Glaube* (Far Eastern wisdom and Christian faith), Festschrift Father H. Dumoulin SJ, Mainz 1985, 177-195.
- "Die Ideologie des heutigen China und ihr historischer Hintergrund"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Ch.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VR China im Wandel* (The PRCh in transition), Cologne: *Schriftenreihe Bundeszentrale f. polit. Bildung* (Fed. Centr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 1985, 13-33.
- "Die Eigenanalyse eines Unbekannten: Ichstruktur und Lebensphilosophie in Wang Chiehs (1609-c. 1680) 'Ausführlicher Selbstdarstellung des Schmarotzers 'Drei-Ich''" (The self-analysis of an Unknown; structure of the Self and philosophy-of-life in W. C.'s "Detailed self-demonstration of the parasite 'Three-Self'") in: G. Naundorf, K. H. Pohl, H. H. Schmidt (eds.),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H. Steininger, Würzburg 1985, 377-397.
- "The Hidden Hero: Cre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Ideal of Eremitism" in: D. Munro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Ann Arbor 1985, 157-197.
- 「内かウ外へ、外かウ内へ」(From inward out, from outward in) in: 思想, II, 630 (1985), 188-201 (trl. Maruyama Toshiaki).
- "Die 'Geradheit' in den 'Liedern'". Erinnerungen an das Studium mit

- “Günther Debon” (The “uprightness” in the “Odes”; reminiscences of studying with G. D.) in: R. Ptak, S. Englert (eds.), “*Ganz allmählich. Aufsätze zur ostasiatischen Literatur, insbesondere zur chinesischen Lyrik*” (“Easy does it”; Essays on East Asian Lit., esp. on Chinese poetry), Festschrift G. Debon, Heidelberg 1986, 13-25.
- “Wirkliche und unwirkliche Chinesen im Europa der frühen Neuzeit” (Real and unreal Chines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 2 (1988), 125-136.
- (with Chang P., M. Lackner) Ed. and Introduction, *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 A: Deutsche Kultu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m chinesischen Schrifttum 1970-1984: Eine Bibliographie* (The Chinese image of Germany today; A: German cul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Chinese literature, 1970-1984). -- *B: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im chinesischen Schrifttum 1970-1984* (K. M. and F. E. in Ch. lit., 1970-1984). 2 vols. Wiesbaden: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50 A: XXIV, 1174pp; B: XXII, 853pp.
- “Selbst und Selbstdarstellung in der Tang-Zeit” (Self and self-representation in the Tang) in *Studium Universale*, Bonn 1987/88.
- “Das Ich ohne Namen: Anonymität als paradoxes Stilmittel in der chinesischen Selbstdarstellung” ((The nameless Self: Anonymity as a means of paradox style in Chinese self-representations) in: Festschrift T. Grimm, Tübingen, forthcoming 1990.

中研院近史所出版年譜四種

(21) 王家儉：魏源年譜	精120元 平70元
(22)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譜	精360元 平300元
(36) 陶英惠：蔡元培年譜（上）	精200元 平180元
(40) 陸寶千：劉蓉年譜	精180元 平160元

函購七折，郵摺帳號 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概況

Papers on China

林 滿 紅*

二次大戰結束，中美關係瞬息萬變，美國對中國專家的需要更形迫切，*Papers on China* 是美國哈佛大學 1947 年創設用來訓練中國專家的一個刊物。

這個刊物由哈佛大學文理研究院及東亞研究中心資助出版。每個哈佛大學中國史方面專題討論課上的學期報告，只要引用新史料、討論新問題，或是用新方法討論老問題，都有機會被選來這裏刊登。由於是學生頂多花幾個月時間寫成的報告，不太可能有重要的結論，所以這份刊物刻意不加以精緻裝訂或封面設計，用以表示這不是一份正式的學報。這份刊物先只發行兩百份，最後增加到五百份。原先還給人訂購，後來因為處理訂購的成本還多於收入，除了圖書館索購之外，只贈送有興趣的個人。

透過這個刊物，可以使人獲知哈佛最新的中國研究內容。更重要的是，這個別的大學很難得有的學生刊物使哈佛中國研究方面的學生更早走上中國研究這個專業。因為有發表的機會更鼓勵學生用心研究。而在發表的過程，不管是研究本身或是文章的剪裁，文字的選用各方面都在師生共同討論之下進一步加以歷練。一旦有了文章發表，也就好似取得專家的初步證書，使學生更繼續往學者的道路邁進。

由 1947 年發行到 1971 年停刊的二十四年期間，這份刊物發行了二十四期，平均一年一期，雖然發行間隔有時提前在一年之內，有時挪後在一年以後，但在這二十四年期間，費正清教授一直是這個刊物的主編，有時 Benjamin Schwartz、楊聯陞、劉廣京等教授也加入編輯。費正清教授所教的「清史資料專題討論」、「中國近代史專題討論」、「中國現代史專題討論」課上的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學期報告是最主要的稿源，部分稿源則來自楊聯陞教授所教的「中國地方史（地方志）」、John Fletcher 教授所教的「中國、內陸亞洲和1500—1800的世界」、Benjamin Schwartz 教授所教的「中國思想史」。

Papers on China 選用文章的內容因而以明清至當代的中國歷史為主。偶而有日本、越南、韓國方面的文章，但比例很小。該刊第二十四期附有各期目錄及作者，主題引得。各期目錄詳見附錄。題目有小至一個人物如胡漢民，一個地方產業如湖州的紡織業，一個團體如同盟會，也有大到如傳統中國何以未發展科學、十九世紀美國思想中的東方與西方，中國地方政府的中央集權性與民主性、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斯教條、國民黨與共產黨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的比較等等。

由其主題引得可以看出其所研究的題目，以和共產黨有關者最多，有33篇。國民黨的研究相對地只有9篇。這反映出在此期間美國對新崛起的中共有很強烈的好奇。中外關係方面的研究也佔很大比例，基督教方面研究有28篇，民族主義方面研究有16篇、外交方面有16篇，軍事方面有16篇。與現代化有關的經濟與教育方面研究亦多。經濟方面，農業改良、貿易部分各有12篇，技術部分有11篇，財政部分則有11篇，勞工方面有11篇，教育方面則有22篇。中國傳統思想與社會方面也佔若干篇幅，儒家思想方面有14篇，秘密社會方面有11篇。文學藝術方面兼而有之，但相對較少，文學尚有11篇，藝術只有1篇。據主編的費正清在編者序中指出，這個刊物的研究基本上傾向於是結合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

到了1971年，由於有越來越多成書的著作等待出版，這項刊物於是因有限的經費轉而出版成書而停止發行。

在1971年以前，這項刊物的作者當中，已有四十位以上有書在哈佛出版。讀者只要過目一下作者名單，不難發現許多當今卓然有成的中國專家。這份刊物除了仍可供相關研究參考之外，也成為研究當今許多中國專家學術發展背景的重要史料。

附錄：Papers on China 各期目錄

Volume 1 (December 1947)

Rhoads Murphey, "The Non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 Ma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Robert B. Sheek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I-ho Ch'uan and Its Role in the Boxer Movement"
 Melvin Richter, "Sun Yat-sen's Doctrine of *Min-ch'uan*"
 William E. Nelson, "China's New Order: Centralization vs. Democracy in Local Government"
 Benjamin I. Schwartz, "Marxist Doctrin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Conrad Brant (Brandt), "Agrarian Reform in Communist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Marxist Tradition"

Volume 2 (May 1948)

- Wayne Altree, "Toynbee's Treatment of Chinese History"
 F. L. Dawson, Jr., "Law and the Merchant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Ch'ing Code, *Ta-Ch'ing lü-li*,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Merchant Class"
 Davy H. McCall, "Chang Chien: Mandarin Turned Manufacturer"
 S. H. Chafkin, "Modern Business in China: The Bank of China Before 1935"
 Ma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Benjamin I. Schwartz, "Ch'en Tu-hsiu: Pre-Communist Phase"
 Robert K. Sakai, "A Study of China's Destiny and Its Adaptation of Confucianism"

Volume 3 (May 1949)

- Charles J. Stanley, "Chinese Finance from 1852 to 1908"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Kailan Mines, 1878-1912"
 Wayne Altree, "A Half-Centu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ate Railways of China"
 Roger F. Hackett,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1900-1910"
 Robert K. Sakai, "Ts'ai Yuan-p'ei as a Synthesizer of Western and Chinese Thought"
 Robert K. Lee, "The *Pao-chia* System"

Ralph L. Powell, "The Rise of Yüan Shih-k'ai and the Pei-yang Army"

R. Bollenbach, "The Mongol Peoples' Republic: Democracy of a New Type"

Volume 4 (May 1949)

Paul E. Callahan, "Chu Hsi and St. Thomas: A Comparison"

Harold C. Hinton, "Grain Transport via the Grand Canal, 1845-1901"

John L. Rawlinson, "The Lay-Osborn Flotilla: It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William Ayers, "The Hong Kong Strikes, 1920-1926"

Clarence Moy, "Kuo Mo-jo and the Creation Society"

Robert K. Lee,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Volume 5 (April 1950)

William Ayers, "Shanghai Labor and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Paul O. Elmquist, "The Sino-Japanese Undeclared War of 1932 at Shanghai"

Paul E. Callahan, "Christianity and Revolution as Seen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Chao Kuo-chün, "Land Reform Methods in Communist China"

Volume 6 (March 1952)

Esther Morrison, "A Comparison of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Modern History Textbooks"

Melvin A. Conant, Jr., "JCRR: Problems of American Participation in the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Herbert Weisshart, "Feng Yü-hsiang: His Rise as a Militarist and His Training Programs"

Clarence Moy, "Communist China's Use of the Yang-ko"

Paul E. Callahan, "T'ai Hsü and the New Buddhist Movement"

Volume 7 (February 1953)

Albert H. O'Bryant, "Liang Sou-ming: His Response to the West"

William Ayers, "The Society for Literary Studies, 1921-1930"

Robert Winter, "Japan's Balance of Payments in the Postwar World"

Walter E. Gourlay, "Yellow" Unionism in Shanghai: A Study of Kuomintang Technique in Labor Control, 1927-1937

Melville T. Kennedy, Jr., "The Chinese Democratic League"

Takashi Oka, "Self-Government in the Japanese Village: Before and After the Local Autonomy Law of 1947"

Volume 8 (February 1953)

Albert Feuerwerker, "A Draft Biography of Shen Hsuan-huai, Official and Industrialist, 1844-1916"

Takashi Oka, "Saionji and the Manchurian Crisis"

Melville T. Kennedy, Jr., "Hu Han-min: Aspects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Albert Borowitz, "Chiang Monl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Education, 1917-1930"

Sherwin Montell, "The San-fan Wu-fan Mov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Volume 9 (August 1955)

Takashi Oka, "The Philosophy of T'an Ssu-t'ung"

Thomas Malim, "Japan and the West in the *Namban byōbu*"

Mark Mancall, "China's First Missions to Russia, 1729-1731"

Judith Blick, "The Chinese Labor Corps in World War I"

Robert L. MacFarquhar,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William A. Brown, "The Protestant Rural Movement in China, 1920-1937"

Volume 10 (October 1956)

Holmes H. Welch, "Syncretism in the Early Taoist Movement"

Mark Mancall, "Major-General Ignatiev's Mission to Peking, 1859-1860"

Peter Duus, "Science and Salvation in China: The Life and Work of W. A. P. Martin"

Norma Farquhar, "A Bibliography of the Writings of W. A. P. Martin"

Jerome B. Grieder, "The Communist Critique of *Hung lou meng*"

- Ryukichi Ima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Japan, 1952-1956"
- Volume 11 (December 1957)**
- Dorothy Ann Rockwell, "The Compilation of Governor Hsü's *Ying-huan chih-lüeh*"
- Paul A. Cohen, "Missionary Approaches: 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
- Margaret Field, "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
- James C. Thomson, Jr., "Communist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a, 1935-1936"
- Merle Goldman, "Hu Feng's Conflict with the Communist Literary Authorities"
- Volume 12 (December 1958)**
- Paul A. Cohen, "The Hunan-Kiangsi Anti-Missionary Incidents of 1862"
- Marilyn Blatt, "Problems of a China Missionary: Justus Doolittle"
- E. Joan Smythe, "The Tzu-lihui: Som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
- David Tod Roy, "Kuo Mo-jo: The Pre-Marxist Phase, 1892-1924"
- Elise, Hawtin. "The Hundred Flowers Move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China, Fei Hsiao-t'ung: A Case History"
- Volume 13 (December 1959)**
- Lloyd Eastman, "The Kwangtung Antiforeign Disturbances during the Sino-French War"
- John Schrecker, "Watts O. Pye, Missionary to China, 1907-1926"
- Harvey Pressman, "Hay, Rockhill, and China's Integrity: A Reappraisal"
- Robert L. Irick, "The Chinchow-Aigun Railroad and the Knox Neutralization Plan in Ch'ing Diplomacy"
- Ernest P. Young, "Ch'en T'ien-hua (1875-1905): A Chinese Nationalist"
- Philip A. Kuhn, "T'ao Hsing-chih (1891-1946): An Educational Reformer"

Volume 14 (December 1960)

- Chang Hao, "The Antiforeignist Role of Wo-jen, 1804-1871"
- Wu Wei-p'ing, "The Rise of the Anhwei Army"
- John Schrecker, "The Pao-kuo hui: A Reform Society of 1898"
- Akira Iriye, "East and Wes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Thought"
- Shirley Godley, "W. Cameron Forbes and the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1935"
- Roberto Paterno, "Devello Z. 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
- William Reeves, Jr.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Medicine: The Origins of Hsiang-Ya, 1902-1914"

Volume 15 (December 1961)

- David Hamilton, "Kuo Sung-tao: A Maverick Confucian"
- Mary Backus Rankin, "The Ku-t'ien Incident, 1895: Christians versus the Ts'ai-hui"
- Charlton M. Lewis, "The Reform Movement in Hunan, 1896-1898"
- Hao Yen-p'ing, "The Abor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Reformers and Revolutionaries, 1895-1900"
- Edward J. M. Rhoads, "Lingnan'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Shakese Incident, 1925"
- Fox Butterfield, "A Missionary View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6-1939"

Volume 16 (December 1962)

- Thomas A. Metzger, "T'ao Chu's Reform of the Huaipei Salt Monopoly"
- Hao Yen-p'ing, "A Study of the Ch'ing-liu tang: The "Disinterested" Scholar-Official Group, 1875-1884"
- Chen Chi-yun, "Liang Ch'i-ch'ao's "Missionary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the Reformers"
- Kosaka Masataka, "Ch'ing Policy Over Manchuria, 1900-1903"
- Edward J. M. Rhoads,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a in Kwangtung"

(1905-1906): The Canton Anti-American Boycott and the Lienchow Anti-Missionary Uprising"

Winston Hsieh,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a Warlord: Ch'en Chiung-ming, 1878-1933"

Volume 17 (Debember 1963)

A. B. Woodside, "Early Ming Expansionism (1406-1427): China's Abortive Conquest of Vietnam"

Edward L. Farmer, "James Flint versus the Canton Interest, 1755-1760"

Irwin T. Hyatt, Jr.,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7-1890):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

Leong Sow-theng, "Wang T'ao and the Movement for Self-Strengthening and Refor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Mark Elvin, "The Mixed Cou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t Shanghai to 1911"

A. B. Woodside, "T'ang Ching-sung and the Rise of the 1895 Taiwan Republic"

Vincent S. R. Brandt, "Landlord-Tenant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China"

R. Randle Edwards, "The Attitu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war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nited Nations"

Volume 18 (December 1964)

E. Joan Smythe, "The Early Thought of Wang Kuo-Wei: An Analysis of His Essays on German Voluntaristic Philosophy, 1903-1907"

Irwin T. Hyatt, Jr., "The Chengtu Riots (1895): Myths and Politics"

S. A. M. Adshead, "The Reform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 1913-1918"

Steven I. Levine, "Trotsky on China: The Exile Period"

Fox Butterfield, "The Legend of Sung Ching-shih: An Episode in Communist Historiography"

R. David Arkush, "On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Wang Meng's

Young Newcomer"**Volume 19 (December 1965)**

A. B. Woodside, "Some Features of the Vietnamese Bureaucracy Under the Early Nguyen Dynasty"

Fred W. Drake, "A Nineteenth-Century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Hsü Chi-yü's *Ying-huan chih-lüeh*"

Eric G. Widmer, "Archimandrite Palladius and Chinese Control of Barbarians in 1858"

Lo Wan, "Communal Strife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Kwangtu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h-ch'i"

Wang Yeh-chien, "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Population in Southern Kiangsu"

Leo Ou-fan Lee, "Lin Shu and His Translations: Western Fiction in Chinese Perspective"

R. David Arkush, "Ku Hung-ming, 1857-1928"

Volume 20 (December 1966)

Peter J. Golas, "The Courier-Transport System of the Northern Sung"

Willard J. Peterso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onetary Ideas on the Cash-Silver Exchange Ratio"

Blair C. Currie, "The Woosung Railroad, 1872-1877"

Wellington K. K. Chan, "Ma Ju-lung: From Rebel to Turncoat in the Yunnan Rebellion"

Philip West, "The Tsinan Property Disputes, (1887-1891): Gentry Loss and Missionary 'Victory'"

James R. Pusey, "K'ang Yu-wei and *Pao-chiao*: Confucian Reform and Reformation"

Louis T. Sigel, "Ch'ing Tibetan Policy, 1906-1910"

Volume 21 (February 1968)

Lillian M. Li,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Sino-Western Cooperation in the Defense of Shanghai Against the Taiping Rebels"

James Morrell, "Two Early Chinese Cotton Mills"

Dong Jae Yim, "The Abduction of the Taewöngun: 1882"

Graeme McDonald, "George Leslie MacKay: Missionary Succ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Noriko Tamada, "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Volume 22A (May 1969)

Mi Chu Wiens, "Anti-Manchu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Ch'ing"

Douglas G. Spelman,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The Protestant Term Question"

Alison J. Dray, tr. "Excerpts from E. P. Kovalevsky's *Journey to China*"

Nancy Evans, "The Banner-School Background of the Canton T'ung-wen kuan"

Hilary J. Beattie,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Opium in China"

Martin R. Ring, "The Burgevine Case and Extrality in China, 1863-1866"

Miriam Levering, "The Chungking Riot of 1886: Justice and Ideological Diversity"

Volume 22B (December 1969)

Perry Link, "Refugees in Hong Kong"

Ellen F. Ojha, "Fluctuations in Chinese Communist Agrarian Policy, 1926-1950"

Paul Cocks, "The Role of the Party Control Committee in Communist China"

Alison J. Dra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The Case of Mikhail Sholokhov"

Thomas P. Elmore, "The Crimes of a Regional Party Bureaucrat: Li Ching-ch'üan"

Volume 23 (July 1970)

Liu Ts'ui-jung, "Dike Construction in Ching-chou"

Yueh-hung C. Ting, "Sericulture in Hu-chou as seen in the *Hu-chou fu-chih*"

Nancy J. F. Evans, "Social Criticism in the Ch'ing"

Maureen F. Dillon, "The Triads in Shanghai"

Charles A. Litzinger, "Patterns of Missionary Cases Following the Tientsin Massacre, 1870-1875"

Marcella Bounds, "The Sino-Russian Secret Treaty of 1896"

Volume 24 (December 1971)

June Y. Mei, "Public Works and Community Health in Preindustrial China"

Suzette H. Canfield, "Bridge Construction and Repair in the Ming and Ch'ing"

Fook-fai Huen, "The Manchurian Fur Trade in the Early Ch'ing"

Richard L. K. Jung, "The Sino-Burmese War, 1766-1770: War and Peace Under the Tributary System"

Hoi-chan Nguyen, "Som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Vietnam, 1650-1850"

Vinh Long Ngo, "Use of the Chinese by the French in Cochinchina, 1886-1910: Policies and Techniques"

Howard R. Spendelow, "Russia's Lease of Port Arthur and Taliens: The Failure of China's Traditional Foreign Policy"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一) 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稿，中、英文不拘。

(二) 本通訊暫定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三) 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用有格稿紙謄寫，亦可附寄相關照片。

(四) 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五) 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如有重大刪改，將商請作者同意。

(六) 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七) 來稿請寄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THE CASE AGAINST REFORM: Some "Conservative" Reactions to Feng Kuei-fen's *Chiao-pin-lu k'ang-i**

Philip A. Kuhn

At the height of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the Kuang-hsu Emperor, at the request of Sun Chia-nai, distributed Feng Kuei-fen's *Chiao-pin-lu k'ang-i* to more than 300 middle-level capital officials, who were ordered to submit comments. These comments are now at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Peking. A preliminary sampling of their contents can suggest what ordinary capital bureaucrats thought about Feng's reform agenda. This study analyses their reactions to four of Feng's essays that deal directly with questions of a "constitutional" nature, that is to say, those touching upon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political structure. The essays were:

- 1) "Reinstituting Local Offices" (*Fu hsiang-chih i*)
- 2) "Making Appointment a Public Matter" (*Kung ch'u-chih i*)
- 3) "Abolishing the Rule of Avoidance" (*Mien hui-pi i*)
- 4) "Transforming the Sub-bureaucracy" (*I li-hsu i*)

Analysis of capital officials' responses shows that opposition to Feng's proposals relied on three propositions:

- 1)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bureaucracy and all other claimants to political power should remain distinct. Feng's proposals would have had the effect of blurring this boundary by creating a stratum of intermediate power-holders in rural society, as well as by giving wider segments of the educated elite the power to recommend candidates for office.
- 2) That the higher a man's official rank,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fairness and objectivity of which he was capable. Feng's proposals, in his critics' opinion, would have opened the door to participa-

* 本文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Philip A. Kuhn 教授於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在中研院近史所發表之學術演講摘要。

tion by lower-ranking bureaucrats, who would have been ruled by selfish interests rather than by the public interest.

- 3) That wide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would result in the rise of factions and the ascent of unworthy men to high office. Critics assumed that factions, by their nature, attracted persons of inferior moral character. They were particularly critical of Feng's proposal to substitute *sheng-yuan* for clerks, because they shared the common stereotype of lower degree holders as morally inferior and politically disruptive.

The pattern of criticism reveals a consist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opposed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is contrasts with Feng's position, which follows closely upon that of his intellectual mentor, Wei Yuan, in placing greater faith in the capacity of ordinary educated men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 even while pursuing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This faith in the broad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s (as distinct from coercive bureaucratic control) is characteristic of that stream of "statecraft" thought of which Wei was a leading representative. Feng's critics, by contrast, represent a longstanding line of political argumentation that sought order and stability through the close regulation of private interests by objective bureaucratic author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neral decay of public authority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this kind of argumentation could, in terms of the old context of political debate, be considered reformist in its ownway.

Finally, a comparison is made with the thought of James Madison, who represents a view of an objective "public interest" that is in some ways quite compatible with the position of Feng's critics. Madison also considered factions as inevitably hostile to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one of his arguments for large-scal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wa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could "enlarge and refine" short-term private interests to make them compatible with long-term public needs. This perception of an objective "public interest" -- discernable by men of special public-spirit and objectivity -- has now largely disappeared from the political scene in the liberal democracies.

關於戰前十年舉借外債的基本估計

鄭 會 欣*

抗戰前十年（1928—1937）國民政府外債政策的重點是整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時期遺留下來的外債，特別是在清理所謂無擔保和無確實擔保外債方面花了很大精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這一時期中央政府所舉借的外債無論是與前清和北洋政府所借外債相比還是與同時期所發行的內債相比，數額都是較小的。

舉借外債較少並不就是沒有舉借，特別是在抗戰爆發前一、二年，由於整理債務的成功而出現了一個舉借外債、吸引外資的高峰。然而過去一般著作大都忽視了這個事實，只是片面強調抗戰前國民政府「對於外債，力主慎重，不肯輕於起借」。^①即使談到舉債，也往往只是提及美麥借款和棉麥借款而已。^②有些學者雖然不同意這種觀點，但又缺乏具體材料加以論證。

抗戰前十年國民政府究竟借了多少外債，這個問題對於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近代中外關係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過去也有不少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研究，但至今尚無定論。學術界說法不一，彼此間分歧亦較大。據筆者所見，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1. 周伯棣認為，國民政府成立後所發行外債截至抗戰爆發時為止，總計十四種，其中屬於政務者六種，屬於路政者八種，合計為英金 2,838,000 銀，美金 33,299,108 元，法金 45,000,000 法郎，海關金 2,331,443 單位，法幣 92,500,000 元。^③近年來臺灣學者也有人持這一意見。^④

* 香港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①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調查室編：《中國內外債詳編》民國29年6月，頁76。

② 有代表性的文章見賈德懷：《民國財政簡史》商務印書館民國36年版，上冊，頁336；李立俠：「中國外債之檢討」，《東方雜誌》卷34期14。

③ 周伯棣：「民元來我國之中央財政」，載銀行公會編印《民國經濟史》民國37年1月版，頁171。

④ 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經濟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民國72年12月版，冊1，頁396。

2.按照當時任鐵道部長的張公權的講法，僅抗戰爆發前十八個月（即1936年1月至1937年6月）中已將利用外資建設鐵路的途徑重新打開，這段時間共向國外借款（包括新路及舊路）計國幣 529,155,966 元，約合美金 157,260,535元，或英金 31,932,370 銀。⑤但若詳加分析，在他所列的借款中有部分是在抗戰爆發後簽約的（如廣梅、浦襄、貴梅、三梧、貴昆等路借款皆是），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還有部分借款合約雖經簽定，但終因抗戰爆發而取消（如寶成鐵路借款、平漢路江橋借款等），或僅部分實現（如湘黔、成渝等路借款），因此在計算債額總數時，應將上述借款數額予以削減。

3.吳承明根據其所掌握的資料而得出的結論是，國民政府1931—1936年實際起債額為87,076,547美元（不包括「九一八」以後對偽滿的借款），其中財政借款為35,842,469美元，鐵路借款為51,234,078美元。

1931—1936 年外債未發行額為 54,422,846 美元，其中財政借款為32,913,718美元，鐵路借款為21,509,128美元。

1936年結欠外債共計 920,640,231 美元，其中財政借款 574,574,859 美元，鐵路借款346,065,372美元。

1936年庚子賠款結欠額為106,535,902美元。⑥

4.根據日本東亞研究所的調查統計，國民政府在1928—1930年不曾舉借外債，而1931—1937年則舉借外債計251,675,000元。⑦

5.侯繼明則將外債借款分為行政、鐵道、產業三個部分，根據他的統計，1928—1937年總借債額為 34,289,000 英鎊，其中行政借款8,011,000英鎊，佔借款總額的23.4%；鐵道借款24,358,000英鎊，佔71.0%；產業借款1,920,000英鎊，佔5.6%。⑧

6.長期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顧問的美國人楊格（Arthur N. Young）則認為，中國在 1934—1937 年間，得到並且實際使用的鐵路信貸總額約等於四千萬美元，1937年中期，中國按照中德易貨貿易協定，為工業和軍事目的，

⑤ 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民國63年修訂版，頁91。

⑥ 吳承明：《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頁183—188表。

⑦ 東亞研究所：《支那の貿易收支》1942年，頁 25—28。轉引自小野一一郎、吉田肅編：《兩大戰間期のアジアと日本》東京大日書店，1979年版，頁82。

⑧ Hou Chi-ming (侯繼明)，*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Table 47, pp.227-229.

從德國得到的信貸數額大約也相當於四千萬美元。因此在這一時期內得到利用的外國信貸共計約為八千萬美元。除此之外，比利時、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利益集團各自答應供給，雖已達成協議，但未曾動用的鐵路信貸，加起來為數也大致相當於八千萬美元。另外還有英國和法國財團答應供給，數目約為三千五百萬美元的信貸也都正在談判或擬議之中。由美國提供更多的信貸，以便中國從美國購買鐵路器材和其它資本財貨的前景也很好。如果不是發生了戰爭，中國在經濟發展中必能從外國得到數目相當大的財政援助，並從中得到好處。^⑨

7.據宓汝成統計，1928—1936年國民政府的鐵路外債共為1.95億元，佔同期外債總額的39%。^⑩若照此計算，這段時期內所借外債總額則應為五億元。

8.王方中認為，抗戰前十年國民政府的外債總額大體可估計為6,000萬美元左右，這段時期內至少有十一筆借款是完全實現了的。^⑪

上述說法分歧較大，舉債數額亦相去很遠，令人難以適從。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幾點：

其一，當時國民政府並無一個統一舉借外債的機構，如鐵道部財務就沿用鐵路獨立會計的成規，凡部中開支由各路解款應付，新路建築由部自行籌借，債款本息由部轄各路提解備付，故歷年財政報告中並不包括鐵道、交通等部門的財政收支在內。舉債情形既因部而異，統計資料自然難以詳盡。《財政年鑑》在述及國債時亦承認只「以屬於財政部主管之有確實擔保國債為限，而以財政部歸入整理之內外債及其他中央機關之債務麗焉」，而對各省各部所舉借之外債，「因調查不能詳盡，故只附帶述之」。^⑫在國民政府這一時期的檔案資料中，對於外債除了有零星的記載之外，迄今亦尚未發現有詳細的統計資料。

其二，有些借款雖簽有合同，但履行情況尚不清楚，特別是抗戰前夕簽訂的幾筆借款，後因抗戰爆發有些借款就未能實現，或只是部分實現，因此在計算債額時就會產生問題。

其三，有些借款鑒於當時的外交局勢，屬於秘密借款，「各種借款

⑨ 楊格：《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頁418。

⑩ 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頁364。

⑪ 王方中：「抗戰前十年國民政府借過多少外債」，載《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⑫ 《財政年鑑》（民國24年），頁1229。

合同，間有未經政府正式公佈，或種種特殊關係未便公開發表者」。^⑬比如1936年簽訂的「中德以貨易貨貿易協定」，就是因為害怕引起日本的干涉而由軍方從中洽談，對外則從未公佈。這些情況都會給後人研究帶來困難。

其四，匯兌率的變動亦是計算債額出入較大的一個原因。這一時期借款中有英鎊、有美金、有法郎、也有銀圓，然而各種貨幣的匯兌率卻在不斷地變動。如1928年7月美元與銀圓的匯率為0.47:1，而1937年7月美元與法幣的匯率則為0.32:1^⑭兩者相差如此之大，但銀圓與法幣的比價在理論上卻是等值的。根據不同的匯率來折合成美元或國幣，當然會出現較大的差額。

造成舉債數額不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述作者沒有（或不全面）將這一階段所借外債逐一排列再進行分析，因此就使人很難了解他們所依據的材料究竟有哪些，從而亦不易作出明確判斷。徐義生先生於二十幾年前在詳盡佔有史料的基礎上曾編輯了一本《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按時間順序將清政府到北洋政府期間所借外債逐一排列，為後人研究這一問題帶來很大方便。但遺憾的是該書下限只到1927年，與本文所討論的範圍正好脫節。有鑑於此，筆者乃將近年來所收集到的前人研究成果和檔案資料作一歸納，相互對照，然後按時間順序逐項排列，製成「抗戰前國民政府舉借外債一覽表（1928.7.～1937.6.）」（簡稱一覽表，詳見附錄）。根據目前的初步統計，抗戰前十年國民政府中央一級機關（不包括「九一八」以後東北地區借款）前後舉借外債七十二項，實際舉債額共計為美金35,256,707元，英金7,366,673鎊，法金83,400,514法郎，比金93,489,763法郎，荷金1,815,961弗羅令，日金3,739,545元，德金782,000馬克，銀圓及法幣45,499,931元，海關金（C. G. U.）2,334,363單位，港洋68,564元，毫洋33,989元。

由於十年中各種貨幣的匯兌率不斷變化，因此要想將上列債額折合成一種貨幣是頗為困難的。若要精確，按理講應該按各債起借時的匯率折算才是，但這一點目前卻不易做到。這裏為了便於計算，匯兌率一律按吳承明所編製的1936年各國貨幣折合美元的表格折算^⑮，即每單位貨幣折合美元是：

^⑬ 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編：《中國外債匯編》民國24年版，「例言」。

^⑭ 楊格：前引書，頁122。

^⑮ 吳承明：前引書，頁181。

英鎊—4.97，法郎—0.06，日元—0.29，馬克—0.40，比法郎—0.034，荷蘭弗羅令—0.64，銀圓及法幣—0.30。海關金單位則按每單位—0.671，港洋—0.30，毫洋—0.24折算。照此統計，戰前國民政府實際舉債額應為97,800,207美元，或19,628,143英鎊，折合成國幣則為326,000,691元。

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借款中有一些屬於銀行透支和短期墊款，按照「在年度內隨借隨還之外債，或一時墊借之款，於財政之會計年度尚無影響，茲不具列」^⑯這一原則，本來不應計算在內。但是上述借款大都未能如期付清，而且均有利息負擔。比如1929年6月21日簽訂的京滬鐵路購車墊款，債額156,000英鎊，原為短期墊款，限二十個月歸還，但拖欠日久，直至抗戰爆發前才全部清償。^⑰類似這樣的情況比較多，實際上與借款的作用相同，當然應該納入借款總額之內。

「一覽表」中所列借款也可能會有少數重覆，比如1931年12月首都輪渡借款、1932年膠濟鐵路購料借款和津浦鐵路購料借款，在契約中都載明償還之本金專戶收存，「以備鐵道部借充完成粵漢鐵路工程之用」。但上述借款至1934年粵漢路舉借庚款時並未清償，因此現仍將這些借款列於表上。

另外，1937年7月30日簽訂的廣梅鐵路借款300萬英鎊和8月4日簽訂的浦襄鐵路借款400萬英鎊，雖然就此借款中英兩國間洽談已久，但正式簽約時間卻是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不屬本文討論範圍，故沒有列入「一覽表」。

關於實際起債額的數目一時難以精確統計，雖然筆者為此也花費了不少精力，但目前仍無法逐項落實，只是有少部分借款（主要是抗戰爆發前簽訂的幾筆鐵路借款）從檔案和其他資料中查明實際借債額，相信這些材料是比較可靠的。其他目前未能查明的借款，只好暫時仍按契約中債額計算，以後若發現有新的資料，當隨時予以修正。

在研究戰前國民政府外債政策時，還有幾個問題必須單獨提出來進行討論。

一、關於「中美航空密約」問題

^⑯ 《財政年鑑》（民國24年），頁1382。

^⑰ 鐵道部檔案二一四／996。本文所引用之檔案，凡未注明出處者，現均藏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下略。

^⑱ 提到這個問題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劉大年：《美國侵華簡史》，1950年版，頁60；劉秉麟：《近代中國外債史稿》，三聯書局1962年版，頁239；李長久等主編：《中美關係二百年》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楊蔭溥：《民國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頁65。

長期以來國內的一些著作中都提到1933年7、8月間，中美兩國政府曾簽訂的「航空密約」，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美國同意為中國擴建空軍並為其製造飛機而提供約4,000萬美元的資金，作為代價，中國則允許美國在華自由設定航線、自由降落及設置臨時降落場。^⑯這些著作在敘述這個問題時雖文字稍有差異，但內容基本相同，來源亦完全一樣，均注明引自《外交月報》第四卷第一期（民國23年1月）趙公皎「一九三三年之美國外交」一文；有些書雖未注明出處，但從內容上看估計亦源於此。

然而據筆者所知，最早披露所謂「中美航空密約」這一消息並公布其「內容」的是1933年8月4日日本東京的《朝日新聞》，隨後日本其他一些報刊亦相繼予以轉載。在中國最先透露這一消息的1933年8月9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同年9月15日出版的《外交月報》第三卷第三期則將「密約」摘譯刊登，並注明援引日本報紙。但就在日本報紙刊登這一消息的同時，中美兩國政府均分別發表聲明，公開予以否認。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在致國務院的信中則稱這個「密約」是日本「精心編造」的謊言，並對其「豐富的想像力」感到驚奇。^⑰「中美航空密約」究竟存在與否，這對於研究中外關係史、特別是研究近代外債史至為重要，因此有必要將其弄清。筆者曾圍繞這個問題查閱了有關中外檔案資料及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但均無此項記載，足以令人懷疑；將所謂「密約」的內容（諸如開放機場、購買飛機等）則與當時的實際情形不相吻合，而且簽訂「密約」這一舉動亦有違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同時從「密約」的來源上分析也有諸多破綻。因此，通過上述辨析而得出的結論是：所謂1933年7、8月間簽訂的「中美航空密約」是日本方面虛構的，其目的主要在於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以破壞當時正在進行的中美兩國之間的談判與合作。^⑱

二、關於「中德以貨易貨貿易協定」

戰前最早對中國市場表現出投資興趣的是德國，這是因為德國不是國際銀行團的成員，可以不受其共同借款條件的約束，而且德國政府積極鼓勵本國財團對華投資和貸款，並承擔70%貸款額的擔保。

1936年3月，中德兩國政府之間簽訂了一項「中德以貨易貨貿易協定」，規定德國供給中國以一億馬克的信用貸款，中國可用來購買各種出產的物品

^⑯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33, Vol. III, p. 389.*

^⑰ 詳見拙文「『中美航空密約』辨析」，載《民國檔案》1988年，期4。

（其中主要是軍火武器和工業設備），然後以中國出產的原料（主要是鎢、錫等特礦產品）來歸還。貸款的年息是五釐，中國未動用的數目不付息，已歸還的數目也不再付息。這筆貸款沒有規定清還的期限，隨時可以延長，也隨時可以結束。雙方結算都不用現款，所以叫以貨易貨。當時因害怕引起日本的破壞與干涉，所以這個協定不是經由正常的外交渠道洽談，而是透過軍方秘密進行，同時對外亦從未公佈。^②據統計，這筆貸款截至抗戰爆發之前已達美金四千萬元。^②上述信貸係斷續繼續進行，未列入「一覽表」統計，故特地予以說明。

三、關於「中美白銀協定」

在幣制改革（1935年11月）到抗戰爆發這段時間內，中美雙方曾簽訂過三次白銀協定，其中1936年5月由中國政府代表陳光甫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簽訂的「中美白銀協定」中曾規定美國將購買7,500萬中國白銀，並由紐約聯邦儲蓄銀行以中國寄存在紐約的5,000萬盎司白銀為擔保，向中國政府提供一筆為期八個月的兩千萬美金信貸，同時指明這筆信貸以後可以續定。^②當時為了避免引起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的猜忌，美國政府故意將這兩千萬美元的「信貸」稱之為「美元外匯」，而不採用「貸款」這一術語。^②因其指明是短期信貸，故亦同樣未列入「一覽表」加以統計。

綜上所述，國民政府於抗戰爆發前的十年間舉借的外債數目大約為一億美元左右，折合為英金大約是二千萬英鎊或國幣三億三千餘萬元。如果加上「中德貿易協定」和「中美白銀協定」這兩筆信貸的話，總借款額就大約為一億六千萬美元。當然這只是一個初步的估計，詳盡的統計還有待於今後的進一步研究。

② 程天放：《使德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民國56年版，頁195。

② Kurt Bloch, *Germ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40, p. 29.

② 參見拙文「中美白銀協定述評」，載《民國檔案》1986年，期2；楊格，前引書，頁272。

② Morgenthau Diary, XXIV, pp. 120, 121. 轉引自 Rossell, *American Silver Policy and China, 1933-1936*, p. 238. 拙譯中文本即將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附錄：抗戰前國民政府舉借外債一

序 號	借 款 名 稱	簽 約 時 間	債 務 者	債 權 者
1	華比六厘英金公債	1928. 7.	財 政 部	中比庚款委員會
2	北寧路墊款	1928.	鐵 道 部	(英資) 開灤煤礦
3	洮昂鐵路車輛墊款	1928.	鐵 道 部	日本南滿鐵道會社
4	洮昂鐵道借款	1928.	鐵 道 部	日本南滿鐵道會社
5	首都自動電話借款	1928. 11.	交 通 部	中國自動電話公司
6	上海自動電話借款	1929. 6.	交 通 部	中國自動電話公司
7	武漢自動電話借款	1929. 6.	交 通 部	德國西門子電機廠
8	滬寧路購車墊款	1929. 6. 21.	鐵 道 部	中英銀公司
9	中法實業借款提用餘額保 息	1930. 2. 19.	財 政 部	中法工商銀行
10	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借款	1930. 4. 29.	財 政 部	中法工商銀行
11	美麥借款	1931. 9.	財 政 部	美國糧市平價委員會
12	導淮二年施工計畫借款	1931. 10.	導淮委員會	?
13	電氣事業購料借款	1931. 10—11.	建設委員會	中英庚款董事會
14	擴充首都電廠線路借款	1931. 11.	建設委員會	中英庚款董事會
15	歐亞航空公司三次機械借 款	1931. 12. 1933. 9. 1934. 3.	交 通 部	德國漢莎航空公司
16	首都輪渡工程及材料借款	1931. 12. 23.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17	平漢鐵路短期借款	1931.	鐵 道 部	法國東方匯理銀行
18	平漢路透支	1931.	鐵 道 部	英國麥加利銀行
19	平漢路透支	1931.	鐵 道 部	比國華比銀行
20	粵漢路廣韶段借款	1931.	鐵 道 部	美國慎昌洋行
21	粵漢路廣韶段借款	1931.	鐵 道 部	日本臺灣銀行
22	粵漢路廣韶段借款	1931.	鐵 道 部	日本華南銀行
23	粵漢路廣韶段借款	1931.	鐵 道 部	英國華商銀行
24	膠濟鐵路購料墊款	1932. 3. 8.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25	中央機器廠開辦經費借款	1932. 7. 29.	實 業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26	粵漢路株韶段測量借款	1932. 7. 30.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27	粵漢路韶樂段分段工程借 款	1932. 8. 31.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覽表 (1928.7—1937.6)

債額	實際起債額	年息備	注
美金5,000,000元	美金5,000,000元	6 %	
銀圓30,000元	銀圓30,000元	?	
日金2,850,775元	日金2,850,775元	?	
日金828,770元	日金828,770元	?	
美金730,198元	美金730,198元	8 %	
美金570,000元	美金570,000元	7 %	
美金926,000元	美金926,000元	7.5 %	
英金156,000鎊	英金152,131鎊	8 %	
法金2,333,608法郎	2,333,608法郎	5 %	
銀圓914,927元	銀圓914,927元	5 %	
美金265,000元	美金265,000元	6 %	
美金10,000,000元	美金9,212,827元	4 %	
銀圓1,080,000元	銀圓1,080,000元	5 %	
英金140,000鎊	英金140,000鎊	5 %	
銀圓100,000元	銀圓100,000元	5 %	
德金782,000馬克	德金782,000馬克	7 %	
英金200,000鎊	英金200,000鎊	5 %	
銀圓174,987元	銀圓174,987元	?	
銀圓119,676元	銀圓119,676元	?	
銀圓81,104元	銀圓81,104元	?	
港洋27,000元	港洋27,000元	?	
毫洋11,000	毫洋11,000	?	
日金60,000元	日金60,000元	?	
毫洋22,989元	毫洋22,989元	?	
港洋41,594元	港洋41,594元	?	
英金350,000鎊	英金350,000鎊	5 %	
英金123,200鎊	英金123,200鎊	5 %	
銀圓176,000元	銀圓176,000元	5 %	
銀圓700,000元	銀圓700,000元	5 %	

序 號	借 款 名 稱	簽 約 時 間	債 務 者	債 權 者
28	津浦鐵路購料借款	1932. 10. 20.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29	粵漢路湘鄂段購料借款	1932. 10. 20.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30	粵漢路株韶段購料墊款	1932. 10. 20.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31	粵漢路廣韶段購料墊款	1932. 10. 20.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32	添購國際電臺借款	1932. 12.	交 通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33	增借首都輪渡料款	1933. 2. 10.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34	鐵道部購料借款	1933. 3. 6.	鐵 道 部	法國巴黎工業電機廠
35	美國棉麥借款	1933. 5. 29.	財 政 部	美國金融復興公司
36	招商局改進航業借款	1933. 5.	交 通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37	粵漢路廣韶段購料墊款	1933. 6. 29.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38	完成粵漢鐵路借款	1933. 7. 28.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39	招商局購置海輪借款	1933. 8.	交 通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40	購辦有線電話材料借款	1933. 8.	交 通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41	無線報話機材料借款	1933. 11.	交 通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42	導淮施工續借款	1933. 12.	導淮委員會	?
43	杭(州)玉(山)段購料借款	1933. 12.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44	滬杭甬鐵路購車墊款	1934. 2. 28.	鐵 道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45	玉(山)南(昌)鐵路借款	1934. 3. 14.	鐵 道 部	德國奧托華爾夫公司
46	招商局借款	1934. 3.	交 通 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47	擴充首都電廠線路續借款	1934. 4.	建設委員會	中英庚款董事會
48	導淮及修建邵伯閘借款	1934. 7.	導淮委員會	中英庚款董事會
49	導淮借款	1935. 1. 12.	導淮委員會	沙遜洋行
50	隴海路陝安段工程借款	1935.	鐵 道 部	比國鐵路公司
51	隴海路荷公司尋常帳	1935.	鐵 道 部	荷蘭建築海口公司
52	隴海路荷公司墊付帳	1935.	鐵 道 部	荷蘭建築海口公司
53	隴海路比公司墊款	1935.	鐵 道 部	比國鐵路公司
54	隴海路比公司金鎊墊款	1935.	鐵 道 部	比國鐵路公司
55	汴洛鐵路比公司尋常帳	1935.	鐵 道 部	比國鐵路公司
56	完成隴海路西寶段借款	1935.	鐵 道 部	法國巴黎工業公司
57	浙贛路南萍段借款	1936. 2. 11.	鐵 道 部	德國奧托華爾夫公司
58	完成滬杭甬鐵路借款	1936. 5. 8.	鐵 道 部	中英銀公司 中國建設銀公司
59	平漢路道楚段借款	1936. 6.	鐵 道 部	中福煤礦公司

債額	實際債額	利率(年)	備注
英金240,000鎊	英金240,000鎊	5%	
英金110,000鎊	英金115,710鎊	5%	
英金30,000鎊	英金30,000鎊	5%	
英金30,000鎊	英金30,000鎊	5%	
英金50,000鎊	英金50,000鎊	5%	
英金16,000鎊	英金16,000鎊	5%	
法金50,000,000法朗	法金50,000,000法朗	?	
美金20,000,000元	美金17,086,282元	5%	原借款為50,000,000美元
英金360,000鎊	英金360,000鎊	?	
英金100,000鎊	英金100,000鎊	5%	
英金1,500,000鎊	英金1,500,000鎊	5%	一說簽約時間為 1934. 6. 1.
英金169,150鎊	英金169,150鎊	?	
英金20,000鎊	英金20,000鎊	5%	
英金48,000鎊	英金48,000鎊	5%	
銀圓2,170,000元	銀圓2,170,000元	5%	
英金140,000鎊	英金140,000鎊	?	
英金30,000鎊	英金30,000鎊	5%	
國幣8,000,000元	國幣8,000,000元	7%	
銀圓400,000元	銀圓400,000元	5%	
英金400,000鎊	英金400,000鎊	5%	
銀圓3,250,000元	銀圓3,250,000元	?	
英金238,000鎊	英金238,000鎊	6%	
比金16,760,430法朗	比金16,760,430法朗	?	
荷金491,186弗羅令	荷金491,186弗羅令	?	
荷金1,324,775弗羅令	荷金1,324,775弗羅令	?	
比金72,837,239法朗	比金72,837,239法朗	?	
英金18,117鎊	英金18,117鎊	?	
比金3,892,094法朗	比金3,892,094法朗	?	
國幣10,000,000元	國幣10,000,000元	?	
國幣10,000,000元	國幣10,000,000元	7%	
英金1,100,000鎊	英金1,100,000鎊	6%	
國幣600,000元	國幣600,000元	?	

序號	借款名稱	簽約時間	債務者	債權者
60	寶成鐵路借款	1936. 8. 25.	鐵道部	比國鐵路電車公司
61	平漢路江橋借款	1936. 11.	鐵道部	德國西門子公司
62	京贛鐵路借款	1936. 12. 1.	鐵道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匯豐銀行 怡和洋行
63	湘黔鐵路借款	1936. 12. 5.	鐵道部	德國愛森鋼鐵公司等
64	成渝鐵路借款	1936. 12. 7.	鐵道部	法國銀團代表 中法工商銀行
65	杭玉段掉換重軌借款	1937. 1.	鐵道部	捷克鋼鐵公司
66	完成粵漢路及補充設備借款	1936~1937?	鐵道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67	廣東港河工程借款	1937. 4.	鐵道部	荷蘭治港公司
68	粵漢路購車借款	1937. 4.	鐵道部	美國進出口銀行
69	京滬鐵路改善設備借款	1937. 6. 1.	鐵道部	中英銀公司
70	株州機車廠借款	1937.	鐵道部	中英庚款董事會 英商萬泰公司
71	鐵路車輛材料借款	1937.	鐵道部	德國克虜伯廠等
72	浙贛路枕木借款	?	鐵道部	怡和洋行

一、編製說明：

- 1.借款均以簽約時間為順序排列，凡簽約無明確月份者，則排在該年度最後。
- 2.凡已查明實際起債數額者均加以注明，其餘則暫按簽約數額填寫。
- 3.為便於計算，債額一律採整數。
- 4.本表所引檔案資料，均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二、資料來源（按序號排列）：

1.賈德懷：《民國財政簡史》，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六年版，上冊，頁297；《中國外債匯編》，民國二十四年，頁8；雷麥：《外人在華投資》，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頁490-491；銀行公會編，《民國經濟史》民國三十七年版，頁171。

2.～4.陳暉：《中國鐵路問題》，三聯書店1959年版，頁69-70表。

5.～7.《財政年鑑》（民國二十四年），頁1500。

債	額	實	際	超	債	額	年	息	備	注
比金450,000,000法朗				?			6 %		抗戰前未提供借款。	
國幣10,000,000元				?			6 %		抗戰爆發後合約取消，已借債款數目不明。	
英金450,000鎊	英金450,000鎊						5 %		抗戰爆發後，部分借款	
英金450,000鎊	英金450,000鎊						6 %		為湘桂路衡桂段移用，補簽合約。	
法幣30,000,000元	法幣3,600,000元						6 %		抗戰爆發後德方即停止供貨。	
法幣34,500,000元	法幣595,000元						7 %			
	法金31,066,906法朗									
法幣6,000,000元	海關金2,334,363單位						6 %		一說簽約時間為 1936.	
								11.		
法幣1,500,000元	法幣1,500,000元						?			
英金260,000鎊	英金260,000鎊						?			
美金2,000,000元	國幣1,098,587元						6 %		一稱黃浦碼頭借款	
美金1,466,400元	美金1,466,400元						6 %			
英金800,000鎊	英金101,602鎊						6 %			
英金30,000鎊	英金30,000鎊						?			
英金120,000鎊	英金120,000鎊						?			
英金384,763鎊	英金384,763鎊						6 %			
國幣909,650元	國幣909,650元						?			

8. 鐵道部編：《中國鐵路外債合同匯編》，民國二十六年版，上冊，頁145-150；鐵道部檔案，二一四／996。

9. 《財政年鑑》（民國二十四年），頁1421。

10. 同上；楊格：《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頁491。

11. 《財政年鑑》（民國二十四年），頁1422。

12. 同上，頁1509。

13. 14. 同上，頁1508。

15. 同上，頁1506-1507。

16. 《中國鐵路外債合同匯編》上冊，頁160-162。

17.~23 陳暉：《中國鐵路問題》，頁69-70表。

24. 《中國鐵路外債合同匯編》上冊，頁429-430。

- 25.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三冊，頁891；《銀行周報》第十七卷第三期。
- 26.《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匯編》下冊，頁56-58。
- 27.同上，頁66-67。
- 28.同上，上冊，頁312-314。
- 29.同上，下冊，頁50-52。
- 30.同上，頁53-55。
- 31.同上，頁60-61。
- 32.《財政年鑑》（民國二十四年）頁1500。
- 33.《中國鐵路外債合同匯編》上冊，頁167-168。
- 34.鐵道部檔案，二一四／1047。
- 35.「經理美貸棉麥事務處報告」，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見財政部檔案三②／2555。
- 36.《鐵道年鑑》（民國二十四年）「航政篇」，第二章，頁28。
- 37.《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匯編》下冊，頁63-65。
- 38.同上，頁70-80；沈雷春：《中國金融年鑑》民國二十八年版第一章，頁68及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頁668-669則認為借款時間是1934年6月1日。
- 39.《鐵道年鑑》（民國二十四年）「航政篇」、第二章、頁28。
- 40.～41.《財政年鑑》（民國二十四年）頁1500-1501。
- 42.同上，頁1509。
- 43.凌鴻勛：《中國鐵路志》臺北，民國四十三年，頁235。
- 44.《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匯編》上冊，頁199-201。
- 45.同上，頁228-231。
- 46.《財政年鑑》（民國二十四年）頁1506。
- 47.同上，頁1508。
- 48.財政部檔案三②／2762。
- 49.《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 50.～55.陳暉《中國鐵路問題》頁69-70表。
- 56.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版，頁89。
- 57.同上，頁52；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294頁、頁668-669。
- 58.《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匯編》上冊，頁202-212；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頁54-56。鐵道部財務司編《國有鐵路債務節略》臺灣學生書局民國59年影印版，頁401。

- 59.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頁89。

60.《民國經濟史》頁174；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頁301、頁668-669。但實際上借款簽訂後直至抗戰爆發，比方並未提供任何墊款，參見楊格：《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頁416。

61.《民國經濟史》頁171；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頁86。該借款後因戰爭爆發而終止，參見楊格：《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頁413。

62.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頁190；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頁668-669；鐵道部檔案二一四／370。

63.《民國經濟史》頁171，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頁295。實際借款額見楊格、《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頁413。

64.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頁57-63；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頁174；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頁668-669。實際借款額見鐵道部檔案二一四／370。

65.羅從豫：「我國鐵路債款概述」，《中行月刊》卷14期5-6（民國二十六年五六月）；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頁87；《民國經濟史》頁171。實際起債額見鐵道部檔案，二〇②／1264。

66.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頁88。

67.《民國經濟史》頁171；實際借債額見鐵道部檔案二一四／370。

68.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頁88-89。

69.鐵道部檔案二一四／370；二〇②／1264。

70.張公權：《抗戰前後中國鐵路建設的奮鬥》頁89-90。

71.同上，頁90。

72.鐵道部檔案，二〇②／1264。

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專刊六種

(2)黃嘉謨著	甲午戰前臺灣之煤務	精140元	平90元
(3)李國祁著	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	精120元	平70元
(4)呂實強著	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	精140元	平90元
(9)王爾敏著	清季兵工業的興起	精120元	平70元
(5)張瑞德著	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	精250元	平200元
(58)陳慈玉著	近代中國的機械織絲工業	精350元	平300元
函購七折，郵撥 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最近美國的民國史研究：國民黨治下的中國

William C. Kirby 著*

賴惠敏・張力 譯**

要特別寫出一篇近年美國的中華民國史研究之貢獻，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這方面較為出色的著作，必須仰賴中國大陸、臺灣、日本、西歐等地區學者的研究成果。關於民國史研究的最新趨勢，在於歐、亞、美三洲的學者彼此接觸機會較前頻繁。像北美學者十分重視的亞洲學會年會，最近幾年也有愈來愈多來自歐亞兩大洲的同行熱烈參加。

不過美國民國史研究的特點，即在其越來越集中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某一主題或區域的專題研究。換句話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及中華民國在臺灣重建的四十年後，美國研究二十世紀的中國，仍以一九四九年為主要分界點。

不僅美國如此，臺灣海峽兩岸學者受到政治上的壓力，也多半強調一九四九年為分界點。美國學者的研究也同樣受到現實政治與學派政治兩方面的影響。對他們而言，一九四九年區分了歷史與政治學的研究範疇，民國史學者的師承及其研究方法不同於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學者；而研究「當代」臺灣的學者則形成了第三個領域。這對美國的二十世紀中國研究有些意義，因為過去幾十年來研究國民政府或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運動，主要也是依循個別的學術方向，而兩者都認為一九四九年為一大「轉折」。他們相信一九四九年以前國民政府的歷史和一九五〇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研究，並無特別關連。就像所有關於大革命之研究一樣，以及一九四九年前後事件相關性之愈來愈明顯，上述之情形必將有所改變。①不過到目前為

* 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教授，1989 至 1990 年於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客座一年。

** 賴惠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力，近史所助理研究員。本文原題為 “Recent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Republican China, Part One: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刊於日本東京出版之 [近きに在りて] 第 16 號 (1989.11)。原作者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教授及 [近きに在りて] 主編野澤豐教授慨允翻譯轉載，特此致謝。

① 一九八九年亞洲學會年會中一個分組討論會主題為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Transition from Nationalist to Communist Rule” 及一九九〇年將在美國舉行名為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ate”的史學會議，可見一斑。

止，尚無一位像 Tocqueville 的人物，將中國革命視為舊王權的瓦解，至少美國還沒有這樣的人。

不過這並不是說沒有值得一提的著作，以下介紹美國學者研究民國史的重要貢獻；至於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活動之研究，將由韋思諦（Stephen Averill）教授另文介紹（編按：預定於下期本刊刊出）。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研究，過去主要的工作在於確認社會的支持造成了共黨的茁壯，而對於國民黨政府，則一直集中在一九五〇年代所提出的國民黨政府為何垮臺的政治問題上。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所有專書的研究所得到的答案在於（一）拓展了我們對於國民政府期史實和資料的瞭解；（二）界定國民政府的「本質」。②

事實上「國民政府本質」的爭議，可以回溯到一九二〇年代晚期之後，中共和蘇聯分析南京政府的階級基礎時，通常將之視為代表鄉村地主和城市資本家的利益。沿襲這種說法且深具影響力的學者是伊羅生（Harold Isaacs）。③但目前很少學者還固守此一論調，美國則根本沒有。④如今這方面研究的兩位權威學者易勞逸（Lloyd Eastman）和柯博文（Parks Coble），都認為國民政府並沒有階級基礎，而基本上幾乎是由軍隊為支撐的中國社會中的自主力量。

無可否認地，要證明南京政府不受制某些特殊的社會團體之外，的確要比指出其確實獨立自主於所有社會團體之外要容易。柯博文證明南京政府與上海資本家形成對立的關係；孔復禮（Philip Kuhn）在研究抗戰前十年的地方政府時，特別強調了南京政府的強化中央的要求與鄉村社會的地方菁英有一種緊張關係。⑤ Prasenjit Duara 有關華北農村的佳構又將孔復禮的結論加以發揚光大。⑥然而 Bradley Geisert 和 Richard Bush 的博士論文則指出國民政府在其他地區亦受到某些特殊利益團體的壓力。傅士卓（Joseph

② 美國研究南京政權的專家 Lloyd Eastman 在其論文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The History Teacher*, 19, no 4 (Aug. 1986), 545-557. 中，作了精彩的討論

③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 Rev.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④ Kuo Heng-yu, *Die Komintern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Berlin, 1979) 是其中之一。

⑤ 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hilip A. Kuhn, “Local Self 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收於 F. Wakeman and C.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1975).

⑥ 見其所著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Fewsmith) 將南京政府解釋為「協合式」的政權，這對「自主模式」派解釋的最大打擊。^⑦

傅士卓將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和莫索里尼的義大利與佛郎哥的西班牙加以比較，可以看作是對民國時期所引進的政治形態角色相關討論的一部分。對於國民政府，許多學者特別從一九三〇年代某些人所觀察到的「法西斯」趨向加以注意。易勞逸早先論斷藍衣社組織是一種法西斯「運動」，筆者質疑了這種說法，指出我們最多只能說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對部分中國領導人及部分組織的模仿努力，有些觀念和政治上的影響。但中國並沒有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同樣地也缺乏「協合主義」的基礎。

確實，南京政府裡獨樹一格的中國「法西斯主義者」全然無法瞭解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因素——他們想要模仿已經建立的法西斯政權，而不是協助他們掌權的運動——，這就說明了南京政府中的許多人認為自己是中國社會裡自主的領導力量，要從上到下建立秩序。^⑧如同 William Wei 在他的江西省「反革命」研究中指出，地方對於建立社會秩序的努力是「由上而下」，並非基於外國傳入的思想。^⑨

當然，政權的「本質」必定和其行動與政策有些相似之處。近十年來學者大都相信就國家經濟政策而言，南京政府是一個採取干預手段且以發展為己任的政權，決心要在國家計劃和控制之下，重建中國的經濟主權，讓中國現代化，並成為全球經濟的一部分。從這個觀點來看，國民政府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法西斯主義甚少雷同之處，而比較像戰後東亞的開發國家，國民政府即可視為這些國家的先驅。雖然國民政府的政策對整個中國經濟的衝擊仍然不是很清楚。^⑩但從絲織到鋼鐵等工業的研究可以發現，政府的經濟政策非常重要，這個一直在臺灣官修史書中誇大描述的觀點，就得到一些佐證。^⑪早期研究南京政府的經濟作為，都將之描述為頭號的胡搞與貪污腐

⑦ 見 Geisert, "Power and Society: The Kuomintang and Local Elites in Kiangsu Province, China, 1924-1937,"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博士論文；Richard Bush, *The Politics of Cotton Textile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New York, 1982); J.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waii, 1985).

⑧ 見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 China* (Stanford, 1984), ch. 6.

⑨ W. Wei,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Ann Arbor, 1986).

⑩ Thomas J. Rawski 所著國民政府經濟一書，預計 1989 年秋出版。

⑪ 見 Terry Weidner, "Local Political Work under Nationalists: The 1930's Silk-Reform Campaign" 及 W. Kirby, "Kuomintang China's Great Leap Outward: the 1936 Three-Year Plan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兩文均收於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Urbana, 1983).

敗，而最近的研究中，有些運用了新近開放的檔案，看出了國民政府相當的努力。這個論點對那些正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官僚中發現一九五〇年以後臺灣的成功，早已在大陸國民政府時期顯現出來的學者而言，自是特別重要。¹² 雖然最近舉行的兩次學術會議的論文可能展開了上述的有關研究，但國民政府在國際經濟政策上的成就，包括關稅自主、治外法權的收回、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第一次接受中外合作投資，一直未受到美國史學界的重視。¹³

一九三〇年代末至一九四〇年代初，國民政府處於危險的國際環境和對外關係中的努力，值得更多的尊敬，這在過去的幾年之中，是美國學者的主要研究領域。但是他們很少想到國民政府是加入近代國際政治聯盟中的第一個中國政府。它和德、蘇、美等三個世界最強的國家聯手，以便對付第四個強國日本，關於這些關係的中文檔案開放後，將會看出更大的成就，德國、美國的檔案早已開放，蘇聯的檔案大都仍是不能加以利用。在中蘇關係的研究方面更為正確，因為 John W. Garver 重要的新發現，就是這項研究的代表。筆者關於中德關係的研究，著重於廣大層面中國和德國菁英分子的角色，為合作提供了基礎。Garver 指出了最高層領導人，特別是蔣介石和史達林，如何決定了中蘇關係。我們從他的書中看出蔣介石是一位善用機會的精明談判者，他的外交成就和他實際的軍事力量不成比例。他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間獲得大量的蘇聯軍援，一九四三年從蘇聯的影響力中爭回了新疆，利用美國迫使蘇聯在二次大戰末期承認中國為「強國」之一，這些成就都是書中的重點，因此該書是極少數把蔣介石當作一位國際政治家來嚴肅處理的美國史學著作之一。¹⁴一旦蘇聯開放關於國民政府的檔案，有關的官員也可接受訪問，是否 Garver 的結論依然如此，仍有待觀察。不過 Andrew D. W. Forbes 對於新疆地方與省控制的鬭爭記載，至少可以支持 Garver 的論證。¹⁵

¹² 兩種截然不同的例子，見 A. J. Gregor, et al.,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Sun Yat-se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Berkeley, 1981), 及 W. Kirby,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Nationalist Industrial Policy and its Heirs* (Stanford, 即將出版) Laurence Schneider 有關中央研究院歷史與傳統的論文，於1989年3月的美國亞洲學會年會中宣讀。

¹³ E. May and J. K. Fairbank, ed., *American'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1986), and H. Harding, ed., *Pattens of Cooperation in China's Modern Foreign Relations* (安排出版中)。

¹⁴ J.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45* (Oxford, 1988).

¹⁵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雖然最近出版的兩本美國外交的專書，有助於我們瞭解民國成立初期和一九四〇年代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⑯但是有關中美關係最重要的近作，並非那些總是討論個人角色的高層政治範疇，前述由 May 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合編關於中美貿易的書，概述了最近美國有關一九四九年以前中美一般和特殊貨品貿易的研究，且著重於其有限的歷史衝擊。Rondall Stross 有關美國農業專家在中國的研究，顯示在缺乏更廣泛的社會變遷情況下，外國協助的科技進展效果不彰，此一論點與早期由 James Thompson 和 Peter Buck 所作相關主題研究之結果相同。^⑰而由 William Hass 和江勇振（Yung-chen Chiang）分別從事關於美國基金會資助中國發展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這兩本論文尚未出版。^⑱

中美外交論題之外，另有兩種關於中美教育交流的有意義研究。由 Joyce Kallgren 和 Denis Simon 合編的 *Educational Exchanges*，^⑲收錄了過去幾種重要的美中文化關係的研究。雖然多數研究是討論過去十年中的交流，不過 Mary Bullock 對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留美學生的考察，把最近之事放在歷史觀點中討論，指出早期交流的形態為一九七八年以來教育合作的快速成長，奠定了基礎。由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所出版的一本關於當前交流情形的更詳盡的研究（約有五十個表，並以量化處理），雖僅以數頁提及早期的研究，^⑳卻對未來的歷史學者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

另外兩本書則是關於在中美合作和衝突最激烈的時期，為美國人民解釋中國現況的新聞記者。這些書特別為我們增添了一般的「中國報導」知識，

^⑯ Daniel M. Crane and Thomas A. Breslin, *An Ordinary Relationship: American Opposition to Republican Revolution in Ch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86); Edwin W. Martin, *Divided Counsel: The Anglo-American Response to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⑰ R. E. Stross, *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1937* (Berkeley, 1986); James Thomp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Cambridge, Ma., 1969); Peter Buck, *American Science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1983).

^⑱ 見其最近的哈佛博士學位論文 Yung-chen Chiang, "The Social Sciences in Modern China: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Chinese Academic Enterprise," 及 William Haas, "Gist Gee: A Life in Science and in China."

^⑲ Joyce K. 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n, eds.,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7).

^⑳ David M. Lampton, et al.,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 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以及其中一位最多采多姿的駐華記者的生活，那就是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②

「中國報導」（*China Reporting*）原是由參加一項一九八二年的會議之記者、外交官和學者，所彙集而成的口述歷史。他們都具有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直接報導中國事務的經驗和知識。讀者不僅可以閱讀到這些駐軍記者的「集體回憶」，也讀到了編者精闢的評論。約二十位的與會者原在中國擔任記者，儘管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中國革命的速度和範圍令這些「中國通」以及美國政府甚感驚訝，不幸他們從無內省，更別說自我批判了。然而歷史學者回顧這段期間的報導也有同樣的困擾，因為多數記者住在國民黨控制的城市之中，其報導也多為這些地區的事務。絕大多數派駐中國的記者，本身缺乏背景，不懂中文，他們認為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正如編者所言，如果語言能力本身不能保證寫出好的新聞報導，那麼少數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的當時新聞報導，其報導者確具有相當程度的語言和專業知識。

史沫特萊的作品在今日比當時更受人注意，她一生獻身政治活動，同情中國共產革命，後來還受封為國際「中國之友」人士，這些都使得關於他的早期作品政治化了，到現在才有傳記作家能够公平地面對她複雜的一生。

當代美國職業史家很少利用傳記，不過 Janice R. Mackinnon 和 Stephen R. Mackinnon 却為我們這一時代寫下了史沫特萊的一生。此書把史沫特萊放在美國的環境中來看，將之視為「美國的激進分子」，對她成就事業的歐亞政治形勢描述甚詳。這也是記述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極佳著作。

因此史沫特萊被刻劃成永不疲倦、才氣煥發、暴烈且自我教育的知識分子，並以窮苦受壓迫人們的「自由鬥士」而自我期許，史沫特萊憑藉其生花妙筆維生，在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間，報導全球各地的新聞。不過他的作品常帶有一種今日所稱的「具人性的社會主義」的政治使命感。她選擇自己的朋友和敵人，而這兩種人間也不乏一些相當有意思的人，在一九五〇年她去世時，如果她的敵人多於朋友，這並不表示史沫特萊改變了，而是兩次大戰間，新正統的反共理念摧殘了政治知識界活力，Mackinnons 的貢獻就是用那個時代背景來襯托她的生命。

我們再看有關國民政府時期社會史的研究，最近分別由 Gail Hersha-

^② 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1987); 及 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1987).

tter 和 Emily Honig 完成出版的專書，^㉒對中國勞工史和城市史的研究貢獻卓著。這兩本書都充分利用了檔案和訪問資料，翔實敘述了地方的歷史。兩位作者費盡苦心解釋某些事情為何「沒有」發生，也就是說他們所研究的城市工人為何沒有特別的階段意識，對政治運動也不響應；簡言之，這些工人未更扮演馬克斯史家所希望的角色。相對於勞工政治平穩，生活上飽受暴力文化的滲透，結合了貧困和城市幫派。Honig 強調勞工擔憂地方不良份子的掠奪比「資本家的剝削」或「帝國主義」更甚。甚至就戰爭對上海女工所引發的政治意識而言，基督教青年會的角色比中共還要重要。Hershatter 和 Honig 的結論與 Alain Roux 相去不遠，Roux 比較1926至1927年及1946至1947年上海勞工運動，是今年亞洲學會年會的佳構，我們從該文中看到1926至1927年勞工運動的明顯力量，也是近代史無前例的勞工運動。^㉓

從本文過渡到下篇韋思諦教授有關1949年以前中共運動最近論著總評的一個好途徑，就是利用 Steven I. Levine 研究國共在東北消長的力作。^㉔這份研究將會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歷史的重要著作。該書以學術觀點不偏不倚重提了「誰丟掉大陸？」的爭論，認為戰後初期美國若是更斷然涉入，則國民黨政府或可在東北倖存，甚至整個國家亦可渡過危機。Levine強調中國內戰在東北決定勝負，而且是以傳統戰爭形式決定的。共產革命在當地並非農民革命，而是以城市為基地動員了城市與鄉村的力量來為軍事、政治服務的政治運動。共產黨動員資源比國民黨既快且好，並能將之有效運用於軍事策略上。Levine 從美蘇對抗的觀點來描述此事，他掌握了海峽兩岸中國及美國、蘇聯的資料，使我們瞭解東北之爭奪在地方、全國、乃至國際性層面之問題，此為本書最大貢獻。

^㉒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1986);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1986).

^㉓ 論文宣讀於1989年3月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亞洲學會年會，

^㉔ Steven I.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史料介紹

山東文史資料的內容分析

張玉法*

一、前　　言

傳統的史學，以帝王將相為研究的主題，較重視中央政府所留下的史料；近代史學，愈來愈重視社會史的研究，地方史料也愈來愈受重視。中國的史學傳統，國史與地方史雙向發展，國史由中央政府設專職機構或委專人修纂，地方史則由地方官或地方士紳設法修纂。國史著名的有二十五史，方志據1935年朱士嘉採錄，已得五千八百三十二種，最早的一種，修於北宋神宗熙寧年間，最晚的一種，修於1933年，先後八百六十餘年間^①，平均每年所修將近八種。

地方志主要包括省志、府志、州志、縣志，各種志書，資料豐富，有輿地、建置、職官、學校、選舉、災荒、風俗、人物等方面的材料，是研究社會史的良好材料。民國時期的方志，除朱士嘉書中所收者外，陸續發現者不少，1933年以後新修者亦多。近數十年來，臺灣史學界為搜集地方史資料，臺灣省市文獻會及大陸各省來臺人士創辦地方文獻刊物甚多，據1986年統計，已有六十五種，著名者有臺灣文獻、浙江文獻、湖北文獻、湖南文獻、四川文獻、山東文獻等^②。除臺灣省市文獻外，其他全為各省人士捐錢印行。中共在大陸對地方史的研究極為注意，以山東史而論，在1979至1985年的七年間，共發表論文約五百篇，出版專書十餘種，研究的範圍包括東夷古國史的研研、經濟史的研究、農民戰爭史的研究、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人物研究、孔府研究等^③。另外，山東地方人士對山東地方志的整理，也不遺餘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① 朱士嘉「中國方志綜錄」，上海商務，1935年。

②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手冊（1986年6月）。

③ 逢冬時「近年來山東地方史研究概述」，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編「報刊資料選匯」，1986年5月號。

力，除已出版烟台市志等書外，王桂雲編有「山東方志匯要」一書，全書約五十萬字，分別介紹歷代纂修的山東方志九百餘種（尚存者六百餘種）^④。中共對地方史的研究和對方文獻的徵集，大部是由官方推動的。在文獻徵集方面1959年4月，中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號召各方面的老人「把親身經歷記錄下來傳之後代」，其後不僅政協全國委員會及各省委員會均成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類似的組織於三年之內在縣市級也發展到三百七十多個單位。它們的工作是向曾經在晚清、北洋、國民政府時期具有各方面親身經歷和見聞的人徵集回憶錄，以充實近代中國社會史料，並整理出版^⑤。在這種情況下，近二十餘年來，中共乃能以出版「文史資料」聞名於中外史學界。截至1986年7月，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已出版一〇六輯；截至1982年，四川文史資料已出版廿七輯；截至1983年，天津文史資料已出版廿五輯；截至1983年，浙江文史資料已出版廿四輯；截至1983年，甘肅文史資料已出版十五輯；截至1982年，貴州文史資料已出版十一輯；截至1983年，河北文史資料已出版十輯；截至1983年，河南文史資料已出版八輯。本文所分析的山東文史資料不過為其中之一。全國政協所出版的文史資料，亦有省區性的資料，如1981年8月所出版「文史資料選輯」載有冰鍾的「中華革命軍山東討袁始末」和辜仁發的「中華革命軍山東反袁戰爭親歷記」，無法一併分析。

除出版文史資料外，各省尚有許多地方性的史料或專書出版，在方志資料方面，如山東於1982、1983年各出版「山東史志資料」兩輯，湖南至1982年已出版「湖南省志」兩卷；在地方史方面，僅1983年就出版有「浙江近代史」、「重慶開埠史」、「黑龍江省史探索」、「雲南簡史」、「開封史話」等書。

本文擬以山東文史資料為個案，研析中共「文史資料」的性質，並探究此類地方史料，在研究國史中的重要性。

二、山東文史資料的徵集與處理

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研究委員會對文史資料的徵集和處理，訂有辦法，

^④ 「山東方志匯要」徵訂啟事，作者寄發。王桂雲另與魯海合著有「山東地方志縱橫談」（吉林，1985）一書，約二十萬字。

^⑤ 關於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政協山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頁203～204。

政協山東委員會文史研究委員會對徵稿範圍有廣泛的列舉。

徵稿範圍初訂於1963年7月，次年六月曾修訂，徵稿範圍，在時間的涵蓋上分為兩個時期，甲午戰後至民國建立為第一時期，民國建立至1949年為第二時期。第一時期共二十八個子題，以義和團、辛亥革命、帝國主義侵略為重點，有些子題很具體，如「德帝國主義對青島的殖民統治」；有的子題不過略示範圍，如「山東地區的長槍會、丘莘教、文賢教、白蓮教、同善社、孔道會、大刀會的材料」。第二時期共二百零捌八個子題，分為六類，計政治方面七十題，以張宗昌、韓復榘及抗戰期間日本對山東的統治為重點；軍事方面三十九題，以抗戰勝利前後國共軍事衝突為重點；經濟方面六十二題，以各類工業發展為重點；文化教育方面二十題，以學校史料為重點；宗教方面十三題，以基督教的傳佈為重點；民族與華僑方面七題，以僑居海外的山東人為重點。大部子題很具體，如「韓復榘被殺始末」、「濟南的官僚資本企業」、「基督教與齊魯大學」；有些子題不過略示範圍：如「山東紡織業史料」、「各地著名書院史料」。除分兩個時期列二百三十六個子題外，另特別徵集四十四位與山東有關的人物傳記資料，包括梁漱溟、孫美瑤、袁世凱等^⑥。所擬各徵稿子題，極少涉及純粹的中共的活動，文史資料為政協所出版，而政協為統戰機關，主要對象是中共以外的人，而有關中共的史料，中共另設專責機構搜集，無需政協插手。

徵稿原則，依照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所提示的意見，有所謂「三要」、「四不」、「三給」的原則。所謂「三要」，是要真實、要具體、要大膽直書，基本精神在於要求撰稿人破除顧慮，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按照歷史事實敍述，不增飾、不廻護、不任情褒貶。所謂「四不」，是撰述史料可以不限體材（語體文言、長篇短篇皆可）、不求完整（知多少寫多少，不一定首尾完整）、不拘觀點（不要求撰稿人一定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撰寫史料）、不扣帽子（不因撰稿人揭露歷史上的某些真相而使其擔負政治上、法律上的責任）。所謂「三給」，是對撰稿人給以稿酬（稿酬有鼓勵作用）、在撰稿工作上給以必要的幫助（如當事人只能口述，不會寫稿，即找人代為記錄）、處理稿件時對撰稿人所提的要求（如要求保密，要求不發表，或要求不用本人名義發表等）給予尊重^⑦。

^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徵集文史資料參考題目，政協山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233～245。

^⑦ 同註^⑤，頁205～206。

徵得的稿件，除經整理、保管、和核發稿酬之外，就是選擇好的稿件，加以審訂和出版。選稿的原則主要有三：(1)有史料價值：是指所述事實，同當時的重要歷史事件和社會動態相聯繫，而不是無關宏旨、不足以說明問題的日常生活瑣事。(2)真實具體：是指撰稿人對歷史事實的關鍵問題及其曲折隱微的真相，能破除顧慮、真實記述，無所隱諱誇飾。(3)為第一手資料：指所述內容為撰稿人親自參與的活動、親自看到或聽到的事實，而不是出於道聽途說，或抄襲成篇。在這些原則下，擬出版的稿件，如有下列的情況，即作適當的修改：(1)明顯的事實錯誤，(2)引自文獻書刊的冗長記述，(3)由於政治上或其他原因不宜披露的一些情節，(4)內容猥瑣，或故意刻畫渲染，流於低級趣味者。(5)對所涉及的人物加以任意褒貶，有意廻護，或誇飾自己、或作空泛之論^⑧。這些處理稿件的原則，除第三條外，大體均符合史學的要求。

前述徵稿原則、審稿原則、改稿原則等等，為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所擬，係供作各級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參考之用，徵稿範圍則為山東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所擬，係供作寫稿者的參考。上述的原則和範圍，均定於文革（1966）前；文革十年（1966～1976）期間，山東文史資料停刊。到山東文史資料復刊後（1978），上述的徵稿範圍、徵稿原則等大體仍然適用，這可從1978年12月山東文史資料復刊號（第五期）中所載「徵集文史資料啟事」中略窺端倪。有關徵稿範圍的部分說：

為搜集整理現代史、革命史資料，本會廣泛徵集從清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歷史時期的山東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技、工商、民族、宗教、華僑以及社會風尚等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資料。

有關寫稿原則（可包括徵稿原則、審稿原則和改稿原則）的部分說：

撰寫資料，必須以撰稿人的親身經歷和見聞為依據，內容必須真實，材料力求具體。所寫資料無論是否與己有關，均應大膽直書，不要曲筆^⑨。

復刊號的「徵集文稿啟事」，對徵得的稿件，發表者給稿酬、未發表而有參考價值者給潤筆費也有說明。但有兩點與文革前的要求不同：一是加徵「革命史資料」，所謂「革命史」應指「共產主義革命史」，文革前的文史資料並不特別徵集，認為那方面的史料另有專門機構徵集。二是要求政協委員及

^⑧ 同註⁽⁵⁾，頁211～214。

^⑨ 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1978）頁185～186，徵集文史資料啟事。

各方面有關人士「都能放下包袱，解放思想，把自己親歷的有關史料，多寫快寫」，其中「放下包袱，解放思想」是文革以後的新氣氛，文革前是沒有的。

三、資料內容與所涉時限的統計分析

本文所分析的山東文史資料共二十五輯，出版的時間從1964年到1988年共二十五年，平均每年一輯。惟以中間休刊十一年，就實際出版的十四年計，平均每年不到兩期。山東文史資料第一至二十輯均名「文史資料選輯」，署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二十一輯至二十五輯則題名「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署名「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山東文史資料的出版，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4年到1966年，出版了第一～四輯^⑩；第二個階段是1978年到1988年，出版了第五～二十五輯。中間十一年的停刊時間，即為一般所謂「文革十年」的時間。文革十年過去以後，山東文史資料復刊，編者在復刊說明中，表示了工作的廢續情形：「本會曾於1964年至1966年編輯出版了山東「文史資料選輯」一至四輯，由於遭受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致使文史資料工作無法進行。……本會已恢復了搜集、整理、編輯、出版文史資料工作。……我們殷切地要求革命老同志、各界愛國人士，……把親身經歷的有關史料寫下來，編入文史資料，以供有關方面的參考。」^⑪第一至第四輯，原刊未見，所見者為1982年的重印本，但均未註明原刊時間。第五輯以後的出版時間，計第五輯1978年12月，第六輯1979年7月，第七輯1979年10月，第八輯1980年5月，第九輯1981年1月，第十輯1981年3月，十一輯1981年7月，十二輯1981年9月，十三輯1982年6月，十四輯1983年2月，十五輯1983年3月，十六輯1985年5月，十七輯1985年3月，十八輯1985年12月，十九輯1986年3月，二十輯1985年9月，二十一輯1986年11月，二十二輯1986年12月，二十三輯1987年11月，二十四輯1987年12月，二十五輯1988年12月。中有輯別稍後（十七輯、二十輯），而出版時間反較前一期為早者，原因不詳。

中共的出版品有內部發行和公開發行之分，山東文史資料第一～十五輯

^⑩ 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復刊說明。

^⑪ 同上。

皆印明「內部發行」，第十六輯（1985年5月）以後，即不再有「內部發行」字樣，而以前各輯，在1985年以後重印者，亦不再有「內部發行」字樣。如1985年重印的第十輯（原1981年出版），即不再有「內部發行」字樣。無「內部發行」字樣者，表示可以公開發行。似自1985年以後，中共對出版品的管制，已放寬尺度。

分析山東文史資料的內容，可有許多指標，本文僅設計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從資料所涵蓋的時間分：(1)清末，(2)1912年到1928年，(3)1928年到1937年，(4)1937年到1945年，(5)1945年到1949年，(6)1949年以後，(7)清末至1928年，(8)清末至1949年，(9)清末至1949年以後，(10)1912年至1949年或以後，(11)1928年至1949年或以後。第二大類是從資料所涵蓋的人羣主體分：(1)清史，(2)西方軍事帝國主義史，(3)北洋史，(4)國民黨史，(5)中共史，(6)日偽史，(7)人民史，(8)土匪史。第三大類是從資料所涵蓋的專史分：(1)政治軍事史，(2)社會經濟史，(3)教育文化史，(4)其他。

第一類表：資料所涵蓋的時間

編 輯 別	1912 前	1912	1928	1937	1945	1949	清末到 1949後	清末到 1949後	1912— 1949或 以後	清末到 1928	清末到 1945	1928到 1949或 以後	1937— 1949或 以後	總計
		1928	1937	1945	1949	1949後			1949後			1949後	1949後	
1	1	3	1	2	1	0	0	3	0	1	0	0	0	12
2	0	3	2	0	3	0	1	1	1	0	0	0	0	11
3	0	4	0	2	4	0	0	0	0	0	0	0	0	10
4	1	1	0	2	0	0	0	2	1	1	0	1	0	9
5	3	9	0	0	0	0	0	1	0	0	0	0	0	13
6	0	2	0	9	0	0	0	0	0	0	0	0	0	11
7	0	1	0	6	0	0	3	0	0	0	0	0	0	10
8	0	0	0	1	8	0	2	1	2	0	0	1	0	15
9	1	1	5	11	0	0	1	0	0	0	0	0	0	19
10	0	2	1	8	2	0	1	0	1	0	0	0	0	15
11	0	0	0	14	0	0	0	0	0	0	0	0	0	14
12	19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21
13	0	0	0	2	2	0	6	1	0	0	0	2	0	13
14	0	0	9	1	1	0	4	0	2	0	0	1	0	18
15	1	0	1	2	1	0	2	3	3	1	0	2	0	16

山東文史資料的內容分析

16	0	1	0	4	0	0	0	3	1	0	0	1	0	10
17	1	0	2	5	2	0	0	0	5	0	0	0	0	15
18	0	0	1	12	0	0	2	0	2	0	0	1	0	18
19	0	0	0	11	1	0	3	1	2	0	0	0	0	18
20	0	0	2	15	4	0	2	0	2	0	0	0	0	25
21	5	2	4	9	0	0	1	3	2	0	0	0	0	26
22	1	1	6	0	1	1	0	3	0	0	0	1	0	14
23	0	0	0	2	4	0	0	0	0	0	0	1	6	13
24	0	0	0	17	1	0	0	0	2	0	2	1	0	23
25	6	1	2	6	1	1	1	1	1	1	0	0	1	22
總計	39	31	37	141	36	2	30	23	27	4	2	12	7	391

上表列第一～廿五輯山東文史資料載文三九一篇，清末（包括辛亥革命）三十九篇，佔百分之十。〇；北京政府時期三十一篇，佔百分之七。九；北伐完成到大陸撤退時期二一四篇，佔百分之五四。七；其中抗日戰爭時一四一篇，佔百分之三六。一；又跨越各時代者合共一〇五篇，佔百分之二六。九。

第二類表：資料所涵蓋的人羣主體

內 輯 別 容	清 史	西方軍 事帝國 主義史	北洋史	國民黨史	中共史	日偽史	人民史	土匪史	其他	總計
1	0	2	1	5	0	0	3	1	0	12
2	0	2	2	3	0	0	3	1	0	11
3	0	0	2	6	0	1	1	0	0	10
4	1	0	1	0	0	0	7	0	0	9
5	0	1	3	0	0	0	9	0	0	13
6	0	0	0	1	9	0	1	0	0	11
7	0	0	0	4	4	0	0	0	2	10
8	0	0	0	4	7	0	4	0	0	15
9	0	1	1	0	14	0	2	0	1	19
10	0	0	1	5	9	0	0	0	0	15

11	0	0	0	8	6	0	0	0	0	14
12	0	0	0	22	0	0	0	0	0	21
13	0	0	0	0	4	0	9	0	0	13
14	0	0	0.5	8.5	6	0	3	0	0	18
15	0	0	3	2	4	0	5	0	2	16
16	0	0	1	1	4	0	3	1	0	10
17	0	0	1	6	3	0	5	0	0	15
18	0	0	0	6	8	0	4	0	0	18
19	0	0	0	6	6	0	6	0	0	18
20	0	0	0	8	10	1	6	0	0	25
21	0	0	5	16	0	0	5	0	0	26
22	0	0	0	2	1	0	10	0	1	14
23	0	0	1	6	6	0	0	0	0	13
24	0	2	0	11	7	0	3	0	0	23
25	4	0	0	5	0	6	7	0	0	22
總計	5	8	22.5	135.5	107	8	96	3	6	391

上表列山東文史資料第一～廿五輯載文三九一篇，其中有關清史者五篇（不包括辛亥革命），西方軍事帝國主義史者八篇，日偽史八篇，土匪史三篇，其他六篇，合共三十篇，佔百分之七・六；有關北洋史者二二・五篇，佔百分之五・七；有關國民黨史者一三五・五篇，佔百分之三四・七；有關中共史者一〇七篇，佔百分之二七・四；有關人民史者九十六篇，佔百分之二四・六。

第三類表：資料所涵蓋的專史

類別 輯	政治軍事史	社會經濟史	教育文化史	其他	總計
1	7	3	2	0	12
2	5	4	2	0	11
3	9	1	0	0	10
4	1	5	3	0	9
5	4	7	2	0	13
6	8	2	1	0	11

7	8	0	0	2	10
8	11	2	2	0	15
9	14	4	0	1	19
10	15	0	0	0	15
11	14	0	0	0	14
12	21	0	0	0	21
13	4	5	4	0	13
14	11	3	4	0	18
15	9	5	0	2	16
16	6	0	4	0	10
17	9	6	0	0	15
18	13	4	1	0	18
19	11	6	1	0	18
20	18	5	1	1	25
21	19	1	6	0	26
22	0	9	5	0	14
23	4	3	6	0	13
24	19	2	2	0	23
25	11	5	6	0	22
總計	253	82	52	6	391

上表列山東文史資料第一～廿五輯載文三九一篇，屬於政治軍事史者二五三篇，佔百分之六四・七；屬於社會經濟史者八十二篇，佔百分之二一・〇；屬於文化思想史者五十二篇，佔百分之一三・三；其他六篇；佔百分之一・五。在政治軍事史一類中，大部屬於軍事史，小部分屬於政治史。

四、對國史的涵蓋性及資料的原創性和客觀性

山東文史資料，以徵集山東省地區性的資料為主，許多資料，對了解山東地區的歷史很有幫助。但地方史究為國史的一部分，山東省在近代為重要的省區，山東省區的歷史，有些為國史中的重要環節，如辛亥革命有全國性

的歷史，也有地方性的歷史；辛亥革命在山東的情形也直接關乎國史。

為了解山東文史資料中對民國史的重要論題涵蓋的狀況，茲表列與國史上重要事件相關聯的資料三十種如下：

類別 主題	論文標題	資料評述	作者或口述者	期別
辛亥革命	山東辛亥革命之經過（19頁） ^⑫	文字平實，能照顧全局。	孫丹林	12
	山東獨立前後（35頁） ^⑬	文字平實，能照顧全局。	夏蓮居	12
	辛亥革命烟臺起義親歷記（13頁）	大體平實，偶有漫罵字句和階級觀點。	崔士杰 ^⑭	12
	呂子人談辛亥革命（11頁） ^⑮	文字平實，能照顧全局。	呂子人	12
	辛亥革命在煙臺（19頁）	為研究論文，參考資料寫成，略帶反帝反封建色彩。	孫春園 宋玉娥	12
	辛亥革命在黃縣（14頁）	文字平實，能照顧全局。	張敬齋 袁旨言	21
五四運動	對「五四」時期濟南學生運動的回憶（13頁）	文字大體平實，間有漫罵詞句。	石愚山 ^⑯	3
	回憶山東學生參加「五四」運動的概況（12頁）	文字大體平實，照顧亦頗周全。	張景文 ^⑰	5
臨城劫車案	臨城劫車案始末（37頁）	文字平實，記事周全。	方伯龍 ^⑱	1
	孫美瑤臨城劫車案如是我聞（30頁）	文字平實，資料豐富。	劉子衡 ^⑲	2
北伐	濟南「五三」慘案見聞（16頁）	文字平實，記事周詳。	蘇友文 ^⑳	1
	國民黨北伐克復曹縣（21頁）	文字平實，附錄有佈告、函件等。	傅同善 ^㉑	21

⑫ 原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五集（中華，1963）。

⑬ 同上。

⑭ 作者曾參加膠東地區起兵。

⑮ 此文寫於1957年9月，原載「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題名「呂子人先生訪問記錄」。

⑯ 作者時為濟南一師的學生，為學生聯合會代表之一。

⑰ 張景文為山東省立一中的學生，此文由張口述，宋德慧記錄。

⑱ 作者為兗州鎮所屬第六旅第一團第一營營長，係事發後率部入山剿匪者，用官府剿匪資料寫成。

⑲ 作者為滕縣人，距事件發生地點八十餘里，未必能了解真相，係依據傳聞並參考報紙材料寫成。

⑳ 作者為方振武的機要秘書。

㉑ 此文似寫於1949年前，作者於克復曹縣時隸馮玉祥部，文中對長官均甚尊重，並有「先總理」、「本黨」等稱呼。

張宗昌	我所知道的張宗昌（74頁）	文字平實，故事完整。	李恒珍 ◎ 魏劍白 ◎	3
	「五三」慘案前夕國民黨在濟南的活動和張宗昌的敗退（12頁）	資料尚好，間有漫罵詞句。		3
	張宗昌與益都旗兵團（12頁）	文字大體平實。	魏劍白 ◎	4
	張宗昌在軍閥混戰中所扮演的角色（33頁）	資料尚好，間有漫罵語。	劉子衡 ◎	10
韓復榘	韓復榘入魯前的略歷（1910-1930）（13頁）	參考有關資料寫成，文字平實。	紀慧亭	10
	韓復榘主魯政聞（17頁）	參考數十人所提供之資料寫成，文字平實。	紀慧亭	14
	韓復榘對中共山東地方組織和革命運動的鎮壓（19頁）	站在中共立場而寫，對韓批評頗多。	梅楓	14
	韓復榘與進德會（9頁）	文字平實。	董綏青 ◎	15
	韓復榘軼事（18頁）	參考多人提供資料寫成，文字平實。	紀慧亭	15
	韓復榘之死（13頁）	雖未註明，當亦為參考他人資料寫成，文字大體平實。	紀慧亭	17
	韓復榘叛馮投蔣與蔣介石拿辦韓復榘見聞點滴（14頁）	文字平實。	張宣武 ◎	17
臺兒莊大捷	臺兒莊大戰紀實（13頁）	文字平實。	屈伸 ◎ 李同偉 ◎	20
	臺兒莊大戰目睹記（7頁）	文字平實。		20
張自忠	張自忠將軍殉國紀實（10頁）	文字平實。	李致遠 ◎ 劉景岳 ◎	10
	張自忠將軍治軍（4頁）	文字平實。		21
戰後國共和談	國民黨反動派在山東破壞國共會談的一例（10頁）	站在中共立場而寫，頗多漫罵詞句。	田向前	3
	軍事調處在山東（15頁）	站在中共立場而寫，頗多漫罵詞句。	房衆夫 ◎	13
	回憶青島的停戰談判（10頁）	站在中共立場而寫，頗多漫罵詞句。	王彬 ◎	17

◎ 作者三人，均為張宗昌的舊部。

◎ 作者原隸褚玉璞部，受國民黨人策反，在濟南從事顛覆張宗昌的活動。

◎ 本文為作者訪問多人、並參考有關資料寫成。

◎ 作者為進德會文書股主任。

◎ 作者在1929年夏為馮玉祥部團長，當係依據傳聞資料寫成。

◎ 作者為臺兒莊大捷前線指揮官。

◎ 作者時代理嶧縣縣長。

◎ 作者在張自忠殉國時，任職於張所屬三十八師師部。

◎ 作者為張自忠舊部。

◎ 作者曾任軍事調處執行部濟南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 作者在1946年初為中共膠東軍區副司令員，曾代表當地共軍與國軍談判。

上表分辛亥革命（六篇）、五四運動（二篇）、臨城劫車案（二篇）、北伐（二篇）、張宗昌（四篇）、韓復榘（七篇）、臺兒莊大捷（三篇）、張自忠（二篇）、戰後國共和談（三篇）九個題目，共選文三十篇，略窺山東文史資料對國史的涵蓋性。大體說來，在三九一篇資料中，約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篇數，處理或涉及國史上的重要論題。

稿件的來源，就前表所列的三十篇稿件觀察，約有三種：(1)舊稿選錄：選自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回憶錄，並非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成立後所寫。(2)參照許多人提供的口頭或文字資料寫成：作者或為後學，或對所寫之事經歷無多，必須訪問他人或參考有關資料。(3)依照個人的經歷見聞並參照個人所藏有文件寫成，且作者對所寫之事，或為親自經手，或居重要核心，對所寫之事，確能作歷史見證。這樣看來，使用山東文史資料，首需辨別資料是否為原創性。原創性的資料，價值最高。

至於作者對資料撰寫的態度，雖然主觀難免，間有漫罵性或情緒性字句，但敍事都相當周延，不管寫整體，還是寫一部分，都自成體系。一般說來，文字平實者居多，在前表所列的三十篇資料中，可以歸入「文字平實」一類者有二十一篇，偶有漫罵語或持反帝反封建等中共觀點者五篇，純粹站在中共立場作排他性之論斷者四篇。前兩類的二十六篇資料，多為舊國民黨人所寫，且所寫題目均不涉及國共鬭爭，故政治禁忌少，能作平實的記述，偶有幾句漫罵語或反帝反封建語句，僅可視為自我保護作用，無損資料的價值。第三類的四篇資料為中共黨員所寫，涉及到中共與國民黨間的鬭爭，故對國民黨均持敵對口吻。雖然如此，使用此類資料，如能對作者的立場稍有覺察，仍然無大妨礙。

五、結論

山東文史資料，數量無多，無論作為一種國史資料來使用，還是作為一種地方史資料來使用，都有它的侷限性。雖然如此，它仍然是研究近代山東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近代中國史的重要史料。近三十年來，大陸各地陸續刊布文史資料選輯總在數百種以上，臺灣地區沒有一個圖書館能搜集完全。如果各省人士，能夠利用探親之便，注意搜集此類資料，國史研究的資料才會愈來愈豐富。如果政府能進一步讓學者前往大陸研究，對國史作全面研究，才能成為可能。

「王世杰日記」

陶英惠*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日，為中央研究院王故院長世杰（雪艇）先生百歲誕辰，近代史研究所特將其日記於是日影印出版，作為紀念，以嘉惠史學研究，的確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一、日記的數量及編印方式

王世杰日記，始自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止於民國六十八年九月，歷時四十七年，其中頗有間斷；惟在抗戰時期，也就是他在政府擔任重要職務期間的日記，則相當完整。茲將其存、缺的情形說明如下：

1. 民國二十二年：僅記有五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三日、六月十三日、八月二十四日等五天。
2. 民國二十三年：全缺。
3. 民國二十四年：僅記有一月十二日、七月十七日、八月九日等三天。
他在一月十二日追記的日記中云：「在過去一年中，筆記完全中斷；半由於惰，半由心緒苦悶。」照此看來，二十三年已確定無日記；既云「中斷」，證明二十三年之前，似不應只有五天的日記；又照一般人開始寫日記時，總是先敍述一下緣起，王世杰現存的第一天日記，並沒有此類說明。
4. 民國二十五年：全缺。
5.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三日至三十七年八月十六日：這段時間，雖偶有補記或中斷情形，大體上是完整的。如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九日之日記云：「此節係補記。在此期間，每日事務繁重，往往深夜尚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不能休息，遂至日記停頓，然仍不能不歸咎於無恒。」補記至十月十九日又告間斷，他在三十七年元旦恢復記日記時云：「近來日記頗有間斷，雖緣事冗，要亦由於勤恒不足。今日書此自譴。」不料自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至八月十四又告間斷，他在八月十五日記云：「近來事雜，身體間有不適（如牙疼、胃不消化等等），日記遂有長期間斷。自二十六年迄去年，十載之中幾全無間斷，（即有間斷，亦均於事後數日憑記憶補記完竣）頗引為慰。今後仍當自勉，期無間斷。惟不擬逐日作記，遇有必須付諸記錄之事，則詳記之。」並將過去三個月內他所作的事應予補記的五項記了下來，雖然自勉「期無間斷」，但僅在翌日（八月十六日）又記了一天即告間斷。

6.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至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全缺。在這十年中，為何中斷，日記中未作說明。這段期間，大陸局勢逆轉，政府播遷來臺，是變動非常大的時期，王世杰當時未能記下他的觀察和分析，為歷史留下紀錄，實在可惜。
7. 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至四十九年十一月九日：偶有間斷，大致完整。
8. 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十日至五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全缺。
9.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大致完整。這期間日記的情形，他在五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恢復記日記時云：「日記中斷已一年有餘，現在擬隨時續記，但不一定按日作記。」又於五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記云：「近來余作日記，既非逐日有記，且常常事後經若干日始予補記，實在太不認真，有愧古人多矣，書此以識心仄。」全部日記於六十八年九月十八日輟筆。

王世杰於生前曾數度整理其日記，並編定順序，分裝四十一冊，每冊或包含數年，或一年分訂數冊，以致各冊的大小厚薄不一。本所完全照原日記影印出版，惟為使各冊厚度相當，乃以年為單位，改分為十冊，每冊中不再存有跨年的情形；又為求版面整齊，將原日記的字體或放大、或縮小，使每頁的版面同大；由於原日記除每年開始外，僅書月日，而無年份，查閱自感不便，故於每頁書邊加排書名、年份、及頁碼。日記中提及之人物，多照舊習慣稱其字號，本所特編製人名字號對照表，附排於第十冊之末，以資查對。凡此，均為便利閱讀的作法。原日記均係行草，閱讀不無困難，如能加排釋文本，則將更加便利閱讀。

二、王世杰簡介及其日記之史料價值

在中國現代史上，王世杰是一位學人從政的典型，其一生志業，涵蓋了學術、政治、外交等方面，曾擔任過很多重要職務，並發生過深遠的影響。要了解這部日記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的史料價值，首先應該將王世杰的生平與志業稍加介紹。

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陽人，生於清光緒十七年二月初一日（一八九一年三月十日）。幼讀私塾，後入湖北優級師範，習理化；結業後入天津北洋大學採礦冶金科。民國二年，由稽勳局資送英國留學，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獲政治經濟學士，轉赴法國，入巴黎大學，民國九年得法學博士。旋應北京大學之聘，講授比較憲法。十六年六月，任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十二月任湖北教育廳廳長；十八年三月，任武漢大學校長；二十二年四月，任教育部部長，二十七年一月，免教育部長；二月，被聘為政治部指導委員；五月，奉派為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六月，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二十八年十月，任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十一月，任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部長。三十年一月，又任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秘書長（蔣中正兼總裁）。三十一年十二月，宣傳部長由張道藩繼任。三十二年八月，免中央設計局秘書長；九月，當選第三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免國民參政會秘書長；十一月，任中國訪英團團長。三十三年五月，偕張治中赴西安與共黨代表林祖涵（即林伯渠）舉行談判；十一月，再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三十四年一月，與周恩來等商談中共的合法化及參加政府問題；七月，繼宋子文為外交部部長；八月赴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返渝後，奉派同張羣、邵力子、張治中與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重慶會談。三十五年一月，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七月，任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團長。三十六年冬，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三十七年三月，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四月，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九月，任出席聯合會第三次大會首席代表；十二月，免外交部部長。三十九年三月，任總統府秘書長，四十二年十一月，免總統府秘書長。五十一年四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至五十九年四月辭職，改任總統府資政。七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病逝臺北榮民總醫院，年九十一歲。

由上述簡歷，可知王世杰自民國二十二年出任教育部長起，是其一生事業步入高峯的轉捩點，而他的日記也從這一年開始動筆。雖然二十二至二十

五年四年的日記，只有十餘頁，畢竟是一個重要的起步。自二十六年起的十一年多期間，正是他擔任重要公職、對國家最有貢獻和影響的時期，其日記則相當完整，對所經辦的事或所見所聞，一一紀錄下來。從他的日記中，很清楚的看出他已進入當時最高決策的核心。如二十六年三月五日日記云：

今日午後四時赴蔣〔中正〕先生處開談話會，座中為行政院同事，新任外交部部長王亮疇〔寵惠〕亦到。蓋一年以來，政院許多大問題，大都不決於正式會議，而決於星期五日下午之茶談。……

至於實際的最高軍政機關則為國防最高會議，王世杰也是參加的成員之一，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日記云：

自八月中戰事發生後，中央政治委員會未嘗開會，而以國防最高會議為實際最高軍政機關。但國防最高會議初雖每週集會一次，近亦已一月有餘未嘗集會，每週惟舉行其常務會議一次或數次。常會之集會以汪先生精衛〔兆銘〕為主席，其議決大都係於事後送蔣〔中正〕先生核行，蓋蔣先生係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授權於戰時主持一切黨政之人也。

今日在鐵道部開國防最高會議第四次會議。……

至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式被推為國防最高會議之委員，日記云：

今晨國防最高會議，在武昌省政府舉行第七次全體會議。在會議時，予係以外交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被邀參加。……是日會議，經主席提議加推宋子文、朱家驛、蔣作賓及余為委員。

由於汪兆銘於二十七年年底自重慶出走，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於二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將中央政治會議與國防最高會議合併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指揮，推蔣中正總裁為委員長，張羣為秘書長。「實際上國防最高委員會之構成與職權，與原來國防最高會議，初無甚大之差別。」（二十八年二月三日記）王世杰仍為該會成員之一。他的姪子王德芳在「哭五叔雪艇公」一文中記其在抗戰期間擔任的重要職務及貢獻云：

重讀叔數十年之日記，當讀至抗日期間，叔一身同時肩黨（中宣部、青年團監事會、中訓團。）政（參政會、中央設計局。）軍（參事室）六機構之首長或幕僚長重任，在堅辭不獲之後，則臨危受命，為國忘身。旦夕從公，假日不息，每周召對多至三、四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和戰大計，敵友分野（民主或軸心），在朝諸公議論未定之際，叔輒正色抗言，忠盡謀國，不避私怨，因明辨於審問慎思

之後，發之以至大至剛之氣，率能折服異議，事後更欽遠見。①

王世杰的專長爲法學，舉凡重要的組織法、條例等，多承蔣中正之命親自起草或修正。而有關內政、外交方面之重要政策，他也是蔣中正諮詢的對象；至於採納與否，以及其後的發展，日記中都留有紀錄。他是隨時可以謁蔣商討解決重要問題的少數人之一。在兩人關係親密和被倚重的優越條件下，其日記所錄有關抗戰期間重大決策之經過及發展情形，史料價值之高，自不待煩言。茲略舉數例說明如下。

(1) 抗日戰爭初期，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Oskar P. Trautmann) 受日本政府之託調停中日戰事，王世杰日記中留有許多紀錄；他並記下當時政府領導階層官員對和戰的不同態度，如孔祥熙、汪兆銘、居正等傾向和議，孫科則以爲決不可言和。而汪兆銘、陳果夫甚至「主張設法倩英、德出任調停」（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日記）。意見紛歧，自會影響抗戰的團結和士氣。這些珍貴的紀錄，對研究抗戰一段歷史有相當大的幫助。此外，王世杰更紀錄了一段周佛海所談中日和議之事：外交部亞洲司前任司長高宗武，辭司長職務後，即受政府密命駐香港，與日本方面在港之人往來，於二十七年七月初經上海飛東京，居留約兩星期，曾與日本軍政界領袖商談和平條件。返港後，曾有書面報告呈送蔣中正閱過。「此一段經過，我方迄今固極守秘密，日人亦未宣洩一字，足見日人希圖講和之切。」（詳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記）殊有參考價值。

(2) 再如胡適（適之）以學人被任命爲駐美大使，四年之內，歷經不少波折，卒不免被排斥而去職，也是學者們有興趣探討的課題。王世杰日記中，留存了許多與胡適交往的珍貴史料，特別是胡適在任駐美大使期間，兩人的函電更見頻繁。我們不難從中窺見兩位從政的學人，公忠體國、有爲有守的風範。他在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日記記胡適被任命的經過云：

蔣〔中正〕先生決定撤換駐美大使王正廷，而以胡適之繼任。此事由來，係因王氏在美辦理借款，耗費鉅款，毫無成效，受各方之指責。

日前傅斯年曾面向蔣先生指責之。周鲠生向蔣先生所提外交方略中，（由予送閱）亦力言關於對美外交，應調整使節。

由於王正廷和孔祥熙的拖延，直至同年九月十七日方發布胡適使美。此一學者大使在國內政壇上的奧援，似乎只有王世杰一人，非常孤單。就任不久，

① 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六期，頁四九，民國七十年六月一日出版。

就遭到馮玉祥在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所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公開的指責，並函請蔣中正撤回胡適。王世杰以其顯有挾嫌捏造之痕迹，立即挺身爲之辯白：

前晨余致一書面於蔣〔中正〕先生，力言胡適之近來態度極堅定，對於戰事力主苦擋，後蔣先生曾自行密查。現蔣於此事已極明瞭，並悉前此不實之報告，爲六河溝煤礦公司經理李祖紳所散；李爲王正廷所用之人，故蔣先生聞悉後甚憤恨。（一月二十八日日記）

此外，白崇禧也對胡適不滿。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日記云：

今晨晤陳辭脩〔誠〕，據云白健生〔崇禧〕對胡適之極不滿，前此中央全會時攻擊胡適之最力者非馮煥章〔玉祥〕，而實爲白健生。余意民國二十五年夏，粵桂稱兵，與冬間西安事變時，適之曾爲文切責健生等。健生之反對，出自此等嫌怨，則其爲人未免狹刻可畏。

同年七月二十二日日記，謂：「日前美國合眾通訊社電傳胡適之將因病去職，政府擬以顏惠慶繼任等語。」外交部雖立即予以否認，但易人之說，仍時有所聞。二十九年三月五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病逝香港，評議會依法選出朱家驛、翁文灝、胡適等三人爲院長候補人，又有將胡調回之意，王世杰於三月二十三日日記云：

據張岳軍〔羣〕言，蔣〔中正〕先生因聞中研院評議會堅拒顧孟餘，並擬選胡〔適〕、翁〔文灝〕、朱〔家驛〕等，有將適之調回任院長意。

同年四月七日記云：

杭立武爲余言，孔庸之〔祥熙〕欲調胡適之返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擬以宋子文使美，宋表示不願往。

同年五月三日日記云：

陳布雷自成都來電，謂駐美使節問題已入嚴重階段，余因電蔣〔中正〕先生指陳三點：（一）戰時外交人選，非有重大過失不宜常換。（二）胡適之如被內調，彼或拒絕新職。（三）適之信望在顏〔惠慶〕、施〔肇基〕諸人之上。（近日顏託人爲余言，彼甚願赴美任美使。）

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日記云：

今日午後晤陳光甫，彼甚欽佩胡適之。當即商定由彼致函蔣〔中正〕先生，申論美使不可易人。

同年八月八日，王世杰再親自阻止美使易人，日記云：

今午爲胡適之事，向蔣〔中正〕先生面言，在此時期，大使不宜更動，蔣先生亦以爲然。調適之回國之議，已暫時再度取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十年四月十一日，王世杰接到周鯁生來信，「謂宋子文在華盛頓遇事專擅，不顧體統，頗使適之不快。」胡因此與宋不諧，而受其排斥，遂又有撤換之議。三十年七月十四日日記云：

復初〔郭泰祺〕爲余言，宋子文有電致蔣〔中正〕先生，要求撤換適之，並薦施肇基繼適之爲駐美大使。復初並謂蔣先生亦有更換適之之意，彼當時表示期期以爲未可云。

三十一年七月一日，王世杰接胡適五月十七日所寫之信，謂「彼於大使職甚消極，並謂數月未接政府一電。故其辭職意漸決。」王復函勸其勿消極。但在同年八月十四日，已無法挽救，日記云：

今晨蔣〔中正〕先生囑布雷告我，謂將解除胡適之使職，以魏道明繼其任；其議來自宋子文。予以宋與胡既不相融洽，原議勢難變更，遂未爭持。且適之蓄意去職已久，其心臟病近雖未發，亦須休養。

九月八日，政府發表以魏道明繼胡適爲駐美大使。

在胡適使美期間，王世杰除在中樞力予維護外，並請其好友周鯁生在美予以協助：

電周鯁生，勸其多留美國兩月，與胡適之隨時商議一切。（二十九年二月一日日記）

今日函周鯁生，請其續留美國，與胡適之隨時商討諸事，旅費由宣傳部籌寄。（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記）

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王世杰又以他的生活爲慮，儘量爲之設法，三十一年十月六日日記云：

今日予與〔外交部〕傅秉常次長言，適之任大使時，殆無絲毫積蓄，現在美因身體不耐高空飛行，恐一時尚不能返國，外部於其旅費應從優撥給，俾免窘艱。傅以爲然。

三十三年三月三日日記云：

胡適之君將接受美國哈佛大學教席。予覺彼在未返國述職前似不宜遽接受外國聘約，因電蔣〔中正〕主席。蔣主席來電囑予墊送彼之旅費補助美金數千元。予因墊送六千元。

當時，王世杰正在美訪問，曾於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十二日、十七日、二十日數度與胡適詳談，也談到胡與宋子文事，可惜日記中未記下所談內容。否

則，對於胡、宋不諧的原因，當可獲得更多的了解。王世杰在六十五年九月十八日日記憶述郭泰祺在外交方面之特殊貢獻，其中有一項為：「於珍珠港事變前數月維護了胡適之使節，後來影響頗大。」而自己並未居功。

胡適於駐美大使任內，如何在美國進行工作，王世杰是諮詢的對象之一，他給政府的報告以及政府給他的指示，王世杰日記中也有簡略的記錄。為研究抗戰期間中美外交史的學人提供了一些重要線索。

(3)又如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我國與蘇聯簽訂之中蘇友好條約，係由王世杰以外交部長身分代表中國在條約上簽字，他因此備受批評。中蘇友好條約，實由同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蘇三國首領的雅爾達密約而來，我國被迫依此密約與蘇聯談判所簽訂之友好條約，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之談判，由宋子文以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身分，自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與史達林直接面談六次。七月三十日，行政院改組，宋子文辭外交部長兼職，改由王世杰繼任。第二階段之談判，由行政院長宋子文與外交部長王世杰在莫斯科與史達林直接面談，自八月七日開始談判，十四日結束，十五日晨六時簽字（正式約稿作十四日）。王世杰是自始至終參與此事的少數人之一，在商討對雅爾達密約的因應措施時，王世杰即不斷與國府主席蔣中正、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 (Patrick J. Hurley)、宋子文等密商；當中蘇第一階段談判時，王世杰除於宋子文赴莫斯科前，一起研討對蘇方案外，更於宋抵莫斯科後，隨時與蔣中正就談判的情況加以研商，並代擬致宋之訓令電文。在中蘇第二階段談判時，雖仍以宋為主，但在會談前，王、宋必先充分交換意見，決定談判之原則。由此可知：王世杰是對中蘇友好條約自談判到簽字的詳細過程最清楚的極少數人之一。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日記中，將進行的情形完整的記錄下來，為研究這段史實的學者們提供了最好的第一手史料。細讀簽約經過，再回顧其後之發展，不禁令人擲筆三嘆！

(4)此外，他更是與中共、青年黨、民主同盟等各黨派商談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為謀團結合作，付出了不少心力。他的基本信念是：「國共雙方須互讓，纔能合作。」（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記）直到五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他回憶這段往事，自認為：「余於抗日戰爭期，對於戰事極緊張期內，求避內戰爆發之努力，殊為不淺。」

他在晚年曾多次重閱以前的日記，檢討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原委曲折及得失，頗有畫龍點睛之妙，對讀者有相當大的幫助。如：

近日覆閱民二十八年九、十兩月日記，覺當時國際情勢十分複雜，孔

庸之〔祥熙〕、王亮疇〔寵惠〕對德態度猶豫，或走錯誤，思之凜然。（六十五年九月七日日記）

續閱民三十三年日記。余深覺對日戰爭時期所造成之經濟崩潰，宋子文、孔祥熙、與徐堪（糧政）責任最大。（六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日記）

閱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日記。回思東北問題之未能解決，中共問題（政治與軍事）之未能解決，以史坦林之操縱為主因。通貨之未能解決，宋子文之專橫，不得中外信任，外款之未能利用，均為要因。（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記）

閱三十七年日記，深覺宋子文為一有能力而實無政治魄力與責任心之人。余曾誤向蔣〔中正〕先生力薦以宋代孔〔祥熙〕，孔則昏庸而無能。陳辭脩〔誠〕因病不能早往東北，亦不能久留東北，均為大陸失敗之主因。（六十一年三月三十日日記）

根據這些線索，去閱讀他當時的日記，不僅可以得到按圖索驥的便利，同時也可以獲取很多滿意的答案。

三、臧否人物，一針見血

人是歷史舞臺的主角，其言行和心理動機，他同時代的人看得最為親切，若能及時留下觀察的紀錄，自是一項寶貴的史料，不僅有助於了解史實真相，也提供後人一個考察思索的重要方向。

王世杰在日記中對很多他同時代的人，就見聞所及，留下了率直的批評。如：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五日，認為行政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均無作為，故「抗戰雖一年有餘，對外聯絡乃至借貸等事，毫無所成。」由於孔祥熙「昏庸而無能」，所以他早期頗寄厚望於宋子文；及與宋接觸較多，發現宋「為一有能力而實無政治魄力與責任心之人」，又因宋太專橫，不得中外信任，所以對宋之批評尤多。而孔、宋之間，亦「相互諉過」，並不和諧。又如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世杰赴南開中學應袁同禮晚餐之約，席間多為教育界人，經濟部長翁文灝（詠霓）亦在座，他在日記中記云：

詠霓對於空軍秘密消息任意指述；對於十中全會決議任意指斥；對於物價問題任意批評，一若與主管機關（經濟部）無甚關係者。予覺此

君畢竟只是一個技術人員。

翁文灝這種刺刺不休、放言高論、自以為是的作風，其下意識裏可能認為如此才不失書生本色，而引以為豪。他和王世杰於民國三十七年三月，都以在學術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同時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獲得我國學術界最高的榮譽。由此可見，學人不一定都適合從政，而從政的學人，也未必是適任的政治家。因為學人，尤其是成名的學人，由於個人在學術方面的成就，很容易在無形中養成了對任何事情都以權威自居的習慣。翁文灝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再如民國二十六年，司法院長居正兼任私立朝陽學院董事長，在三月十日舉行之中央政治委員會中，提議由政府補助朝陽學院年十二萬元，王世杰時任教育部長，在會中表示反對，他認為：

近來黨中耆宿，往往受人慫恿，各思取得一、二個學校，而此種學校，類皆成績不良，匪惟不宜獎勵，且當嚴行取締者也。此種趨勢，倘不及時糾正，教育整頓工作，將受重大影響。

因此觸怒居正，至同年十月一日國防最高會議開常會時，居正竟在羞辱之後，再飽以老拳。王世杰在日記中記其經過及感想云：

予因教育預算案事出席說明。居正挾朝學院等事之宿嫌，口稱教育當局「欺矇長官、無恥小人」；予當即起而質問事實，彼竟不答，越席而揮拳相毆。有私怨而無公心，身為司法最高長官之人，公然蔑視紀律，觸犯刑法，而無賴若此，可駭可痛。

居正以司法院長之尊，而以此種粗魯方式向教育部長洩怨，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讀到這幕「官場現形記」，對當時負國家大責重任的領導階層，不禁感慨萬千！

日記中所臧否的人物，多已故世；自其日記出版後，現仍健在而有所辯白者，惟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一人。^② 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褒貶之間，自難避免主觀成分，特別是在日記中，

^② 吳大猷於民國五十六年返國，擔任科導會及國科會主任委員。王世杰日記於五六年八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五日，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十一日，六十年一月十日、二月一日，六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及六十三年一月十一日，曾多次予以嚴刻的批評，主要的是，認為他「器度不廣，護己短而苛責他人」，「無行政經驗，亦無得力助手」，又不能常川在臺，所以「主持科學委員會數年，可謂極乏成績。」至於吳大猷改組科會為國科會時，被批評「專妄」一節，吳在「我與中央研究院」一文中，有所辯白，他之未請中研院的李濟和李先聞至國科會，「不是疏忽，而是聽人忠告也。」又云：「以為國科會未聘中研院人為委員『不可恕』，正是『本位』觀念在作祟耳。」見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五期，頁四三，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一日出版。兩賢遲來的爭論，留待以後的史家去探討吧！

更會保留個人真實的好惡；即使當事人沒有辯白的機會，卻也提供後人研究相關史實時一個重要的線索；由於史料的不斷公開，史家仍會參考各種不同的史料，詳加比對，找出事實真相，予以公平客觀的論斷。

王世杰因為職務的關係，與政界人物接觸較多，所以臧否的對象，也以政界人物為多。同時他也是學界中人，對學界人物也有深刻的觀察。例如對中央研究院歷任院長，他都有所論及，而特別推崇蔡元培和胡適。茲摘錄數條，供作參考：

子公〔蔡元培〕貌似和易，實際上風骨凜然，為本黨第一，此為余所深知者。（二十九年三月五日）

細閱中央日報日昨增刊（紀念蔡〔元培〕先生），予於蔡先生之立身行事、待人接物、敬慕愈深。（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余覺近數十年來，中國歷史上之最大人格以孫中山、蔡元培、胡適、吳敬恒為最。（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余嘗言，北大只有兩根半骨頭，謂蔡子民〔元培〕、胡適之、傅孟真〔斯年〕也。（五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民國二十七年，王世杰奉派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候選人資格審議九人小組之一，他評審的標準為：

政見不同者應從寬羅致；操行有虧守者（尤其如「賄選議員」之類），則不可任其濫入。（五月三十日日記）

他「力主排斥政治道德破產之人」（六月十六日日記）。這是他評論別人的標準，也正是他個人操守謹嚴的最佳說明。

四、餘論

王世杰以學人從政，對史料之保存極為重視，故留有大批文件，為研究近代史之珍貴直接史料。其所寫三十多年的日記，更為學術界、特別是研究近代政治及外交史的學者們所重視。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七日，王世杰往晤陳誠夫人，是日日記云：

彼謂彼已將辭修〔陳誠〕函牘文件，易於引起爭端者焚燬。余雖不贊成，然既已焚燬，言亦無益，因未置評。

寥寥數語，已可看出他重視保存史料之態度。陳誠文件之被焚燬，的確是件無可彌補的損失。王世杰則不然，他在遇有重要文件而為日記無法容納時，

即記下要點，將文件另行保存，並加整理，如：

檢閱近數年來保存文件，並囑託喻德輝君代為整貼。（六十五年五月十日日記）

余近日檢閱我所存儲自撰文稿，覺存儲之件遠不逮失存者之多；即余在舊日自行主編之報章期刊，亦俱無存，亦無法補搜。（六十六年三月七日日記）

他的日記，更是經過多次整理，由其「日侍左右，司簿書筆札」^③的姪子王德芳任其勞。像他這樣有心保存史料的態度，自然大大提高了這部日記的價值。

日記，是個人日常生活的紀錄，也是一種自我訓練，培養勤與恒的習慣。王世杰每於其日記間斷後即自責「勤恒不足」、「有愧古人」。因此，才有這麼多珍貴的紀錄保留了下來。

個人的日記，對家庭生活的記載大多非常詳細，可是王世杰日記，僅偶有簡單的記錄，絕大篇幅都是他所經辦或所見所聞的國家大事，記下事件的原委或他本人的反應。他在提及當時的政治人物時，也多半寫出其職銜，此對後人閱讀有相當大的幫助。由此可見，這部日記撰寫的動機之一，是有意傳世的。

最後，附帶說明一下王世杰的有關檔案。王世杰的檔案，經其哲嗣紀五及女公子秋華全部移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代為整理、保管，並已編為「王世杰先生檔案目錄」一冊。依其內容，大致分為下列幾類：日記、聘書、函稿、收發文簿、信札、照片、實物、著作、演講、談話、雜著、剪報、雜檔等。本文所介紹的日記，就是其中比較完整、也最為珍貴的一部分。至於其他檔案所包括的時間，多為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臺以後者，此前的文件，如他與時人的往返函電等，多與重大事件有關，卻很少保存下來，十分可惜！這是研究近代史學人的一大損失！依照王世杰注重保存史料的態度推測，理應妥善保管，可能是由於時局動盪不安，一再播遷，倉卒中無法隨身攜帶而告散失。動亂中保存史料，確非易事，只有讓有心人再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去尋訪、蒐集了。

民國七十九年五月於近代史研究所

^③ 同註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六)

楊 同 慧*

經濟部設立於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前身為實業部，後將建委會、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部份、軍事委員會第三、四部、工礦、農產兩調整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及財政部糧食運銷局等各單位，加以合併而成。其名稱，一度改為工商部，但內部組織，仍然不變。三十八年五月後，又改稱為經濟部。經濟部下分總務、人事、秘書、技術、參事、會計、統計、考核委員會等行政單位。各事業單位有：水利司、農林司、工業司、管制司、企業司、電業司、商業司、礦業司，掌管事務包括農、林、水利、工、商、電、礦業。現就已整編完成的現存檔案，分述如下：

一、行政單位

(一)總務司（民國二十七年～三十七年）

共27函，包括組織法規、各單位法規、文書處理、實業部及各單位移交清冊、租賃房屋、房屋配售、工作報告等。

(二)人事室（民國二十七年～三十七年）

共49函，包括人事法規、人事動態、獎勵、授勳、各年度考績、職員考績及秘書、參事、專員、技正、技士、技佐等各級人員任免。

(三)秘書廳（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六年）

共33函，包括國民參政會第一～四屆決議案本部辦理情形，五、六、七、八、十、十一、十二中全會本部辦理情形、第二期戰時行政計畫、各年度工作計畫、工作報告、政績比較表及收發表冊。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研究助理

(四)技術廳（蠶絲產銷協導委員會）

6函，蠶絲產銷協導委員會，設立於民國三十六年，隸屬於農林、經濟兩部，主要工作在推行蠶絲產銷計畫，其後根據行政院諭「蘇、浙兩省產銷計畫似應統籌辦理，該項經費之共同管理，亦屬必要」，而將蘇、浙兩省劃為一整區，設立蠶業改進特種基金管理委員會，內容有組織條例及監管草案審查會議。中國蠶絲公司檔案參見企業司部份。

(五)參事廳（民國二十七年～三十七年）

共7函，主要內容有經濟部暨各單位組織法規、煤炭管制辦法、工業貸款、補助辦法及各案判決摘要、法令解釋等。

(六)會計處（民國二十七年～三十七年）

90函，包括會計法規、建委會債款案、美、英借款、各事業單位借款、各年度概算、預算、計算、決算、會計處人事及各事業單位會計人員等。

(七)統計處

6函，內容包括：組織章程、人事、經濟部統計月報及各省物價指數。

(八)經濟事業考核委員會（民國三十年～三十七年）

經濟部為增進經濟事業之考核效能而設立考核委員會。共17函，內容包括組織章程、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各單位設計考核委員會、各省考核工作、計畫、報告等。

二、事業單位

(一)水利司——含與水利有關之專業機構（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

42函，經濟部在接收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委員會後，於民國二十七年將水利部份機構改稱為水利司，二十九年五月修法後，水利司即不再設置，併歸水利委員會掌管。現存檔案主要內容有：移交清冊、訂購圖書、各省水利訴願案、與中央大學合辦水利系、查勘水道、水利工程及計畫、水利事業報告、水文記錄、購料案、經費案。此外，檔案內容亦包括二十九年修法的水利委員會組織草案、人事案等。民國二十七年，國民政府為了防止黃河西侵，因而設立黃河防汎工振委員會，築堤防水事項由黃河水利委員會辦理，經費則由振濟委員會撥發。此外，尚有堵口復堤設計委員會、復興水利建設設計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亦可看出當時政府對整治河道的計畫與意見。其專業機構有：

1. 黃河水利委員會（以下簡稱黃水會，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

黃水會、華北水利委員會、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導淮委員會原皆屬於全國經濟委員會，民國二十七年改隸經濟部，三十年後又為水利委員會掌管，黃水會檔案共79函。內容包括：各項規程、人事卷、會議記錄、清水江工程處、河南修防處等疏濬工程及工程計畫、二十七年～三十年工作報告、各種測量報告、地形圖、水流變遷圖、斷面圖、修築堤防、大壩工程、二十六年～二十九年預算、計算、決算及各項經費等。

2. 華北水利委員會（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

共25函，檔案內容有：職員任免、考績、撫卹救濟、各單位經費案、工作報告、勘測報告、四川、廣西、西康航道工程案。

3. 揚子江水利委員會

35函，主要包括：總務、人事、工作報告、整理水道工程、工程費、計算、預算及事業費。

4. 導淮委員會（民國二十六年～三十年）

計有35函，內容分別為總務、人事、工程計畫、二十五年至三十年預算、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度計算、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度決算、借用庚款、烏江工程局之總務、工程、經費、綦江工程局之章程草案、經費、工程承攬案、各項工程旬報及圖表。

5. 江漢工程局（民國二十六年～三十一年）

為了整治湖北水務，經濟部於民國二十七年接收全經會的江漢工程局，開始工程整治工作，現存檔案，共83函，內容包括：經費、歲修工程、堵復工程、各工務所報告、清江水道工程案、嘉陵江水道工程案等。

6. 涓洛工程局（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

涇洛工程局前屬全國經濟委員會，主要工作在辦理涇洛兩渠及其他灌溉工程事宜。主要內容有組織章程、人事任免、工作報告、事業費、管理費、黑惠渠、洛惠渠、梅惠渠工程案等，共30函。

7. 珠江水利局（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

共27函，內容包括組織、經費、廣西灌溉工程處及廣東、廣西水利業務等。

8. 金沙江工程處（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年）

金沙江工程處是在經濟部下成立的工程單位，設立於民國二十九年，主要工作在整治金沙江水道，檔案內容有：總務、人事、業務、經費及保護

測勘隊等，計 6函。

9. 川康水利貸款委員會（民國二十七年～二十九年）

2函，檔案內容包括：組織、貸款案、查勘報告。

10. 湖北堤工專款保管委員會（民國二十一年～三十年）

實業部為保管湖北堤工專款而設置此委員會，後納入經濟部管轄。共11函，內容包括：規程、印信、移交清冊、堤工捐收解辦法、二十九年堤工專款概算、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度預算、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度決算、二十三年～三十年計算等。

11. 中央水工試驗所（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

設立於民國二十四年，先隸屬於全國經濟委員會，後歸經濟部管轄，主要工作在舉辦水工試驗研究水利改進等。檔案內容有總務、人事、業務、經費、預算、計算等，共8函。

12. 水利設計測量隊（民國二十七年～三十一年）

檔案內容有：總務、交接、人事任免、業務、申請各項經費、米價案、生活補助費等，共27函。

13. 水利航空測量隊（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

民國二十五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為辦理水利測量事宜，與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陸地測量總局合組水利航空測量隊。二十七年三月，該隊暫行結束。其後，經濟部為辦理後方水道整理工程，由經濟部中央水工試驗所與軍令部陸地測量總局合辦水利航測隊，一切組織，照舊不變。現存檔案內容有總務、人事、支出計算書、事業結束費、黃河水文照片等資料，共4函。

14. 田璧工程處（民國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15. 關河疏灘工程處（民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田璧工程處原屬軍事委員會武漢衛戍總司令部，關河疏灘工程處則於此時隸屬於交通部駁運管理所關河疏灘工程處，以上兩單位，主要工作在處理水利事務，經費由經濟部撥款補助。田璧工程處，共2函，主要內容有：人事卷、經費卷、攻守定江龍計畫書、補助阻塞工程計畫。關河疏灘工程處，計3函，內容有：查勘普耳渡至敍府水道、各灘工程進度表、工作報告、驗收關河疏灘工程報告書及灘圖等。

16. 氣象研究所（民國二十六年～三十年）

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先後與全經會水利處及經濟部水利司合辦各種氣象事業（包括：武漢測候所、西安測候所、各雨量站等），氣象研究所檔

案共 6函，內容有人事、經費、支出計算書表、報告及記錄等。

此外，經濟部水利司亦主管全國各省水利建設事項，各省水利建設概況，依現存檔案，內容如下：

1. 河北省（民國二十七年）：1函，內容為：經費卷。
2. 山東省（民國二十七年）：1函，內容為：經費案。
3. 河南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0函，內容為：總務、工程工款、各項貸款、各項水利業務、孟陽、內鄉、陝、孟、鞏、嵩、伊川、魯山、鎮平、浙川、鄧等縣各種工程圖表及計畫書。
4. 陝西省（民國二十六年～三十年）：12函，內容有：組織章程、人事案、業務、經費、渭惠渠、汧惠渠、郿惠渠、涇惠渠、綏惠渠、雲惠渠、榆惠渠、渭南灌溉工程案、嘉陵江水道工程案、沔縣、安康間漢江水道地形圖及工程計畫書圖。
5. 甘肅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4函，內容為：洮惠渠工務所工程案、經費案、溥濟渠工程案、經費案、湟惠渠工程案、業務案、經費案。
6. 江蘇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共 6函，內容有：總務、人事、經費、修築河堤暨江南海塘工程案、江北運河江高段復堤工程處等各工程圖表、防汎委員會組織大綱、工程經費、委員名單。
7. 安徽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3函，內容為：總務、人事、請撥款修復江淮圩堤、農村合作事業、堤工進行、河堤決口、農田水利、堤工土方表、皖豫鄂邊界堤工、各工程竣工縱橫斷面圖、淮域上游各縣堤工計畫圖表、安徽省境淮河全圖。
8. 浙江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函，內容為水利案件。
9. 江西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函，水利案件。
10. 湖北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2函，內容為：人事、業務、經費。
11. 湖南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4函，內容為：水利委員會組織章程、沅酉工程處總務、訴願、經費案、臨湘縣江堤經費、漢口至長沙、長沙至常德水道疏濬、藕地口堤修築工作報告、工程驗收、資水流域業務、資水測量地形圖、灘險圖、各灘工程計畫及圖表、各航道整理工程縱橫斷面圖、平面圖。
12. 四川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0函，內容為：組織、人事、訴願、經費、川江水利概況、岷江業務、嘉陵江、都江堰、沱江業務、萬縣、

重慶水位表、涪江業務。

13. 福建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函，內容有：人事、業務、經費。

14. 廣東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函，內容為：總務、人事、業務、經費。

15. 廣西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14函，內容有：農田水利設計測量隊組織、農田水利貸款委員會業務、經費、整理柳江事務處組織、經費案、整理柳江工程處經費、都柳江測量隊經費、各個工程處業務、經費、各項排水工程報告、灌溉工程業務。

16. 雲南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5函，內容有：組織章程、移交、農田水利工程計畫及勘查報告、建設廳測繪隊施測滇省江河案、各縣水利工程及灌溉工程案、各種工程圖表。

17. 貴州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2函，包括農田水利貸款委員會業務、各河測量及整理工程業務。

18. 綏遠省（民國二十八年～三十年）：1函，有工程案、經費案。

19. 寧夏省（民國二十八年～三十年）：2函，內容有：各水渠二十九、三十年度經費案、農田水利五年計畫、河西排水溝工程計畫。

20. 新疆省：1函，內容為紅鹽地蓄水庫工程，時間不詳。

21. 青海省（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年）：1函，內容為水利工程案。

22. 西康省（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年）：3函，內容有組織規程、人事、業務、經費。

23. 上海市（民國二十七年）：1函，內容有高橋區工程業務。

（下期待續）

「謝彬先生遺著」簡介

賴惠敏*

謝彬先生（1887--?）字曉鐘，生於湖南省衡陽縣西鄉金蘭寺，中學畢業後獲選東渡日本，進早稻田大學研習政治經濟。民前七年（1905年）加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同盟會，與革命人物黃興、蔡鍔過從甚密。民國四年返國後，任職財政部特派員，奉命調查新疆省阿爾泰特別區財政，歸來後尋任中華書局編輯工作。其後又出任湖南省政府秘書長、軍法執行總監部及軍事參議院秘書長等職。

就任公職之餘，謝彬還孜孜不倦地寫作。凡有遊歷必詳察當地文物禮俗，兼及經濟教育狀況，隨時筆記，故所著之遊記多種，其中以〔新疆遊記〕最為著名，續有〔雲南遊記〕。此外，又稽考當時國內政黨發展寫作了〔民國政黨史〕。關於實業方面著有：〔中國郵電航空史〕、〔中國鐵道史〕兩種。再者，因關心中外邊境問題而著述以下四書：〔中國喪地史〕、〔西藏交涉略史〕、〔國防與外交〕、〔蒙古問題〕。這些書曾因戰亂四散，近年來經由其子女昆明、宗徽兩位苦心搜集並再度出版，殊甚可貴。茲將上述各書簡介如下：

〔新疆遊記〕共三十萬字，是記述作者足跡所至之湘鄂豫直東三省陝甘西伯利亞諸地，其財政、民生、道里、名勝、險要無不詳諸博採。對新疆阿爾泰兩地更加細述，舉凡財政、吏治、軍事、國防、教育、實業、外交、交通、建置、疆理，皆按地考察，條陳意見，以供有志經營西北者參考。

〔雲南遊記〕，為作者參加「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時之遊歷日記。由海道前往雲南，途經廣州、香港、瓊崖、安南，作者除了陳述當地風土民情外，並比較中國與英法治理之地的秩序差異。至雲南後，作者留心此地社會教育問題，終日埋首於圖書館研讀史書、方志等。其次，又全力於礦產調查，有關礦區的開採方式、售價、數量都一一記載。中英邊界問題，如片馬交涉的內容，作者亦詳加考證以便於日後劃定邊界。其它像雲南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作者也略有述及。

〔民國政黨史〕，民初政黨之繁多、複雜是前所未有的。作者按照時間先後逐一描述，並且說明各政黨組成得的時間、人員姓名、黨章大要、政黨組織的目標。最後附錄中又有內閣更迭史、政黨系統詳表、政黨的剖析、節譯小野塙喜平次的政黨評論、第一屆國會議員之變遷、帝制運動之人物、中國國民黨改組案、民國十二年研究會會章要點與政學會幹部人員。本書所參考的資料以報章雜誌為主，中日專著為輔，再加上作者親歷所記，誠然是研究民初政黨之最佳參考書。

〔中國郵電航空史〕一書，主要偏重郵政部份，電信、航空所佔篇幅極少。郵政事業始於清末，自赫德設郵政局後，傳統的驛站、文報局、信局等紛紛倒閉，而新式郵局之規模、組織、設備皆日益完善，不但在郵寄工作獲

得人民信賴，而且充份吸收民間資金，擴大郵政儲金業務。作者並對民初各地郵區略為考證，凡是郵政發達地區必然是人員克盡厥職、設備完善。

〔中國鐵道史〕在敍述鐵道興築沿革歷史，以列強爭路權為重點。列強興築鐵路時要求開發當地產業及劃分勢力範圍，對華借款又甚為嚴苛，有關鐵道管理權、修路權皆歸債權國。又利用銀行公司所提供之借款，乘機占有鐵道興修權，民初政府數次與列強交涉結果和條約本書皆有記載。此外，關於鐵道行政機構、法令、財政項目、路線系統，作者都逐一說明。最後是介紹中國境內鐵道的歸屬，何者為國有或民有，及當時修路情形是國人承辦或外人承辦。

〔中國喪地史〕分析中國喪地的原因有四：戰爭、贈與、勘界、遺忘。喪地的範圍包括邊地、藩屬、租界、領海及海峽。作者援引中外所定的各項條約內容，說明中國喪失邊地的數量，同時他也認為凡在歷史上臣服於中國的藩屬，其領土亦為中國所有，經遭列強蠶食則危及本土。再者，外人設置行政區域於中國，如租界地、鐵道附屬地及公使館，破壞領土主權之完整，又為陰謀者以此地域策動內亂，餘患無窮。

〔西藏交涉略史〕，作者交待了中國與西藏的歷史淵源後，又說明在清末兩國關係惡化因素，以致西藏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中英兩國曾開會討論西藏問題，擬定條約來解決，至民國十三年皆未有具體結果。本書重點在敍述森姆抵會議之過程，及此後的中英交涉。另外，作者也順便提到清季西康的經略情形，如改治、籌設行省經過等。

〔蒙古問題〕本書的前半部在討論清代與蒙古關係，清朝對蒙採懷柔政策以維持和平。包括滿蒙通婚、禮遇活佛、參觀制度，對畜牧區的保護等。清末俄屬布里雅特事至蒙古傳播喇嘛信仰，並建寺廟，僧侶利用入侍達賴喇嘛的機會，從中斡旋，蘇藏訂下協約。拳亂時，俄人假藉保護蒙古名義駐軍庫倫，1911年外蒙宣佈獨立，四年後簽定中俄蒙協約，雖認外蒙為自治政體，屬中國領土一部份，而實權盡由俄人操縱，1921年白軍攻佔庫倫，俄國赤黨協助外蒙青年志士宣佈外蒙第二次獨立，並推行多項新政有教育、交通、實業、金融、稅制等。

〔國防與外交〕民國初年中國邊地在列強的環伺下岌岌可危，作者因親歷西北熟悉形勢而發表議論，不過本書所談到的問題皆見於上述的邊疆史專著中。

政大社資中心有關 中國近現代史資料介紹(二)

陳 方 中*

四、專書

表十五 工具書及索引

收 藏 室 別	書 名	出 版 者	出 版 年 月	備 考
博碩士論文室	各院校研究生博碩士論文題要	社資中心	民38~75	
政大出版品室	中外期刊及報紙目錄①	社資中心	民61	
報 紙 室	報紙論文分類索引②	社資中心	民51~77	
文 史 資 料 室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選錄			
普 通 資 料 室	黨史會孫逸仙圖書館中國近代史圖書目錄	黨史會	民72	
普 通 資 料 室	黨史會孫逸仙圖書館中文期刊目錄	黨史會		
普 通 資 料 室	國史館圖書目錄、卷一、總書庫、卷二，公報文史研究室，卷三，清史研究室	國史館	民69	
普 通 資 料 室	國立中央圖書館日文舊籍（臺灣分館）目錄		民73	
Microfiche	中國現代史資料目錄	中研院近史所	民57	
Microfiche	職員錄		民2~24	
普 通 資 料 室	日報論文索引	革命實踐研究院	民41~48	
政府出版品室	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目錄(三冊)		民57, 60~66 67~69	天一影印
政府出版品室	中華民國行政機關出版品目錄、1卷1期	中央圖書館		
政大出版品室	中共人名錄 2 冊	政大國關中心	民67, 72	
政大出版品室	中文微卷期刊論文目錄	社資中心	民54	
普 通 資 料 室	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	臺北中華書局	民68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普通資料室	中國近代學人象傳 別號索引	臺北大陸書局 臺北文海	民60 民68	
普通資料室	現代中國人物別號總覽	藤田正典	1986	東京
普通資料室	東三省官紳錄	田邊種治郎	民13	大連
普通資料室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	古亭書屋影印	民59	
普通資料室	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	楊家駱	民60	
經濟資料室	民國20~30年代中國經濟農業土地問題資料篇目分類索引	中國地政研究所	民69	成文書局影印
經濟資料室	中國農村經濟參考資料索引	國貿導報	民23	
東亞資料室	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編	上海圖書館	1966	
東亞資料室	1900~1975七十六年史學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	1981	
東亞資料室	中國史學論文索引	歷史研究所	1980	
東亞資料室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	香港三聯		
東亞資料室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資料索引	臺北大陸工作	民59起	
東亞資料室	東方雜誌總目 1卷~44卷	匪情資料中心		
文史資料室	中國史學論文引得1902~1962	北京東方雜誌	1950	
文史資料室	日文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	余秉權	1963	
文史資料室	一百七十五種日文期刊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	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特刊6。	1933	
文史資料室	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 (1934~1962)	同上13.	1940	
文史資料室	東洋學文獻類目③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34~1962	
文史資料室	現代中國關係中國語文獻總合目錄		1963~1983	天一影印
文史資料室	中國近現代史關係中文論文目錄	アツア經濟研究所	1984	
文史資料室	近代中國關係文獻分類目錄	アジア經濟研究所	昭和55年	
普通資料室	近代中國關係圖書分類目錄	東洋文庫	昭和48年	日文
普通資料室	近代中國關係歐文圖書目錄	東洋文庫	昭和49年	
杰人資料室	臺北帝國大學繼續刊行物目錄	臺北帝大	民26	日文

- 證明 ① 本期刊民國五十六年、五十七年及六十一年均編過，六十一年以後未再編印，六十一年以後收藏的期刊即缺乏紀錄。
- ② 本索引係按照中國圖書十進位分類法，將社資中心所藏中文報紙之論文分類，一年一冊，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 ③ 本文獻類目一年一冊，可說是期刊性質的書目書。

表十六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書籍

收藏室別	書名	作者	出版年月	出版者
Microfiche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王芸生	民21~23	天津大公報
Microfiche	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民17	
中山資料室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毛思誠	民25	
中山資料室	陳立夫先生言論集		民24	
中山資料室	胡漢民先生過越彙紀		民25	天一影印
中山資料室	葉夏聲		民9	上海興亞書局
中山資料室	蔣介石的革命工作		民16	上海太平洋書局
政治資料室	新廣東觀察誌		民11	
教育資料室	國民教育文庫①			商務印書館
經濟資料室	四年從政錄	陳公博	民25	商務印書館
經濟資料室	中國合會研究	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民24	
經濟資料室	農村家庭調查		民24	上海商務
經濟資料室	中國經濟調查報告——中國實業誌(冊)②		民21~26	上海
經濟資料室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馮和法	民24	上海黎明
經濟資料室	四川農村經濟	呂平登	民24	上海商務
經濟資料室	中國農村經濟問題	陳振鷺、陳邦振	民24	上海大學書局
經濟資料室	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	于家駒	民25	北平
經濟資料室	中國農村問題之研究	翟克	民22	廣州中山大學
經濟資料室	中國農業金融概要	中央銀行	民25	上海商務
經濟資料室	蘭谿農村調查	馮紫崗	民24	浙江大學
經濟資料室	廣東沙田問題	張超良	民26	廣東財政廳
經濟資料室	四川鹽政史③	珠巖山人高樹	民21	
普通資料室	武漢日報年鑑		民36	
普通資料室	申報年鑑		民22	
杰人資料室	英斂之文集④		民21	
杰人資料室	廣東十三行考		民26	上海商務
杰人資料室	馬相伯先生文集續編新編	梁嘉彬	民36	上海上智
東亞資料室	中國黨派		民37	南京中聯
東亞資料室	廣東扣械潮		民13	華字日報

東亞資料室	杰人論存	方豪	民30	香港國華
東亞資料室	政學罪言	潘光旦	民37	上海觀察報
東亞資料室	馬寅初經濟論文集		民21	上海商務
東亞資料室	西北建設論		民34	上海中華
東亞資料室	工業建設計畫會議簡誌		民32	
東亞資料室	近代中國留學史⑤	舒新城	民18	上海中華
東亞資料室	梁漱溟先生教育文錄	唐現之	民24	山東鄒平
東亞資料室	當代中國實業人物誌	徐盈	民30	
東亞資料室	安福痛史	南海胤子	民15	北平
東亞資料室	從鄧演達到聞一多——二十年來 蔣介石所殺人物		民36	香港風雨 書局
國貿資料室	今世中國貿易通志(上、中、下)	陳重民	民16	
國貿資料室	近五年來日貨輸入分類比較表	程振基	民17	上流商務

- 說明 ① 該叢書有五十冊，多與當時的教育方針及概況有關，如「談平教運動」，「成人班婦女班的實際問題」，「鄉村教育的經驗」……。
- ② 本叢書由實業部國貿局所編，分省然後分類，民國六十九年由宗青出版。
- ③ 本書為線裝兩函共十二冊，對四川鹽政有深入描寫，另有圖冊四本。
- ④ 其中包括也是集，英斂之文集續編、安塞齋叢殘稿、萬松野人言善錄，俱為天津大公報重印。
- ⑤ 另有民國二十年的「中國新教育概況」，民國二十二年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及民國二十五年的「近代中國教育史稿遺存」，均為舒新城的作品。

表十七 中共書籍①

收 藏 室 別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者	出 版 時 間
東亞資料室	中國共產黨烈士傳	華應申	香港新民主	1943
東亞資料室	中國近代史	范文瀾	北京人民	1953
東亞資料室	回民起義	中國史學會	上海神州國光	1953
東亞資料室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		北京人民	1953
東亞資料室	中國近代貨幣史	魏建猷	上海羣聯	1955
東亞資料室	戊戌變法	胡濱	上海新知識	1956
東亞資料室	太平天國資料目錄	張秀玉、王會庵	上海人民	1957
東亞資料室	鴉片戰爭	齊思和、林樹蕙	上海人民	1957
東亞資料室	捻軍	范文瀾	上海人民	1957
東亞資料室	捻軍史料叢刊	江世榮	上海商務	1957
東亞資料室	太平天國	中國史學會	上海人民	1957
東亞資料室	義和團	翦伯贊	上海人民	1957

東亞資料室	辛亥革命	柴德慶	上海人民	1957
東亞資料室	中日戰爭	邵循正等	上海人民	1957
東亞資料室	太平天國史迹調查集	羅爾綱	北京新華	1958
東亞資料室	捻軍資料別集	聶崇歧	上海人民	1958
東亞資料室	臺灣的發展	吳壯達	北京科學	1958
東亞資料室	清季重要職官年表	錢實甫	上海中華	1959
東亞資料室	捻軍史研究	江地、羅爾綱	北平三聯	1959
東亞資料室	義和團運動	金家瑞	上海人民	1959
東亞資料室	義和團檔案史料	國家檔案局明清檔	北京中華	1959
東亞資料室	美帝援蔣奴役中國	秦林舒	北京新華	1960
東亞資料室	洋務運動	中國史學會	上海人民	1961
東亞資料室	張謇和立憲派	李時岳	北平中華	1962
東亞資料室	辛亥革命五十週年論文集		北京中華	1962
東亞資料室	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從棉紡織看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過程			1963
東亞資料室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二冊)	張枏、王忍之	北京三聯	1963
東亞資料室	戊戌變法	中國近代史叢書	上海新華	1972
東亞資料室	中法戰爭	編寫組	上海新華	1972
東亞資料室	第二次鴉片戰爭	同上	上海新華	1972
東亞資料室	甲午中日戰爭	同上	上海新華	1973
東亞資料室	北洋軍閥	同上	上海新華	1973
東亞資料室	五四以來反動派地主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		北京人民	1974
東亞資料室	紀念長征勝利四十週年		北京人民	1975
東亞資料室	清季新設職官年表	錢實甫	北京中華	1977
東亞資料室	中國近代哲學史	侯外廬	北京新華	1978
東亞資料室	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	黎澍	上海三聯	1978
東亞資料室	懷念陶鑄同志	祁陽縣委員會	湖南新華	1979
東亞資料室	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		山西新華	1979
東亞資料室	太平天國史料專輯	中華文史論叢	上海新華	1979
東亞資料室	太平天國史話	董健	江蘇新華	1979
東亞資料室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二歷史檔案館	江蘇新華	1979
東亞資料室	滿鐵史資料	吉林社會科學院	北京中華	1979
東亞資料室	孫中山年譜	廣東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北京新華	1980
東亞資料室	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	何千之	上海人民	1980

東亞資料室	直皖戰爭	江蘇新華	1980
東亞資料室	孫中山全集	北京中華	1981
東亞資料室	劉鴻生企業史料	上海新華	1981
東亞資料室	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 1921~1923	中國革命博物館	1981
東亞資料室	回憶辛亥革命	北京文史資料	1981
東亞資料室	華僑與辛亥革命	中國社科院近代 史研究所	1981
東亞資料室	辛亥革命論文集	湖北省歷史學會	1981
東亞資料室	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	武漢大學歷史系	1981
東亞資料室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	上海社會科學院	1981
東亞資料室	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 料	中國社科院近史 所	1982
東亞資料室	侯寶林自傳	侯寶林	黑龍江新華
東亞資料室	陳慶日記	陳慶	北京新華
東亞資料室	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近代之部	中國社科院哲研 所	1983
東亞資料室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 會論文集		北京中華
東亞資料室	我的前半生	溥儀	北京新華
東亞資料室	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	蔡尚思	浙江新華
東亞資料室	張謇存稿	楊立強	上海人民
東亞資料室	江南一燕：瞿秋白生平和故居	何平	江蘇新華
東亞資料室	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	廣東革命歷史博 物館	1982
東亞資料室	論聯合政府	毛澤東	大連
東亞資料室	嚴復傳	王栻	上海人民
經濟資料室	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 1911）	宓汝成	北京新華
			1984

說明 ① 從此表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共方面的研究重點與臺灣史學界有相當大的差異，他們相當重視太平天國、捻軍、義和團等民亂的研究。辛亥革命亦相當受重視，但在他們歷史理論的框架中，已經被限制成一個歷史階段。1957年及1972, 73年是重要的年代，不少有系統的作品出現，1963~1972年間幾乎沒有作品，可見文化大革命對大陸史學界傷害之大。

表十八 日文書籍

收 藏 室 别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者	出 版 年 月
政治資料室	新國民政府の政治地位	福滿武雄		昭和16年
經濟資料室	支那經濟全書(34冊)		南滿鐵道株氏會社	明治40年
經濟資料室	北支那經濟總覽		學藝社	1935
經濟資料室	武漢地區重要國防物資源畜產 物調查報告		興亞會	昭和16年
經濟資料室	華南通訊		臺灣拓殖株氏會社廣東支店	昭和15~16年
經濟資料室	南支經濟調查叢書			民25
經濟資料室	廣東省基本工業、特殊工業、農 村副業調查報告			昭和14年
經濟資料室	支那工業合作社問題關係史料			昭和4年
經濟資料室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明治38年
經濟資料室	支那國民革命に於はら農民運動			昭和4年
經濟資料室	支那の鐵道		鐵道院運輸局	大正七年
經濟資料室	新支那建設の政治經濟問題		國際經濟學會	昭和14年
經濟資料室	福大情報①		南滿鐵道株氏會社	昭和14年
經濟資料室	滿蒙經濟大觀	後藤新平著、吳自強譯	上海民智書局	民18
經濟資料室	新聞紙行政處分通牒		臺灣總督府	昭和15年
普通資料室	中國國民黨左派の研究	山田辰雄	東京慶應	1980
東亞資料室	中國の幣制改革と國際關係	野澤豐	東京	1981
東亞資料室	中國近代史研究		東京汲古書院	1981
東亞資料室	辛亥革命の研究	小野川秀美、島田慶次	東方筑摩	昭和53年
東亞資料室	五四運動の研究(11冊)②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82
東亞資料室	新中國資料集成第三卷1949.10 ~1952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	
東亞資料室	臺灣近現代史研究		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所	東京龍溪 1978
東亞資料室	臺灣社會運動史③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東京龍溪 1973
東亞資料室	中國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	西村成雄	東京法律文化社	1984

東亞資料室	中國共產黨史	波多野乾一		昭和36年
東亞資料室	中國共產黨史	大久保泰		昭和46年
東亞資料室	農民運動と農村調査	王澤東		1950
東亞資料室	中國解放闘爭史=中國無產階級運動史	鈴江言一	東京石崎書店	昭和28年
東亞資料室	現代支那の根本問題	藤枝丈夫	東京叢文閣	昭和13年
東亞資料室	陰謀、暗殺、軍刀——外交官の回想	森島守一	東京岩波	昭和25年
東亞資料室	臺灣：苦悶するまの歴史	王育德	東京弘文堂	昭和53年
東亞資料室	臺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		東京龍溪	1974
文史資料室	愛書 1~15輯		臺北帝大圖書館	昭和 8 ~17 年
杰人資料室	祭祀公業並臺灣ニ於ケル特殊法律の研究	姉歯松平	東都東籍株氏會社	昭和13年
杰人資料室	臺灣風俗誌	片岡巖	臺灣日日新報	大正13年
杰人資料室	臺灣農民生活考	梶原通	臺北松浦屋	昭和16年
杰人資料室	臺風雜誌（中文）	佐倉孫三	株氏會社國光社	明治36年
杰人資料室	日據下之臺政	井出季和太、郭輝譯	臺灣省文獻會	民45
杰人資料室	日支交涉史之研究	秋山謙藏	東京岩波	昭和14年
杰人資料室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六興商社出版部	昭和17年
華僑資料室	華僑	井出季和太	福大公司	昭和47年
教育資料室	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	多賀秋五郎		
邊政資料室	滿蒙通覽			

- 說明 ① 福大公司位於上海，係日本在中國的情報蒐集機構，定期將情報傳送給南滿鐵道株氏會社。
- ② 共11冊，第一冊爲狹間直樹的「五四運動研究序說」，第二冊爲片岡一忠的「天津五四運動小史」，第三冊爲「日本帝國主義と五四運動」，作者爲簾本博生。第五冊爲陳來幸的「虞洽卿（ニノンル）」，第六冊爲「宋則文と天津の國貨提倡運動」，第七冊爲井川悟的「華洋義賑會と中國農村」，第八冊爲竹内賢的「周樹人の役人生活——五四と魯邊の一側面」，第九冊爲吉田富林的「五四の詩人王統照」，第十冊爲小林善文的「平民教育運動小史」，第十一冊爲「五四時期のジスメリズム」，作者爲小關信心。
- ③ 本書係「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由東京龍溪書店影印出版。

表十九 其他書籍

收藏室別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時間
東亞資料室	敵後黨務工作同志殉難事略彙編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	民52
東亞資料室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司馬璐	政大國關中心	民67
東亞資料室	中央蘇維埃的成立	司馬璐	香港自聯	1981
東亞資料室	蘇俄在華顧問回憶錄（六冊）①	汪精衛	國防部情報局	民64~66
東亞資料室	雙照樓詩詞稿	汪精衛	香港藍馬柯氏印務公司	1981
東亞資料室	一個黨員的敵後生活報導		大陸工作會	民63
東亞資料室	毛共批孔資料彙編		中央改造委員會	民41
東亞資料室	共匪重要資料彙編（10冊）		中央改造委員會	民42
東亞資料室	共匪重要資料續編（6冊）		臺北陽明山莊	民46
東亞資料室	共匪人事措施之研究	李振宗	臺北陽明山莊	民46
東亞資料室	共匪公安組織與人民警察	郭壽華	臺北陽明山莊	民46
東亞資料室	共匪基層組織之研究	徐政、戴鼎	臺北陽明山莊	民46
東亞資料室	共匪對黨外知識分子思想控制之研究	夏曉華	臺北陽明山莊	民46
東亞資料室	共匪對黨內思想控制之研究	項迺光	臺北陽明山莊	民46
東亞資料室	日本視察報告	張群		民40
東亞資料室	中共人民民主專政研究	楊仲揆	香港光大	民41
文史資料室	傳記資料②		天一影印	
杰人資料室	梁發傳（附勸世良言）		香港基督教輔教出版社	1955
杰人資料室	戴德生傳（內地會創始人）		香港證道出版社	1954
杰人資料室	中國大陸天主教真象		香港求是學社	1966
杰人資料室	浙江天主教小史（未刊稿）	方豪		
杰人資料室	臺灣史（手稿）③	方豪		
華僑資料室	華僑問題論文集1~21輯		中國僑政學會	民43~63
華僑資料室	南洋學會叢書④		新加坡南洋學會	
中山資料室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政治資料室	中國共產黨史稿二、三編（手稿）⑤	王健民		

- 說明 ① 第一冊為趙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初期戰史回憶（1924～1927）」，第二冊為東思茨：「中國日記」。第三冊為趙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四冊為阿吉莫夫：「中國兩年回憶錄」（1925～1927）。第五冊為：「加倫將軍總顧問室」（1925～1927），第六冊為「中國內戰志願兵回憶錄」，作者為普列馬科夫，第七冊為趙列潘諾夫的「蘇俄來華自願軍的回憶（1925～1948）」。
- ② 該資料係以人物為主，將各報紙、期刊、雜誌、學報上的資料影印成集，如袁世凱傳記資料，梁啟超傳記資料，張謇傳記資料等。
- ③ 方豪，字杰人，中央研究院院士、耶穌會會士、曾任政大歷史系主任、文理學院院長，在史學方面以宋史、臺灣史、天主教史為專長，退休後將其藏書捐贈給政大，社資中心特闢專室收藏，其中有不少善本書、手稿、信件。
- ④ 其中有新加坡華族會館志二冊，嚴幾道先生遺著……近代史書籍。
- ⑤ 該手稿可與已出版者比對。

五、結語

除表上所列資料外，社資中心將國史館、故宮博物館、中研院近史所，國防部史政局，黨史會的出版品搜羅的相當齊全。而民間出版社如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國期刊彙編，中國方志叢書，中國方略叢書、中國邊疆叢書；傳記文學出版社的民國史料叢書；學生書局的中國史學叢書；華文書局的中國省志叢書、中華文史叢書；廣文書局的史料七編、年譜叢書；東方文化書局的五十種期刊；南天書局的南方資料館珍本；華世出版社的中國經濟史料叢書；宗青圖書公司的中國年鑑集成、及漢珍縮影公司。古亭書屋的影印史料、搜羅的也相當完整，限於篇幅就不一一介紹。

由上述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社資中心所收藏的中國近現代史資料非常豐富，尤其以教育史、民國三十八年以後中華民國史，均有主要資料收藏，而對於其他專題的研究，則收藏有不可或缺的附屬資料。社資中心採開架式，取用資料、影印資料甚為便利，頗值得加以利用。

而社資中心亦有些許缺點，首先是書籍、論文上架的速度太慢，致使一些最近的研究無法在架上獲知。其次是有關收藏期刊、書籍的書目書近年未再製作，使用上較不便利。再其次為東亞資料室中一些沒必要封鎖的資料，如剪報資料、黨政資料等，一併深鎖其中，增加使用上的不便；最後或許是限於經費、人力不足，不少珍貴的史料如學部官報，三十八年以前報紙均未見處理，任由破碎、蟲蛀。

章太炎先生研究論著索引初編(二)

□章 念 駢 □

一、國內論著(續)

(二)1951年至1988年*

篇	目	作 者	刊 物 期 卷	發 表 日 期
章太炎先生的一封信		宋雲彬	新觀察	1951年
從章先生學		許壽裳	亡友魯迅印象記	1953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向魯迅學習		唐弢	在愛國基礎上共鳴	1953年11月平明出版社出版
章太炎先生醫事言行		陳仁存	仁存醫學叢刊(二)	1953年6月
光復會和同盟會的關係		李苑	光明日報	1954年10月28日
章太炎先生治喪委員會啟事			浙江日報	1955年3月30日
章太炎先生靈柩遷葬杭州			新蘇州報	1955年3月30日
章太炎先生靈柩昨日安葬南屏山			浙江日報	1955年4月4日
籲				
魯迅與章太炎及其同門諸子		林辰	魯迅事蹟考	寫於1955年。1958年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紀念愛國知識分子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		石峻	光明日報	1956年6月12日
魯迅論章太炎		于龍	浙江日報	1956年9月16日
因紀念魯迅而想到章太炎		宋雲彬	人民日報	1956年10月13日
章太炎夫人談發掘國學遺產		陶穎昌	文匯報	1956年10月26日
金鼎致梁鼎芬書			近代史資料(一)	1956年3月
魯迅和章太炎		宋雲彬	文藝月報(十)	1956年

* 缺1950年資料

從太炎先生「論中醫與五行說」	章 次 公	新中醫藥(七：十)	1956年10月25日
談起			
章太炎與日報	張 靜 廬	文匯報	1957年1月15日
章太炎在江蘇	曼 炎	新華日報	1957年1月16日
回憶章太炎先生	劉 文 典	文匯報	1957年4月13日
章太炎先生革命闖爭史中的一頁	湯 國 琦	雨花(八)	1957年8月
章炳麟與印度民族解放——兼論	丁 則 良	歷史研究(一)	1957年
章氏對亞洲民族解放闖爭的一些看法			
蘇報案實錄	張 篓 溪	辛亥革命(一)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章太炎的學術思想與革命精神	任 訪 秋	新建設(二)	1957年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補遺	馬 紂 倫	近代史資料(一)	1958年
章太炎的思想	王 維 成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文集	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章太炎與蘇報案	吳 弱 男	上海文史資料選輯 (一)	1959年
論光復會	李 時 岳	史學月刊(八)	1959年
章炳麟、鄒容、陳天華在同盟會成立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傳播的貢獻	鄧 樞	歷史教學(十)	同上
雜談章太炎	慕 容 華	羊城晚報	1957年4月13日
光復會性質的探討	羅 耀 九	廈門大學學報(一)	1960年
世載堂雜記	劉 禹 生	中華書局	1960年再版
評《光復會性質的探討》	張 維 訓	廈門大學學報(二)	1960年
章炳麟吳敬恒交惡由來	吳 相 工	中國現代史叢刊 (三)	1960年
編輯章太炎文集		光明日報	1961年6月14日
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	湯 志 鈞	文匯報	1961年6月13日
章太炎在《民報》時期的哲學思想	馮 友 蘭	文匯報	1961年7月14日
關於光復會性質和章太炎政治思想的討論	凡 凡	文匯報	同上
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革命派無神論思想的歷史特點	侯 外 廬	光明日報	1961年7月31日
蔡尚思講章炳麟思想的階級性	蔡 尚 思	文匯報	1961年11月24日
光復會性質的再探討	羅 耀 九	廈門大學學報(一)	1961年

- 章炳麟子一八九八年—一八九九年
在臺灣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叢書(一) 同上
- 辛亥革命時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 胡繩武、歷史研究(四) 同上
金冲及
- 辛亥革命與反滿問題 劉大年 歷史研究(五) 同上
辛亥革命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討
論的一些問題——(四) 對 劍南洋公學墨水瓶風潮和愛國
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幾個代
表人物的評價問題 學社——(座談記錄) 上海文史資料選輯 同上
記章太炎先生 任鴻雋 上海文史資料選輯 同上
(八)
- 略論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 王仁忱 歷史教學(十一) 同上
思想的形成
- 章太炎(中國歷史小叢書) 朱仲玉 中華書局 1961年出版
- 南開大學易夢虹副教授作學術報
告 評解章太炎的政治經濟思
想 丁潮 天津日報 1962年5月15日
- 章太炎的重農與均田思想 羅耀九 文匯報 1962年6月1日
論章炳麟思想的階級性 蔡尚思 歷史研究(一) 1962年
- 章炳麟早期政治思想的評價 陸景琪 山東大學學報(三) 同上
論章炳麟的思想面貌及其變化原
因——章炳麟思想研究之二 蔡尚思 學術月刊(六) 同上
-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封建意識試
析 羅耀九 學術月刊(六) 同上
- 康有為和章太炎最早把資產階級
社會學傳入中國 孫本文 江海學刊(六) 同上
- 辛亥革命時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 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章太炎先生家書》敍言 湯國梨 章太炎先生家書 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章太炎與惲鐵樵 章巨膺 新民晚報 1962年5月6日
章炳麟早期政治思想的評價 陸景琪 山東大學學報(三) 1963年
從顧炎武到章炳麟 周予同、學術月刊(十二) 同上

湯志鈞		
章太炎	朱仲玉	三聯書店
論章炳麟的政治思想	趙金鉅	歷史研究(一)
論章炳麟政治思想的階級屬性及 其發展的幾個階段——兼論研 究中的一些方法問題	孫守任	吉林師大報(二)
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學術思想評價	湯志鈞	文史哲(二)
章太炎《訄書》中的認識論	孔繁	光明日報
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	楊天石	新建設(二)
從反儒尊法到尊孔讀經——試論	沈漢	學習與批判(三)
章太炎思想的演變過程		
中國哲學史簡編——第八章第四節：章炳麟《訄書》中的機械唯物主義傾向	任繼愈	人民出版社
關於《秦獻記》和《秦政記》——從兩篇史論看近代的反復辟鬪爭	張豈之	西安日報
試談歷史上關於秦始皇的兩派論爭——從章太炎的《秦政記》	梁效	北京日報
《秦獻記》談起		
章太炎		天津日報
百代都行秦政法——讀章太炎的《秦政記》	工人學章	包頭日報
《秦政記》		
讀章太炎的《秦政記》、《秦獻記》	華師中文	湖北日報
《秦政記》、《節選》註釋		
章太炎	杜志文	浙江日報
章太炎早期的反孔尊法思想	宗英等	文匯報
法家與進步思想評價：章炳麟	吉林大學	吉林日報
章太炎與《秦獻記》、《秦政記》	中山大學	長江日報
	中文系	

二〇一

班工農

兵學員

同上

1974年7月11日

1974年7月15日

1974年7月16日

1974年7月18日

- 從《秦獻記》看秦始皇的知識分子政策——駁林彪、蘇修對秦始皇的污蔑 陝西省建工局大批判寫作小組 陝西日報 1974年7月18日
- 贊秦始皇勇於革新精神——讀《秦政記》 石儀 雲南日報 1974年7月23日
- 《秦政記》譯註 中山大學中文系 廣州日報 1974年7月30日
- 攻擊秦始皇是為了復辟——讀章炳麟《秦政記》《秦獻記》 黎毅 文匯報 1974年8月2日
- 珍惜戰鬪的傳統——讀魯迅對章太炎的評論 魏堅 浙江日報 1974年8月5日
- 尊法反儒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龍哲 黑龍江日報 1974年8月7日
- 章太炎 《秦獻記》譯註 中山大學中文系 廣州日報 1974年8月8日
- 肯定秦始皇的功績，痛擊封建復辟勢力——讀章太炎《秦政記》《秦獻記》 鄭文斌 長春日報 1974年8月9日
- 秦始皇是傑出的新興地主階級的革命家——讀章太炎《秦政記》 增俊 山西日報 1974年8月21日
- 章炳麟《秦政記》《秦獻記》 評註 大學物理系理論小組 安徽日報 1974年8月26日
- 秦始皇的歷史功績不容抹煞——盧源 天津日報 1974年8月28日
- 讀章太炎的《秦政記》 吉林日報 1974年8月31日
- 章太炎是怎樣評價《焚書坑儒》的——讀《秦獻記》 曉旭 河北日報 同上
- 歷史的車輪決不能倒轉——讀章太炎的《秦獻記》 王賽山 吉林日報 同上
- 讀章太炎的《秦獻記》 詩鼓 廣州日報 1974年9月2日

- 秦始皇『焚書坑儒』好——讀章 社員高德 天津日報 1974年9月3日
 太炎的《秦獻記》 良
- 攻擊秦始皇『焚書坑儒』就是爲 宋水龍 黑龍江日報 1974年9月4日
 了復辟倒退——讀章炳麟《秦獻記》
- 用馬列主義觀點評價歷史人物 烟台師專 大眾日報 1974年10月26日
 ——學習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札記 中文科
 魯迅學
 習小組
- 焚書事業是革命的專政措施—— 長沙港務 長沙日報 1974年11月14日
 讀章炳麟《秦獻記》 局第三
 作業區
 工人理
 論學習
 小組
- 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正確評價法家 陸維天 新疆日報 1974年11月22日
 ——學習魯迅雜文《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 不斷革命呼嘯向前——讀《關於 張愛羣 潘陽日報 1974年11月25日
 太炎先生二三事》札記
- 『任人唯親』是復辟倒退的路線 鹽城縣龍 新華日報 1974年11月26日
 ——讀章太炎《秦政記》的一 岡公社
 點體會 頑東
- 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評論法家—— 賴應棠 光明日報 1974年11月26日
 讀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 『焚書坑儒』是反對復辟的革命 吳仲畦等 新華日報 同上
 措施——讀章太炎《秦獻記》
- 章太炎和他的《秦政記》《秦獻記》 姚輝 浙江日報 1974年11月28日
- 秦王朝迅速滅亡的原因——讀章 謝冠英 湖南日報 1974年12月7日
 炳麟的《秦政記》《秦獻記》
- 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韓石丁 文匯報 1974年12月11日
 從尊法反儒到尊孔讀經——從章 沈漢 人民日報 1974年12月14日
 太炎思想演變看中國民族資產
 階級的特點

- 『拉車前進的好身手』——學習 陳孝英等 陝西日報 1974年12月17日
- 魯迅對章太炎的正確評價
學習魯迅，正確評價法家——讀 劉泰隆 廣西日報 1974年12月19日
-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評辛亥革命前後章炳麟的尊法反 周鶴鳴 安徽日報 同上
- 儒思想
學習魯迅評價章太炎的寶貴經驗 今貴、澄 理論與實踐（一） 1974年
- 川
《秦政記》《秦獻記》註釋 遼寧一師 遼寧一師學報（一） 同上
- 中文系
古代文
學教研
室譯註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分析 李兆峰 魯迅研究年刊創刊 同上
- 號
讀《秦獻記》 叢培欣 南開大學學報（二） 同上
- 從章太炎早期思想看近代的儒法 史進 西北大學學報（二） 同上
- 鬪爭
試談歷史上關於秦始皇的兩派論 梁效 北京大學學報（二） 同上
- 爭——從章太炎的《秦政記》
《秦獻記》談起
談章太炎的《秦政記》《秦獻記》華中師院 華中師院學報（二） 同上
- 中系文
七二〇
一班二
組工農
兵學員
革命潮流勢不可擋——談章太炎 申松欣 河南歷史研究所集 同上
-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刊（二）
- 讀章太炎《秦政記》有感 倪汝煒 河北大學學報（三） 同上
- 反復辟的戰鬪檄文——讀《秦政 四平聯合 吉林大學學報（三） 同上
- 記》《秦獻記》 收割機
廠工人
理論組
絕師反孔走革命道路的章太炎 歷史系二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同上

- 年級編 (三)
寫組
- 魯迅與章太炎——爲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八週年而作 張毓茂 遼寧大學學報 (三) 同上
- 章炳麟尊法反儒思想——兼論辛亥前後兩次儒法論爭 劉興華等 哈爾濱師院學報 (同上)
- 章太炎的《秦獻記》 鞏昌訓 南京大學學報 (四) 同上
- 『焚書坑儒』是秦始皇的革命措施——讀章炳麟《秦獻記》 政治系七 新江大 (四) 同上
- 章太炎的《秦政記》 陳小明 南京大學學報 (四) 同上
- 法家著作選讀——章炳麟《秦政記》 福建福州 福建師大學報 (四) 同上
- 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的尊法反孔思想 北京市設備安裝工程公司工人理論組、《近代中國史稿》編寫組 北京師院學報 (四) 同上
- 略論嚴復、章太炎尊法反儒思想及其演變 李瑜 中山大學學報 (四) 同上
- 評章太炎 黃金南 華中工學院學報 (同上)
- 論章太炎 馬列主義 南開大學學報 (四) 同上

教研室
大批判
組

儒法鬭爭概況		北京大學學報（六）	同上
章太炎《秦政記》譯註		黑龍江大學學報增刊	同上
學習魯迅對法家的正確評價：『大話袁世凱』的章太炎	中文系七三級魯迅學習小組	新江大（四）	同上
兩篇反復辟的戰鬪檄文——讀章炳麟的《秦政記》、《秦獻記》		安徽文藝（十一）	同上
章炳麟著作選		浙江人民出版社選編	同上
試談歷史上關於秦始皇的兩派論爭——從章太炎的《秦政記》、《秦獻記》談起	梁效	論述法家和儒家鬭爭部分文章匯編	1974年人民出版社資料室出版
革命必須經過『血戰』——讀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柳益久	天津日報	1975年1月9日
一面歷史的鏡子——讀《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康洛文	廣州日報	1975年3月2日
論章太炎的愛國主義思想	蘇長風等	新華日報	1975年4月15日
讀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昌文駒	湖北日報	1975年4月21日
要在革命鬭爭中改造自己——從章太炎的思想演變談起	毛賢君	大眾日報	1975年7月13日
裁軍是假、用兵是真——讀章太炎《弭兵難》	蘇州市長風廠工人理論小組	光明日報	1975年10月16日
聲討保皇黨的反儒檄文——讀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鐘山恆	南京師院學報（一）	1975年
章太炎教育言論選註		昆明師院教育革命	同上
反對孔學的英勇戰士章太炎	教卓	同上	同上
我們的鬭爭需要馬克思主義——學習《關於太炎先生二三	蔣心煥	山東師院學報（一）	同上

事》札記			
論章太炎的思想演變	南京有線 電廠《 章太炎 詩文選 註》小 組、南 京師院 中文系	南京師院學報（一）同上	
論章太炎反對復辟帝制的闘爭	黃渭楊	南京師院學報（二）同上	
論章太炎的尊法反儒思想	吳熙釗	中山大學學報（二）同上	
學習魯迅論章太炎	王忠愈	四川文藝（二）同上	
章太炎勇闖袁世凱	黃渭楊	廣東文藝（二）同上	
章太炎的歷史觀和他的法家思想	湯志鈞	文物（三）同上	
——讀《致吳君遂書》手迹			
讀章太炎《訄書》	唐文權	思想戰線（四）同上	
《秦獻記》和《秦政記》的寫作年代	沈漢	學習與批判（六）同上	
倒退是沒有出路的——讀章太炎的兩首詩	劉繼才	遼寧文藝（七）同上	
從《訄書》的修訂看章太炎的思想演變	湯志鈞	文物（十一）同上	
章太炎著作選註	蘇州市『 章太炎 著作選 註』編 輯組編	蘇州市革命委員會 政工組大批判組 印	同上
簡明中國哲學史——第十二章（三）『資產階級革命家——章炳麟的唯物論無神論和尊法反儒思想』	楊榮國主 編	人民出版社	1975年出版
學習魯迅，永保革命青春——從章太炎劉半農談起	周建人	光明日報	1976年2月26日
《訄書》（名詞解釋）		光明日報	1976年4月1日
《訄書》（民報）		同上	同上

舊民主主義時期的革命派，新民	石 鏡	同上	同上
主主義時期的復古派——簡論			
章太炎一生			
從章太炎落伍談起——讀魯迅《翟 軍》	天津日報		1976年4月7日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有感			
用階級分析方法看『同路人』	施 達	甘肅日報	1976年7月8日
——學習魯迅《關於太炎先生			
二三事》			
『既離民眾，漸入頹唐』——章 侯 林 等	大眾日報		1976年8月25日
太炎退伍析			
章太炎爲什『頹唐』？讀魯迅雜 文《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凱 文	長江日報	1976年8月27日
以章太炎的頹唐爲戒	劉 獻 川	湖北日報	1976年8月31日
倒退是沒有出路的——魯迅雜文	陳 樹 立	湖南日報	1976年9月6日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讀後	湯 志 鈞	文物 (一)	1976年
《訄書》修訂和尊法反儒——原 刊本、手校本、手改本等研究			
讀《訄書》	黎 耀 元	華中師院學報 (二)	同上
魯迅和章太炎——學習魯迅札記	查 國 華	破與立 (四)	同上
	蔣 心 煥		
『拉車前進』還是『拉車屁股向 後』——讀魯迅《關於太炎先 生二三事》	方 玉 火	杭州大學學報 (五)	同上
永遠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學 習魯迅有關章太炎、劉半農的 論述	周 慶 基	徐州師院學報 (五)	同上
略論章太炎倒退的根源	廣東師院 中文系	新教育 (五、六)	同上
	三年級		
	一班三		
	組		
章太炎與反袁鬪爭——讀《致伯 中書》手迹	湯志鈞、莊園禾	文物 (九)	同上
章太炎詩文選註	上海章太 炎著作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年出版

編註組

- 略論辛亥革命前後的章太炎 趙均寧 光明日報 1977年3月24日
- 辛亥革命是儒法鬭爭嗎？ 樊百川 歷史研究（一） 1977年
- 魯迅論章太炎 任訪秋 開封師院學報（二 同上
、三）
- 評辛亥革命時期的章太炎 孫孝思 哈爾濱師院學報（ 同上
三）
- 論章太炎 唐振常 歷史研究（一） 1978年
- 章太炎的一副對聯 王益知 同上 同上
- 論章太炎 徐方治 廣西民族學院（二） 同上
- 關於《秦獻記》的主題及其他 崔富章 杭州大學學報（三） 同上
- 章太炎和孫中山 湯志鈞 社會科學戰線（三） 同上
- 章太炎剖析 李澤厚 歷史研究（三） 同上
- 讀史札記二則——章太炎與光復會 彭英明 華中師院學報（四） 同上
- 章太炎的民主革命思想及其演變 宋仲福 甘肅師大學報（四） 同上
- 章太炎與光復會 華中師院學報（四） 同上
- 章太炎在主編《民報》時期的哲學思想 孔繁哲 哲學研究（五） 同上
- 章太炎與端方關係考析 楊天石等 南開大學學報（六） 同上
- 章炳麟文學理論述評 黃海章 中山大學學報（六） 同上
- 《秦政記》的一個句讀問題 戴鴻森 歷史研究（六） 同上
- 論同盟會的性質及其內部分歧 章開沅 歷史研究（十一） 同上
- 中國文學史——第九編第五章第一節：『章炳麟、秋瑾等革命作家』 游國恩等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8年出版
- 章太炎的『參與投壺』 湯志鈞 光明日報 1979年9月25日
- 中國近代哲學史——第七章：『侯外廬主』 人民出版社 1978年出版
- 章太炎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及其哲學觀點』 編
- 日刊評論中國研究章太炎動向 何培忠 國外社會科學（一） 1979年
-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章開沅 華中師院學報（一） 同上
- 章太炎文學簡論 任訪秋 開封師院學報（一） 同上
- 同盟會的分裂與光復會的重建 楊天石、王學莊 近代史研究（一） 同上

- 章太炎與端方關係補正 曾業英 同上 同上
- 章太炎與《高橋杜氏祠堂記》陳鐵健 歷史研究(二) 同上
- 試論章太炎政治思想的階級屬性 黃德馨 武漢師院學報(三) 同上
- 從《秦獻記》《秦政記》寫作年 崔富章 文史哲(三) 同上
- 代談起
- 試論章太炎的經學和小學 楊向奎 歷史學(三) 同上
- 論章炳麟和光復會 李時岳 吉林大學學報(四) 同上
- 章太炎在《民報》時期的思想演變 唐文權 華中師院學報(四) 同上
- 《民報》時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 朱維鋒 復旦大學學報(五) 同上
- 試析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 王有爲 學術月刊(六) 同上
- 章太炎是什麼派?——與唐振常 李潤蒼 歷史研究(七) 同上
- 同志商榷
- 章太炎反滿民族革命思想初析 黃綺文 『孫中山與辛亥學術討論會』論文 1979年11月
——兼論章太炎不是地主階級
- 反滿派
- 中國哲學史——第八篇第七章：任繼愈主 人民出版社 1979年出版
『辛亥革命準備時期章炳麟的哲學思想』編
- 章太炎年譜長編(上、下) 湯志鈞編 中華書局 1979年出版
- 對嚴復、章太炎、梁啟超和王國春 鋒 光明日報 1980年2月3日
- 維的新評價
- 章太炎挽孫中山聯辨偽 湯志鈞 光明日報 1980年4月29日
- 章太炎和他的小友 小史 北京日報 1980年7月6日
- 章太炎斥西太后聯語一則 吳嘉靜 文匯報 1980年8月6日
- 關於『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戴學稷 光明日報 1980年8月26日
- 魯迅與章太炎 姚平芳 羊城晚報 1980年10月15日
-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的一點訂正 吳競 江蘇師院學報(一) 1980年
- 論中國近代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姜義華 復旦學報(一) 同上
- 關於亞洲和親會 湯志鈞 辛亥革命叢刊(一) 同上
- 章太炎的《社會學》 湯志鈞 歷史論叢(一) 同上
- 論章太炎的哲學思想 楊向奎 同上 同上
- 章太炎與《清建國別記》 袁英光 同上 同上

- 魯迅與章太炎 王士菁 學術論壇（一） 同上
- 對章太炎在東吳大學時『赴學尋問』的江蘇巡撫的考辨 吳競 江蘇師院學報（一） 同上
- 章太炎『七次追捕，三次入牢獄』解 唐文權 辛亥革命叢刊（二） 同上
- 辛亥革命前夕的章太炎 湯志鈞 同上 同上
- 章太炎的無神論與『無神教』 顧冕君 中國無神論思想論 文集（二） 1980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 關於章太炎的『以大勛章作扇墜』 鄧嘯林 羣眾論叢（三） 1980年
- 戊戌變法時期的章太炎 唐文權 中國哲學（三） 同上
- 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 河田悌一 貴陽師範學院學報 同上
著，王富山、吳雁南譯
- 章太炎《秦獻記》的寫作時間及其主要思想 焦樹安 文獻（四） 同上
- 章太炎手書《金鏡內臺方議序》 吳佐忻 上海中醫雜誌（四） 同上
- 章太炎旅臺事迹考略 客谷 復旦學報（五） 同上
- 章太炎先生論史學三題 李希泌 史學史資料（六） 同上
- 試析章太炎的政治立場 郭蕙清 昆明師院學報（六） 同上
- 章太炎《定威將軍陳君墓志銘》 書後 張其光 學術研究（六） 同上
- 章太炎不是中國教育會發起人 熊月之 華東師大學報（六） 同上
- 辛亥前關於革命策略問題的一場爭論——從章太炎《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談起 王有爲 辛亥革命論文集 1980年廣東人民出版社
- 辛亥革命前夜章炳麟矛盾的革命觀 吳雁南 辛亥革命論文集 1980年廣東人民出版社
- 章太炎 陳旭麓 民國人物傳（二） 1980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國哲學史——第五編第七章：『章炳麟的民主革命理論和哲學思想』 北京大學 中華書店 1980年出版
- 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十七： 金沖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出版

『章太炎和反滿思想』	胡繩武	
長眠西湖的章太炎	周慶鵬	蘇州遊踪 同上
章太炎與他的哲學思想	濮良賢	新疆日報 1981年3月13日
《章太炎吳虞論集》序言	黎澍	文匯報 1981年3月23日
章太炎和他的著作	王有爲	書訊 1981年6月10日
堅決反袁的章太炎	陳鷹	團結報 1981年7月18日
江蘇發現孫中山給章太炎復信		人民日報 1981年8月29日
『但保本來面目，莫詒千古語 言』——訪辛亥老人梁烈亞	賴良	文匯報（香港） 1981年9月5日
鄭容與章太炎	陸小姪	中國青年報 1981年9月6日
江蘇發現孫中山致章太炎復信原 件 這是一件十分珍貴的辛亥 革命文物		文匯報 1981年9月8日
章太炎和蔡元培的婚姻評議	熊月之	解放日報 1981年9月10日
章太炎	嚴如平	光明日報 1981年9月23日
《章太炎篆書千字文》出版	雨林	文匯報 1981年10月6日
《章太炎選集》問世	王有爲	同上
《章太炎篆書千字文》前言	沙孟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 1981年出版
不屈不撓的章炳麟	陳覺民	杭州日報 1981年10月8日
革命之志，終不屈撓	章導	文匯報 1981年10月9日
章太炎怒對袁大頭		遼寧日報 1981年10月11日
章太炎的獄中生活	杰俊杰	解放日報 同上
軟禁中的章太炎		文匯報 1981年10月12日
新發現的章太炎醫學佚文	習中	健康報 1981年11月12日
章太炎挽孫中山聯	邇冬	團結報 1981年11月21日
關於章太炎挽孫中山對聯的通信	李任夫、 邇冬	團結報 1981年12月12日
章太炎先生的醫學見解	廖家興	浙江中醫雜誌（一） 1981年
章太炎的醫詁眉批按語	吳佐忻	中華醫史雜志（十 一二四） 同上
從章太炎手稿看《秦政記》的一 個句讀	郭君	社會科學輯刊（一） 同上
記先從父季剛先生師事余杭儀征 兩先生事	黃焯	訓詁研究（一） 同上
章太炎前期的政治思想	黎振國	中山大學研究生學 同上

- 試論章太炎哲學思想的演變
《訄書》版本述略
- 章太炎前期的政治思想
- 章太炎的最後一首詩
章太炎的政治搖擺簡析
論清末佛學思想的特點
論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民族主義宣傳及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
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古典文章的光輝典範
太炎先生二三事
- 略論陶成章
試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
『排滿』與民族運動
章太炎反對資本主義經濟嗎？——與李澤厚同志商榷
辛亥革命前的章炳麟
魯迅論章太炎的倒退
章太炎書贈魯迅字幅辨證
『四百兆民視此冊』——章太炎的《〈孫逸仙〉題辭》
魯迅與章太炎
- 康有為和章太炎最先傳入社會學
關於章太炎的書法
論章太炎佛學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評章太炎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 刊 (二)
唐文權 哲學研究 (二) 同上
崔富章 圖書館研究與工作 同上
- (二)
黎振國 中山大學研究生學 同上
- 刊 (二)
盛巽昌 社會科學戰線 (三) 同上
朱宗震 四川師院學報 (三) 同上
蔡尚思 學術月刊 (三) 同上
林家有 中山大學學報 (三) 同上
- 鍾憂民 學術研究叢刊 (三) 1981年
- 王仲犖 揚州師範學院學報 同上
- (三)
唐文權 江漢論壇 (三) 同上
李潤蒼 近代史研究 (三) 同上
章開沅 同上 同上
李潤蒼 辛亥革命叢刊 (三) 同上
- 顏澤鏗 徐州師院學報 (四) 同上
廖欽 貴州社會科學 (四) 同上
沈倬 社會科學輯刊 (四) 同上
陳鴻祥 淮陽師範專科學校 學報 (四) 同上
姜峻 牡丹江師院學報 同上
- (四)
陳樹德 社會科學 (上海) 同上
(四)
- 念馳 書法 (五) 同上
高振農 社會科學 (上海) 同上
- (五)
王有爲 社聯通訊——紀念 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專輯 (增五)

章太炎與王陽明	朱維錚	中國哲學(五)	同上
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的哲學述評	姜義華	中國哲學(六)	同上
與侯外廬論章太炎書二札	田慕章	同上	同上
章炳麟《支那內學院緣起》書後	田光烈	同上	同上
章太炎先生的晚節	金德建	人物(六)	同上
章太炎談讀史日程	朱政惠	文史知識(六)	同上
論章太炎向唯心主義轉變的原因	何成軒	哲學研究(六)	同上
章太炎軼函註考	皮明麻、孔憲凱	學術月刊(六)	同上
章太炎晚年的一首詩	金德建	書林(六)	同上
辛亥革命前後片段回憶	汪東	蘇州政協文史資料(六)	同上
試論章太炎的國粹主義	李潤蒼	四川大學學報(九)	同上
章太炎與龔振鵬	金德建	南京師院文教資料簡報(九)	同上
蘇報與蘇報案	周元高、費毓齡	上海政協文史資料——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專輯	同上
湯國梨談章太炎(上)	胡覺民(整理)	同上	同上
憶辛亥革命前後先父章太炎若干事	章導(章念馳整理)	同上	同上
辛亥革命光復會領袖章炳麟、陶成章合傳	樊光	同上	同上
試析國粹派經學的兩重性	羅福惠	辛亥革命七十週年青年學術討論會	同上
《民報》與章太炎	曾永玲	同上	同上
跋烏目山僧癸卯詩三首	章開源	中華學術論文集	同上
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章炳麟撰《龔未生傳略》註	許仲和	浙江文史資料	同上
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陶冶公	同上	同上
光復會的組織與發展	陶冶公	同上	同上
光復會與同盟會的分歧和合作	陶冶公	同上	同上

章太炎選集（註釋本）	朱維鏗、 姜義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出版
中國哲學史稿——第七篇第九 章：『章太炎』	孫叔平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同上
中國哲學史綱——第五章第四 節：『章太炎早期的政治觀點 和學術思想』	侯外廬主 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同上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第二十 九章第二節：『章炳麟』	敏澤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年出版
爲章太炎畫像	徐清軒	新民夜報	1982年6月4日
太炎先生的筆	田翠竹	團結報	1982年6月26日
讀史與愛國——章太炎勉勵青年 研讀史書	王政	解放日報	1982年7月15日
章太炎題聯	姬樹明、 俞鳳斌	中國青年報	1982年11月7日
《章太炎全集》第一集簡介	王有爲	書訊（六十九）	1982年11月10日
淺論章太炎對資產階級政體的批 評	孫虹	光明日報	1982年12月8日
喜讀《章太炎全集》第一集	王有爲	光明日報	1982年12月15日
章太炎故宅章園列爲蘇州文物保 護單位	孫鵠	新民夜報	1982年12月29日
關於章太炎的評價問題	徐立亭	思想戰線（一）	1982年
論光復會	胡國樞	浙江學刊（一）	同上
『光復會並入同盟會』質疑	潘鶴松	同上	同上
章太炎的相對主義真理觀探索	何成軒	哲學研究（一）	同上
《章太炎年譜長編》訂補	胡珠生	近代史研究（一）	同上
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思想的階級 屬性的再認識	羅耀九	學術月刊（一）	同上
章太炎與社會學之傳入中國	許妙發	社會（一）	同上
《秦獻記》並沒有肯定焚書坑儒	馬進	四川師範學院學報 (一)	同上
記章太炎先生未刊手稿	支沖	社會科學（上海） (一)	同上
關於蘇曼殊生平的幾個問題	馬以君	華南師院學報（一）	同上
試論章太炎的社會經濟思想（待 易夢虹		經濟學集刊（二）	同上

- 續)
- | | | | |
|-------------------------------|--------------|------------------|----|
| 軟禁中的章太炎 | | 文藝 (二) | 同上 |
| 《訄書》簡論 | 姜 義 華 | 復旦學報 (二) | 同上 |
| 《民報》的續刊及其爭論 | 楊 天 石 | 中華文史論叢 (二) | 同上 |
| 古漢語復音詞研究法初探——章 | 劉 又 亭 | 西南師範學報 (二) | 同上 |
| 太炎《一字重音說》議疏 | | | |
| 試論章炳麟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思想 | 李 耀 仙 | 西南師範學院學報 (二) | 同上 |
| 章太炎營葬始末 | 章 念 馳 | 上海文史資料選輯 (二) | 同上 |
| 後期章太炎並不是『寧靜的學者』 | | | |
| 柯 安 | 學林漫錄 (二) | 同上 | |
| 《民報》案審訊補記 | 唐 振 常 | 社會科學 (上海) (二) | 同上 |
|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 是誰首先提出的？ | | | |
| 章太炎《鄒容》（兼《贈大將軍
鄒容墓志》）考釋 | 張 震 歐 | 廣東教育學院學報 (三) | 同上 |
| 章太炎道德論初探 | 羅 福 惠 | 華中師範學院研究 生學報 (三) | 同上 |
| 章太炎評康有為、那拉氏、袁世
凱、張之洞 | 孫理校點 | 復旦學報 (三) | 同上 |
| 章太炎被囚龍泉寺 | 舍江、丁 三 | 文物天地 (三) | 同上 |
| 湯國梨談章太炎 (續) | 胡覺民 (章念馳 整理) | 上海文史資料選輯 (三) | 同上 |
| 章太炎致電支持『一·二九』學
生運動 | 湯 志 鈞 | 同上 | 同上 |
| 《民報》與章太炎 | 曾永玲、魏友智 | 四川師範學院學報 (四) | 同上 |
| 章太炎與他的書法——從《章太
炎篆書千字文》出版說起 | 章 念 馳 | 書法研究 (四) | 同上 |
| 章太炎在臺灣 | 湯 志 鈞 | 社會科學戰線 (四) | 同上 |
| 章太炎與中日文化交流 | 李 潤 蒼 | 歷史知識 (四) | 同上 |
| 錄章太炎《捫虱齋曲本序》 | 樊 鵠 | 辛亥革命史叢刊 | 同上 |

(四)

關於評價章太炎（綜述）		人物（四）	同上
章太炎史學思想中的辯證法	羅福惠	華中師院學報（五）	同上
章太炎的哲學思想	何成軒	學習與思考（五）	同上
關於章炳麟政治立場轉變的幾篇 佚文	駱寶善	歷史研究（五）	同上

章太炎的道德觀	羅福惠	江漢論壇（五）	同上
論章太炎的道德觀	孫國華	齊魯學刊（六）	同上
知人論世的有益嘗試——評《章 太炎選集》註釋本	陶玉華	讀書（六）	同上

章太炎與日本的無政府主義	李潤蒼	學術月刊（六）	同上
章太炎與孫中山	廖公城	歷史知識（六）	同上
魯迅與章太炎	唐文權	魯迅思想研究（八）	同上
章太炎與《臺灣日日新報》	彭興	社會科學（上海）	同上

(十二)

傑出的愛國主義志士——章太炎	章念馳	同上	同上
章太炎先生在重慶	李潤蒼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同上

(十三)

《小學略說》注釋	唐文	全國第一屆訓詁學 會論文	同上
章太炎與我國訓詁學的發展	周雙利	同上	同上
章炳麟	湯志鈞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 上冊	1982年增補本中華書 局出版
辛亥革命前後的章太炎	無敬	辛亥風雲	1982年出版
章太炎	姜義華	中國現代學術家傳 略（一）	1982年山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
章炳麟	冉隆清	中國近代著名哲學 家評傳下冊	1982年齊魯書社出版
章太炎（中國近代史叢書）	熊月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出版
章太炎先生遺札未刻稿跋	潘景鄭	社會科學戰線（四）	1982年
吳檢齋章太炎師生二三事	吳鴻邁	團結報	1983年3月19日
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	沈春彥	遼寧日報	1983年4月20日
章太炎復食	山石	羊城晚報	1983年4月26日
章太炎徵婚	路茲	羊城晚報	1983年6月8日
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	陸君田	廣西日報	1983年12月15日

- 章太炎先生三數事 周季子 團結報 1983年12月24日
- 《訄書》《檢論》三種結集過程 朱維鈞 復旦學報（一） 1983年
- 考實
對章炳麟、孫文、康有為及其思想的研究 河田悌一 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 同上
- 瘋人『章太炎』 王咏賦 人物（一） 同上
- 蘇報案與鄒容之死 呂濤 史學月刊（一） 同上
- 章太炎的無神論思想及其向有神論的轉變 何成軒 晉陽學刊（二） 同上
- 章太炎與《民報》的革命宗旨 李潤蒼 社會科學戰線（二） 同上
- 《西岳華山廟碑》和章太炎先生 沈家駿 紹興師範專科學校 同上
- 的跋 學報（二）
- 論章太炎的民主思想 熊月之 蘇州大學學報（二） 同上
- 章太炎先生賈子義抄 沈延國 歷史論叢（二） 同上
- 章太炎的文學語言觀芻議 董國炎、山西大學學報（三） 同上
- 辛爲稼
- 章太炎等反對日本政府封禁《民報》的鬭爭 李潤蒼 歷史檔案（四） 同上
-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口號的由來及評價 徐輝琪 近代史研究（四） 同上
- 章太炎寫的一副壽聯 金德建 書林（四） 同上
- 試論章太炎的史學思想及其成就 杜蒸民 史學史研究（四） 同上
- 章太炎在日本 李凡 東北師大學報（五） 同上
- 《章太炎年譜長編》補（一九一—一九一二） 湯志鈞 辛亥革命研究叢刊 1983年
- 論章太炎的文學觀 時萌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 同上
- 權藤成卿和章炳麟的交游——來往筆談錄 沈澤誠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 究（五） 同上
- 章太炎究竟生於何年 李希泌 文史知識（十） 同上
- 我的治醫經歷 葉橘泉 蘇州文史資料選輯 同上
- 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資料 胡珠生 中國哲學（九） 同上
- 章太炎與鄒容——兼論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 唐文權 江蘇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論

文集

浙江書林散記——浙江圖書館所印所藏章炳麟著作	洪 煥 春	浙江文獻叢考	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關於魯迅研究的若干設想——魯迅與章太炎	王 元 化	文學沉思錄	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章太炎年譜長編》補（光緒二十四年十月至光緒二十五年五月）	湯 志 鈞	文史（十八）	1983年
康有為與章太炎	周 予 同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	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章炳麟	徐和雍主編	中國近代名人小傳	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國哲學史——第六章：『章太炎早期的唯物主義』排天說和後期的佛教唯識論	蕭蓮父、李錦全	人民出版社	1983年出版
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第九章：『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政治思想』	邵 德 門	法律出版社	1983年出版
近代中國八十年	陳旭麓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出版
哈同外傳	徐 磬 成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3年出版
忘山廬日記	孫 寶 瑩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重版
『初文』與『准初文』關係初探	元 鴻 仁	西北民族學院學報	1983年
追憶陶成章先生（原名《光復會的點點滴滴》）上、下	馬 異 伯	團結報	1984年4月21、28日
章太炎遷居蘇州的曲折	鄭 逸 梅	團結報	1984年6月2日
資產階級的宣傳家——章炳麟	宋 佩 華	光明日報	1984年6月13日
章太炎與劉師培決裂前後	葉 知 秋	南京日報週末	1984年7月21日
大器推尊顏太守，窮途痛哭李將軍——章炎炎悼念淮上軍總司令張匯滔的挽聯	侯 鴻 緒	團結報	1984年11月3日
章太炎與蘇報案	魏 蘭 英	文史知識（一）	1984年
章太炎先生佚文	謝 任 甫	同上	同上
魯迅與章太炎	趙 福 年	魯迅研究（一）	同上

- 忘年之交的歷史故事——章太炎 陳 言 老人天地 (一) 同上
- 與鄒容
- 論章太炎反帝愛國的民族革命觀 劉興華 北方論叢 (二) 同上
- 從一個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 近藤邦康 社會科學戰線 (二) 同上
- 想
- 章炳麟李大釗思想之研究 近藤邦康 國外辛亥革命史研 同上
究動態 (三)
- 試論章太炎的社會經濟思想 (下) 易夢虹 經濟學集刊 (三) 同上
- 從主觀唯心主義到客觀唯心主義 何成軒 社會科學輯刊 (三) 同上
- 章太炎的本體論的探討
- 章太炎在東吳大學 吳競 中學歷史 (三) 同上
- 章太炎晚年與甲骨文的一段公案 何新 讀書 (五) 同上
- 日本學者論章太炎思想的轉變 浙江學刊 (六) 同上
- 章太炎的史學觀點和方法 李潤蒼 學術月刊 (八) 同上
- 記我的祖母——章太炎夫人湯國 章念馳 浙江辛亥革命回憶 同上
- 梨
-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學思想 唐文權 中國哲學 (八) 同上
- 黃季剛贈平剛詩及其他 談瀛 貴州文史叢刊 同上
- 章太炎和孫中山關於國家政權建設理論的比較 朱仁顯 紀念光復會成立八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
- 章太炎是地主階級反滿派嗎？ 王遂今 同上 同上
- 章太炎倫理思想述評 沈善洪、 同上 同上
- 王鳳賢
- 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的民族主義 黃順力 同上 同上
- 思想剖析
- 蘇報案中一公案——吳稚暉『獻 唐振常 上海圖書館建館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 章太炎與《民報》 姜義華 同上 同上
- 章太炎的革辯與《解辯髮》 湯志鈞 同上 同上
- 中國文學史綱要——第七篇第六章第二節：『章炳麟、秋瑾、鄒容、陳天華』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出版
- 章太炎 呂濤 百代英傑 1984年北京出版社出

			版
章太炎頌安重根	天 逸	人民政協報	1985年7月12日
偶讀《章太炎婚禮記》	屠再華	浙江日報	1985年7月31日
記章太炎先生《訄書》原刻本的 稿本	徐小蠻	文物 (一)	1985年
章太炎先生致吳承仕的六封論學 書——兼正《章炳麟論學集、 釋文》之誤	李希泌	文獻 (一)	同上
重建光復會評述	姚輝	浙江學刊 (一)	同上
試論章太炎思想的矛盾性	閻振貴、 劉繼才	遼寧教育學院學報 (二)	同上
章太炎的倫理思想論略	唐凱麟	湖南師大大學報 (三)	同上
試論章太炎的社會經濟思想 (下)	易夢虹	經濟學集刊 (三)	同上
章太炎借「佛聲」作「民聲」	李潤蒼	社會科學戰線 (四)	1985年4月
章太炎親口述生平	朱契	南京史志	1985年5月
記章太炎先生 (訄書) 原刻本的 稿本	徐小蠻	文物 (一)	1985年1月
章太炎的人性論與近代中國人本 主義的命途	姜義華	復旦學報 (三)	同上
章太炎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家	林慶元	歷史研究 (四)	同上
漫說章太炎的《謝本師》	黃落	人物 (四)	同上
紀念光復會八十週年學術討論會 側記	姚輝	浙江學刊 (六)	同上
章太炎先生在蘇州	沈延國	蘇州文史資料選輯 (十二)	同上
國事心常在，梨花手自裁——先 祖母湯國梨傳	章念馳	同上	同上
記先父母章太炎及湯國梨在抗日 戰爭中二三事	章導	蘇州文史資料選輯 (十四)	同上
章太炎與五卅運動	章念馳	上海文史資料選輯 (四十八)	同上
《章太炎傳》評介	夏來新	光明日報	1985年10月2日
我的外太公章太炎二三事	鄭立人	杭州文史資料 (四)	1984年10月
章太炎與報業	章念馳	編輯記者一百人	1985年學林出版社出 版

文章驚天地，精神泣鬼神——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	李 晶	中國近代愛國者百人傳	1985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第十六節：『章太炎與後期民報』	金沖及、胡繩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
論章太炎	李潤蒼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
章太炎思想研究	姜義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
孫中山、章太炎革命思想比較觀	吳雁南	孫中山研究叢刊（三）	1985年
簡論從批孔到尊孔的章太炎	任訪秋	中州學刊	1986年第五期
試論章太炎的邏輯思想及其成就	彭漪漣	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	1986年第四期
章太炎研究的最新進展	陳剩勇	浙江學刊	1986年第五期
買章太炎遺書記	孫犁	解放日報	1986年10月12日
章氏國學講習會紀略	錢鼎澄	團結報	1986年6月28日
浙江人的驕傲——章太炎	章念馳	浙江文化交流	1986年第三期
章太炎夫人湯國梨骨灰歸葬南屏山麓	姜青青	杭州日報	1986年4月6日
章太炎故居修葺一新	戚振林	人民政協報	1986年6月24日
近代之英傑復生之楷模——中外人士集會紀念章太炎	哈米	杭州日報	1986年6月15日
中外專家在浙探討章太炎	施宣圓	文匯報	1986年6月15日
章太炎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暨學術討論會在浙江舉行——杭州市決定在西湖畔興建章太炎紀念館	吳魁根	人民政協報	1986年7月8日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紀念章太炎大師逝世五十週年	李希泌	團結報	1986年6月21日
章太炎筆伐古應芬	吳威亞	同上	
太炎先生在萬縣	程魯丁、李小泉	同上	
章太炎與張學良	章念馳	人民政協報	1986年6月24日
近年章太炎研究——記章念馳的解紹	史之	社會科學報	1986年7月9日
章太炎與中國文化的新舊嬗替	姜義華	文匯報	1986年7月22日
——紀念章太炎逝世五十週年			

章太炎的故居和墓地	王 西 彦	羊城晚報「花地」副刊	1986年8月28日
章太炎先生著作出版情況解紹	章 念 馳	古籍整理簡報	1986年第一六二期
太炎先生又一事	司徐偉智	解放日報	1986年8月26日
如何評價章太炎	薛 鵬 志	文匯報	1986年8月
中華兩英傑——孫中山與章太炎	章 念 馳	孫中山與浙江——浙江省政協文史 社出版 辦編	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
增補本《章太炎先生家書贊言》	章 念 馳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 版本	1986年
章太炎先生學術論著手迹選《跋》	章 念 馳	北京師範大學	1986年
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手稿本《後 記》		上海書店	1986年
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	曹聚仁著 、章念 馳校訂	三聯書店	1986年
章太炎思想研究	唐文權、 羅福惠著	華中師範大學	1986年
餘杭文史資料——章太炎先生專 輯①	餘杭縣政 協文史 辦編		1986年
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②	章 念 馳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章炳麟的哲學思想	何 成 軒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章太炎年譜摭遺	謝 櫻 寧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年 社
章太炎生平與學術③	章念馳編	三聯書店	1988年
先驅的踪迹④	章念馳編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

說明：

①〔餘杭文史資料——章太炎先生專輯〕內容：

- (一)前言
- (二)先曾祖訓導君先祖國子君先考知縣君事略（章太炎）
- (三)伯兄教諭君事略（章太炎）
- (四)亡女叕事略（章太炎）
- (五)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蹟筆記（朱希祖）
- (六)倉前人的兒子——章太炎（章念馳）

- (廿)紀念祖父章太炎逝世五十週年 (章念祖)
- (廿)憶先父章太炎 (章叕)
- (廿)我所知道的章太炎先生 (鄭逸梅)
- (廿)紀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週年 (章長禧)
- (廿)憶先父與太炎先生 (沈廷發)
- (廿)章太炎婚禮記 (軼名)
- (廿)餘杭章先生墓志銘 (汪東)
- (廿)倉前鎮和太炎故居 (俞金生)
- (廿)關於「出族」的一點考證 (陳天風)
- (廿)章太炎與張老相公 (陳天風)
- (廿)餘杭太炎小學簡史 (張堯畔)
- (廿)章太炎筆下之錢塘儒醫仲昂庭 (胡穢)
- (廿)章太炎避難的龍泉寺 (馮玉寶)
- (廿)章太炎智卻童子試 (黃世譯)
- (廿)章太炎鄉試斥考官 (董占成)
- (廿)章太炎買書 (馮玉寶)
- (廿)章太炎為何自稱「餘姚人」? (黃世譯)
- (廿)章太炎婉拒北京客 (務本)
- (廿)章太炎初創注音符號 (黃世譯)

② [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 內容：

- (一)前言 (章念馳)
- (二)章太炎傳略 (姜義華)
- (三)太炎先生二三事 (王仲犖)
- (四)記章太炎先生若干事 (沈延國)
- (五)章太炎與後期《民報》 (金沖及、胡繩武)
- (六)關於亞洲和親會 (湯志鈞)
- (七)論章炳麟和光復會 (李時岳)
- (八)評章太炎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王有爲)
- (九)記先父母章太炎及湯國梨在抗日戰爭中二三事 (章導)
- (十)章太炎營葬始末 (章念馳)
- (十一)紀念太炎先生 (宋雲彬)
- (十二)國父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 (許壽裳)
- (十三)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 (呂思勉)
- (十四)章太炎的事業及其與魯迅的關係 (日、島田虔次)
- (十五)章太炎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家 (林慶元)

- (乙)太炎弟子論述師說（徐一士）
- (丙)章太炎早期的政治觀點和學術思想（侯外廬）
- (乙)《訄書》中的機械唯物主義傾向（任繼愈）
- (丙)章太炎與王陽明（朱維鋗）
- (乙)也談章太炎與王陽明——兼論太炎思想的兩個世界（澳大利亞、孫萬國）
- (丙)章太炎著作系年（湯志鈞）

③〔章太炎生平與學術〕內容：

- (丁)前言（章念馳）
- (乙)餘杭章先生墓志銘（汪東）
- (乙)章先生別傳（但植之）
- (丙)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
- (丙)悼念太炎先生時論（兩篇）
 - 悼太炎先生（香港《生活日報》）
 - 悼章太炎先生（巴黎《救國時報》）
- (丙)電、輓聯、國葬令
- (乙)章先生學術述略（龐俊）
- (丙)餘杭章氏學別記（臺、錢穆）
- (丙)章太炎先生之氣節（臺、潘重規）
- (乙)章炳麟之生平及其學術文章（臺、林尹）
- (乙)章炳麟與中華民國（美、汪榮祖）
- (乙)章太炎的科學成就及其對於公羊學派的批判（侯外廬）
- (丙)章炳麟的學術成就（臺、張玉法）
- (丙)章太炎剖析（李澤厚）
- (丙)章太炎進化觀評析（香港、王煜）
- (丙)《民報》中的章太炎（臺、朱法源）
- (丙)論章太炎的文學思想（吳文祺）
- (丙)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學思想（唐文權）
- (丙)章太炎的相對主義真理觀探索（何成軒）
- (丙)章太炎的人性論與近代中國人本主義的命運（姜義華）
- (丙)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日、河田悌一）
- (丙)從一個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日、近藤邦康）
- (丙)章太炎的《社會學》（湯志鈞）
- (丙)章太炎道德論初探（羅福惠）
- (丙)章太炎先生的醫學見解（廖家興）

④〔先驅的踪迹〕內容：

- (一)前言 (周谷城)
- (二)章太炎與興浙會 (胡國樞)
- (三)早年章太炎與西學 (熊月之)
- (四)章太炎與日本 (日、近藤邦康)
- (五)章太炎東京講學與魯迅 (張荅華)
- (六)論魯迅對章太炎的評價 (史莽)
- (七)章太炎先生晚年講學與愛國主義精神 (金德建)
- (八)關於晚年章太炎 (朱維鋸)
- (九)章太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命運 (姜義華)
- (十)試論章太炎的文化觀 (美、汪榮祖)
- (十一)辛亥革命與章太炎哲學思想的變化 (袁偉時)
- (十二)論章太炎辛亥革命時期的國家學說 (吳嘉勳)
- (十三)章太炎先生史學的核心——通史致用 (李希泌)
- (十四)論太炎先生的文學思想 (董國炎)
- (十五)試論章太炎的法律思想 (魏皓奔)
- (十六)試論章太炎貨幣思想中的合理內涵 (易夢虹)
- (十七)章太炎與中國語言文字學 (陸宗達、王寧)
- (十八)從《成均圖》看太炎先生對音學理論的建樹 (湯炳正)
- (十九)章太炎先生與金甲文字 (李慎行)
- (二十)《嶺外三州語》疏證 (謝棟元)
- (二十一)《說文部首均語》簡注 (陳冬輝)
- (二十二)讀《訄書》雜志 (徐復)
- (二十三)章太炎自題墓碑和有關手迹 (沙孟海)
- (二十四)章太炎的故居與墓地 (王西彥)
- (二十五)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綜述 (陳文錦)
- (二十六)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綜述 (章念馳)
- (二十七)編後 (章念馳)

附錄：學術討論會論文目錄

史料叢刊(9)：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

郭永亮著，七十九年二月出版，一二九頁 精250元、平200元

本書作者於青少年時代曾訪遍澳門全境名勝古蹟原址，後廣泛蒐集政府機關文庫所藏之文獻，及教會保存之歷史文件，並經仔細考查求證，方於二十年後整理完竣付梓。全書共分十章，除簡述澳門地理形勢及歷史背景，對澳門境內各砲臺、教堂古蹟，及早期澳門香港之關係，介紹尤為詳盡。

四川保路運動中極其重要的史料

——《西顧報》

戴 執 禮*

辛亥年，清王朝宣佈收鐵路幹路為國有，不僅奪走了川、鄂、湘、粵四省人民興辦的鐵路，也奪走了四省人民節衣縮食籌集的鐵路。湘、鄂、粵三省人民首先掀起保路運動，但因沒有羣眾基礎，很快就被清王朝鎮壓下去了。四川人民繼起反對，清王朝仍倒行逆施，堅持奪路刲款，四川君主立憲人士知道要與清王朝抗爭，非依靠廣大人民羣眾的力量不可，他們一方面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會，一方面辦了幾種報紙，以資宣傳鼓動，擴大影響。彭柔《辛亥遜清政變發源記》說：「奉節鄧慕魯（孝可）時客成都，謂政治、法律之觀念，不能盡人而具。至於條約解釋，更不能望於眾人。若非白話淺明剖析，不能盡人皆知。若無雜志、日報，亦不能搜羅宏富，印證明確。於是鄧慕魯、朱雲石（山）之雜志，池汝謙之《西顧報》、江序倫（三乘）之白話報，迺應時而起焉。」所謂鄧慕魯，朱雲石辦的雜志，筆者所見文獻均無記載，只說他們均擔任過《蜀報》主筆。江序倫之白話報，所見文獻亦無記載，或當時僅係擬議而未付諸實行。與《西顧報》同時創刊的尚有《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這兩種報紙都是四川保路同志會的機關報，矛頭都直接指向清王朝。當辛亥年農曆七月初一日（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保路運動發展到高潮時期，成都市實行罷市罷課，《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被迫停刊，《西顧報》以曾向清政府立案的合法地位作掩護，得以繼續出版發行。它對四川保路同志會和川漢鐵路公司股東大會的每一次會議以及廣大人民羣眾的活動，都作了詳細報導，對推動保路運動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無疑《西顧報》是我們現在研究辛亥革命史極其重要的史料。筆者見到的《西顧報》是從創刊到被查封共四十二號，迄今國內尚未發現過第二份。

* 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

《西顧報》是辛亥年農曆閏六月初一日（一九一一年七、二六）創刊的。日出一大張，共四版，報幅長二尺三寸五，寬一尺一。版面近似正方形。報紙以鉛字排印，兩面印刷。報頭上載「大清郵政特准掛號新聞紙類」，下載拼音報名和陰陽曆出版日期、發行地址、印刷所、編輯人、發行人、印刷人、報價及廣告價格。

辛亥年閏六月初一日《西顧報》第一號的報頭下載：「編輯人屈厚蕃，發行人蕭際昌」。閏六月初三日改為「代理編輯人池龍蓀，發行人蕭際昌」。或係原編輯屈厚蕃尚未到職，而以池龍蓀暫行代理。至七月初八日又改為「發行人蕭際昌，編輯人池梁矩」。或係屈厚蕃始終未能到職，這時始由《西顧報》的創辦人池梁矩兼任編輯。池梁矩一作梁矩，號汝謙，綦江縣人，舉人，江蘇省候補知縣，此時任四川省諮詢局議員。他任《西顧報》編輯，直至七月十五日（九、七）《西顧報》被趙爾豐查封為止。《西顧報》的印刷所是成都臥龍橋街昌福公司。發行所在成都會府北街二十二號。

二

《西顧報》是四川保路運動時期應時創刊的革命報紙，它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清王朝的。「西顧」二字，原出《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乃眷西顧」句。周朝祖先的原分地在商朝的西方，周文王曾封西伯。詩的原意是說：周積德行仁，所以得到上天的眷顧。而《西顧報》卻借用「西顧」二字來說明要重視西陲的四川；現在我們把《西顧報》創刊第一號登載的《西顧報出世辭》抄錄在下面，就可以看出它創刊的目的。

《西顧報出世辭》寫道：

夏日如年，酷暑蒸僵，蠅蚋咷噭，汗不停揮，此無奈何時也。少焉庭樹怒號，枝葉糾舞，烈烈狂風，捲地東走，霰沙霧塵，昏蔽天日，西方一片黑雲，大如車蓋，冉冉飛來。余顧謂童子曰：此非霖雨大旱者乎？言未竟，有客推門喜而告曰：《西顧報》出世矣。忽而電光赫赫，窗紙欲燃，一霆破空，攫拿而下，震驚七鬯，喪失魍魎。余目爲之眴，耳爲之聾，心爲之怦怦欲墜，曰：嘻！咄咄電也！其斯報之奇

彩乎？咄咄霆也！其斯報之先聲乎？公從何處得紙本？光價豈止百倍過，竊爲斯報詠矣。客曰：尙未，尙未。吾偵其內部，股分爲四：一曰編輯、羅致俊傑，敷陳時事，華衰斧鉞，胸有《春秋》。時賢所謂監督政府，代表輿論，是其天職也。如是者若而人。一曰法律、援據解釋，編爲三絕，囊笈歐美，奴隸申、韓，歸自海國，博辯以精。所謂防護人民權利自由也。如是者若而人。乃有蘇、張之亞，宓、白之流，遍干王公，歷抵卿相，得堵前尺地，卽穎脫以出，吾舌但存，猶燦蓮華。所謂急難有用，敢效微軀者，則交涉股也。其爲人也四。至於主管庫之萬錢，印寒陵之片石，出納記載，鉅細不遺，紙飛墨走，夥此青年，則庶務股也。其爲人也亦四。若乃溝通京滬，傳達五洲，行探坐訪，冥索遠搜，窮究萬變，瞬息千里，東西南北，隨處有人，吾不能詳其姓字者，則車之載而斗之量也。言次，大雨時行，簷溜澎湃，如奔萬馬，琴書襟袖，栩栩生涼，不覺拍案叫曰：快哉客也！快哉雨也！快哉報也！請浮一大觥，以爲客壽，卽以爲報壽可乎？客曰：可。張吻一吸，陶然竟去。余於是炷名香，煮佳茗，淨掃案塵，屏除積牘，揮塵靜坐，以待《西顧報》之餉余，時則窗隙放晴，瓶花欲笑。復爲詞曰：

乃眷西顧，詩人之旨。劍閣夔巫，代生奇士。舌劍筆刀，銛利若此。翕闌之唇，鏽露之齒。矯首嚙天，天光流紫。散彩錦江，照徹汙泚。浣花作籤，賣文成市。萬代千齡，寶此片紙。

《西顧報》創刊之時，正是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四十天與清王朝的抗爭出現膠著狀態的時刻。因此，《西顧報》一誕生便高喊「監督政府，代表輿論」，「防護人民權利自由」，「舌劍筆刀，銛利若此，翕闌之唇，鏽露之齒。矯首嚙天，天光流紫。」把矛頭直接對準清王朝，對清王朝奪路刦款，進行激烈的抨擊，給四川保路同志會增添了力量。尤其在七月初一日以後的罷市罷課，抗糧抗稅期間，配合保路同志會和股東大會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激烈抗爭，終於形成金川火海，導致全國起義，埋葬了清王朝。

三

《西顧報》的內容分《社說》、《本省紀事》、《京外紀事》（有時合併爲《京省紀事》）、《評刺》（第一號後改爲《時評》）、《要件》、《

《諺蔽》、《小說》、《竹頭木屑》、《報餘》，有時增闢《諺旨》、《外國紀事》專欄，遇有突出的事件時，又於《本省紀事》外增闢專題報導，有時又增闢《輒抄》。

當辛亥年閏六月十一日（一九一一年八月五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大會在成都召開之際，聚集了七、八百反對清王朝出賣路權的股東代表在成都進行抗爭活動，更把保路運動推向如火如荼的高潮。《西顧報》詳細報導了這些抗爭情況，對全川廣大人民羣眾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至七月初一日（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清王朝不顧四川人民的反對，悍然硬性任命李稷勳繼任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總理，奪走了川漢鐵路和路款，激起成都市民的罷市罷課，這一消息很快就被《西顧報》傳遍全川，形成全川人民的罷市罷課高潮。這時，由於《四川保路同志報告》極其露骨的宣傳鼓動，為清王朝所忌，被迫停刊，惟《西顧報》以曾經立案的身份為掩護，得以繼續發行。在《西顧報》的宣傳鼓動下，七月初八日（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股東大會便提議實行抗糧抗稅，把保路運動推向白熱化的階段。

《西顧報》的革命言論和刊登的革命史實很多，收入拙稿《新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的幾近百件，這裏因限於篇幅，僅舉幾例以說明它在四川保路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如下：

閏六月十七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一日）股東大會討論停止捐輸，羅綸說：「專制政府，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佔奪人民財，佔奪人民路，不許人民動作，不許人民張口，一張口，即威以違制之罪，何況主張停捐輸乎？！如畏得罪，對今之政府別無他法，祇束手就死；欲其不死，非謀抵制方法不可。政府有兵丁，我人民無兵丁，政府有器械，我人民無器械，何以能抵制？最好抵制方法，祇有不納租稅。彼政府既無錢用，則不能養士卒，又不能講器械，即不能蹂躪我人民也。」（《西顧報》閏六月二十日第十九號）。在尚未實行抗糧抗租稅的時候，《西顧報》即發表題為《川漢鐵路之惡果與四川人生命財產之關係》的《社說》，鼓吹四川人民與清政府斷絕關係說：「夫政府與人民之關係，必以權利義務為原則。有權利者必有義務，有義務者方有權利。政府對於人民，一方負有保護之權利，一方即享有徵收租稅之權利；人民對於政府，一方有負擔租稅之義務，一方即享受政府保護之權利。拋棄義務，即喪失權利。今政府奪路刦款，斷送路權於外人，是放棄其應負之義務也。既放棄其應負之義務，則其應享之權利，應即歸於消滅，而吾民與政府之關係，亦於斯而斷絕。是政府於吾民，奚啻對於吾民而宣戰，故吾民今為權利之主

張，勢不得不爲相當之抵禦，而相當之抵禦，即以不負義務爲最良之武器，所謂最良之武器者何？即於罷市罷課之外，實行罷稅罷租是也。……因此之故，必指爲叛逆，而以兵力從事；然等一死耳，與其吞聲忍泣，長爲亡國奴，受外人之蹂躪以死，曷若慷慨激烈，保存國土，受野蠻政府之威迫以死之爲愈也。……懷必死之心，以奮往直前，或者有不死之一日，生死存亡，間不容髮，是在吾川人之自擇耳。」（《西顧報》第三十五號，辛亥年七月初八日）。《社說》發表的當天，股東大會即進一步提議實行抗糧抗稅。第二天——七月初九日，股東大會即在成都成立執行抗糧抗稅的辦事處，並提議外州縣市亦設分辦事處，外州縣在成都讀書的學生亦請假回籍，協助執行抗糧抗稅。這些消息經《西顧報》登載後，外州縣即有攔截上糧的舉動，彭縣、新繁等縣也發生羣眾聚集打毀局所的行動。四川將軍玉崑在七月初九日上清帝的奏摺中就驚呼：「不納丁糧、釐稅、雜捐，二千數百萬之歲入，頓歸無著，四川一切行政固惟束手，而京都、洋償、解協等款，全無所出，貽誤實大。且滇、黔、新、甘、邊藏，向皆仰給於川者，亦將坐困。」（見一九五九年北京科學出版之拙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第二九二頁）。

上面所引《西顧報》刊載之股東大會活動及《西顧報》的《社說》，都充分說明《西顧報》在號召四川人民從經濟上打擊清王朝，並進行武裝革命。接著又直接了當地指出：罷市罷課、抗糧抗稅只是一種手段，要進行武裝革命才是目的。如《西顧報》在一篇《路權喪失後之慘劇》的《社說》中說：「罷市罷課、抗租稅等手續，不過對付橫暴政府之一種方法耳。實則吾川人今日所當共表決心者，莫外乎死之一道。但死亦有辨，與其獨死，無寧同死；與其死於異日，無寧死於今日；與其對於間接死吾者（指帝國主義列強）而致之死，無寧死於直接死吾者（指清王朝）而與之同死之爲愈也。不然，則路權既已喪失，即欲求一死所而亦恐不得，則其慘劇更有難以言語形容者。」（《西顧報》第二十三號，辛亥年七月十五日）。實則自七月初一日罷市罷課後，保路運動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罷市罷課以前，君主立憲人士，「日與政府言法律，辨是非」（《蜀黨史稿·辛亥革命紀事》語）。罷市罷課後，運動已超出維護憲政的範圍，也超出保路保款的範圍了。而是進入武裝革命的階段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武裝革命的序幕階段。至此，同盟會革命黨人朱國琛等見著武裝起義的機會已經成熟，遂散發出《川人自保之商榷書》，鼓吹四川獨立，從而爆發四川全民大起義，導致全國的武裝革命，結束了數千年來的專制統治。

* * *

在這裏我們還要特別指出：《西顧報》是四川君主立憲人士主辦的保路同志會的機關報，為什麼會公開鼓動武裝起義呢？要知他們並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是鐵板一塊，四川君主立憲人士的領導人蒲殿俊，早年在重慶時，就與同盟會革命黨人梅泰雨、朱之洪友善，留學日本時，又與張伯祥接近。這些事實都有蒲著《壺溪草堂詩集》卷二《寄和梅泰雨詩》可證。詩寫道：「昔交恥庸鄙，惟恐不異人。居然談革致，豈獨攻僞經（指參加強學會事）。乃至謀不軌，結士幕椎秦（指結交張伯祥事）。到今一回顧，新者亦已陳。惟有五福宮，拓爲駟馬門。……當時密謀處，篝火換華燈（指與朱之洪參加革命事）。」宣統二年庚戌八月（一九一〇、九）蒲殿俊與湯化龍、譚延闔等第三次向清廷請願要求速開國會時，被驅逐回籍。謝彬在《民國政黨史》中記載此事說：「湯、蒲諸人，知勢已無可爲，對於清廷絕望，遂歸原籍與革命黨通聲氣，別圖政治解決，厥後川路國有風潮，蒲氏殆爲主動。」栗戡時在《湘路案》中也寫道：蒲殿俊「被押解回籍，左學謙搭車送之，蒲告以國內政治已無可爲，政府已彰明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國，舍革命無他法，我川人已有相當準備，望聯絡省，共策進行。」四川君主立憲人士在四川保路運動中的作用，亦即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而《西顧報》又是探索這一問題的極其珍貴的史料。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七日

中研院近史所研討會論文集

①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精 500元	平 450元
②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精 700元	平 600元
③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1912-1927) (二冊)	精1400元	平1200元
④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精1300元	平1100元
⑤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精1400元	平1200元
⑥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精1400元	平1200元
⑦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精1500元	平1300元
⑧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精1500元	平1300元
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	精1110元	平1000元

函購七折，郵撥帳號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新書評介

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資中筠著。重慶，重慶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九七頁。

由於美國深深介入國共內戰（1945-1949），加上北京與臺北持續四十年的對立關係，美國在海峽兩岸的關係上又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內戰期間美國對國、共雙方的政策，一直是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所最關切的問題。尼克森政府於1970年代初開始進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加上美國逐漸開放此段期間的官方檔案，更在學界掀起研究1940年代末期中美關係的高潮。可以想見的是臺灣、大陸與美國的學者對內戰期間美國對華政策的解釋，往往政治立場鮮明，這種情況並未因美國官方文件的開放而消失。美國史家於1960年代即開始批判華府捨北京而就臺北的不智，中共史家則自始即認為美國不承認中共，即是「與數億中國人民為敵」（資著，前言，頁1）。親國民黨的史家如梁敬鎧等人，則於華府、北京公開接觸後，即開始批評美國自二次大戰期間便未坦誠與中華民國合作，甚且在雅爾達出賣中國之利益，以安撫蘇俄；內戰期間更屢屢掣肘，讓中共蒙受其利；中共勝券在握時，亦思儘早與其建立官方關係，實未嘗竭力支持過中華民國。

本書是大陸學界對中國內戰期間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興趣「日益濃厚」下的產物。作者資中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主要研究美國外交，特別是中美關係問題，她的看法可作為大陸學者基本觀念的代表。本書敍述自1945年春歐戰結束時起，至1950年夏韓戰爆發為止的美國對華政策。全書共分12章，前章依時間順序，分別討論了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等人對國共衝突的調停，1947年以後的有限度的援華，1949年的考慮從中國脫身，白皮書的發表；後面幾章則以專題的方式，討論對臺政策、國會和援蔣集團的作用，以及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大使的想法與作法。作者特別聲明，由於受到資料和其它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不討論國、共雙方對美國的政策，也只略述美、蘇、國、共四方面的錯綜複雜關係。

作者認為美國此一時期的對華政策，是「扶蔣」與「反共」兩部分微妙互動的演變過程。1944年10月的史迪威事件算是序幕，美國當時以「扶蔣」為主要政策，客觀上起了壓制中共的作用；1945年4、5月間，歐戰結束時，華府乃確定「扶蔣反共」政策；1948年之後，對「扶蔣」日益不情願，但是為了反共，不得不扶蔣；1949至1950上半年，美國考慮由此一政策中撤退，但幾經遲疑，終因韓戰的爆發而未果。1949年以後，由於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美國乃將原來「阻止中共統治中國」的政策目標，修改為「不讓中共取得臺灣」。雖然美國不準備用武力保衛臺灣，但作者認為由於中共未攻打該島，所以美國在實際行動上並未放棄支持蔣，韓戰等於提供華府採取軍事行動的機會，因而留下長期阻撓中國統一的政策。

在論述的過程中，作者指出，美國始終沒有把中共革命當作獨立的事件，故於中共勝利在望時，把政策目標訂為「阻止中共成為蘇俄的附庸」，因而將對華政策附屬於對蘇關係。加上戰後美國有將「門羅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擴展到亞洲的傾向，反共與反對蘇聯擴張遂成為一種方便的藉口：對外作為其放棄一貫標榜的「民主」和「自決」原則，以干涉他國內政道義上的依據；對內則藉以取得本國人民對其擴張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當時美國國內反共氣氛日益高漲，國會內外的親蔣活動亦進入高潮，當政者無法不公開表示其堅定的反共立場，因而在「扶蔣反共」的錯誤政策中越陷越深。而造成中共與美國敵對數十年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無法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乃是「中國內在矛盾所決定的歷史發展的必然」（頁385），且無法容忍一個完全擺脫美國勢力範圍的中國；即連主張儘快承認中共的實際派政府官員，亦無法擺脫一貫「恩威並施」的行為模式，而與中共領導人的平等要求，有認知上的差距，因此無法達成協議。作者因而認定，根據中共政權成立時的主、客觀條件，雙方接近的可能性極小，而美國應負造成兩者長期敵對的全部責任。

本書主要引用美國方面已出版的史料及美方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文資料較少，也都已出版。此書雖於1987年出版，但寫作時間可能較早，所引用之二手資料，未有晚於1983年出版者，且多為1970年代以前的作品，遺漏最近數年的研究成果，可算一大缺失。未出版史料則只列舉了美國國務院檔案與藏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顧維鈞檔案，且引用不多。作者並忽略了國務院以外政府單位，尤其是軍方的材料，也未參考杜魯門圖書館所藏資料。未出版史料多關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分析，與華府各部門

間的協商，為決策過程的重要部分。忽略這部分的材料，可能對政策的解釋會有所偏差。另外，作者常引用「中美關係白皮書」的敘述部分，來說明美援的情況，或用之批判國民黨。蓋白皮書乃杜魯門政府為應付國內批評其坐視中共席捲大陸所作，旨在將大陸的赤化，歸咎於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其可信度頗有商榷的餘地。由此可見作者取材偏頗之一斑。

除了引用的一手資料不夠周全外，亦間有重組（例如頁306-307之引文）或錯解材料的情形。舉其著者，則為頁123中引用「中美關係白皮書」內關於1946至1947年間，美方對國民黨實施軍火禁運的敘述，來證明禁運實際上並未影響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並以此強調內戰中，國民黨享有美國全力的支持。姑不論白皮書的可信度，即作者所引用的部分，該書原文亦只說明武器禁運，並未達到迫使國民黨立即答應停火的效果，而非如作者所言，宣稱對國民黨部隊的戰鬥力未產生影響。（見白皮書原本，頁181。）

除資料引用上的問題外，本書的幾個論點亦有可議者。首先是作者將美國政策定位為「扶蔣反共」，然美國在國共內戰期間，是否真有決心幫助蔣介石，並不惜與中共為敵，實大有商榷的餘地。當然美國不希望中國由共產黨控制，却相當正視中共在二次大戰後已擁有相當實力，必然會要求分享中國政權的事實，因此才會派員調停國共糾紛，意在避免中國內戰，導至蘇聯勢力在大陸擴張。姑不論美方對蔣介石與國民黨的印象在大戰末期即已急劇惡化的事實，殊難產生「扶蔣」決心；即若美方有此決心，何不大量提供美援，助蔣徹底打垮中共，反而強迫雙方籌組聯合政府，且不惜於1946至1947年間禁運國民黨軍火，以取信中共，並強迫國民黨同意停火？此為作者論點本身的邏輯不通之處。

作者所用以證明華府採取「扶蔣反共」政策者，為美國持續提供國民黨軍火武器，但未同等對待中共；另戰後美國協助運輸國民黨部隊接收日軍佔領區，却拒絕讓中共參與接收工作等事實。如此批判，完全站在美國應該把中共與國民黨政府同等對待的立場，可說完全忽略了當時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仍為美國所承認的事實。蓋美國就算理直氣壯的以為自己有干涉他國內政的「權力」，也不至於不智到公開供給一國內兩個敵對團體武器軍火。作者認為美援助蔣是挑唆中國內戰，却未想到若美國亦同時軍援中共部隊，才真是存心挑撥內戰。同理，協助戰勝盟邦的「政府」接收敵人佔領區，亦屬合理，不能作為美國存心「扶蔣反共」的證據。

雖然作者斷言美國決意扶蔣反共，却同時描述提供國民黨軍援的種種顧

忌和限制。蓋美方對於提供國民黨軍援的保留態度，每每形諸官方文件，難以全然忽視。不過作者却宣稱這些限制，只是為了達到宣傳效果，以平息中共指責美方不公的怨氣，實際上並未削弱國民黨的作戰能力。因此，作者在敘述美援的限制時，往往輕描淡寫，甚至在表列美援與停戰談判所遭破壞的比較時，亦未將1946至1947年之軍火禁運列入。（表見頁130-136）另一方面，她却以美方對援華的「提議」與「討論」，而非實際的「決議」與「執行」，來證明華府當時的政策是積極提供美援，幫助國民黨打內戰。政策討論與政策決定，甚或政策決定與實際執行間，往往有極大差異。換句話說，華府討論軍援不等於國民黨收到軍援。作者並強調，馬歇爾藉調停之名，行助戰之實。國民黨在馬歇爾使華期間，得到軍事利益，所以在馬帥離華時，「在軍力上，國共雙方是五比一，而重武器和空軍完全為國民黨所獨有……」（頁128）

根據作者的敘述，國民黨由於受到美國的全力支持，因此在內戰中毫無後顧之憂，也缺乏談判誠意，美國則坐視國民黨破壞一切停戰協議。在她的描述中，中共自始即愛好和平，並對美國的調停寄予厚望，也全力配合，無奈對方不合作。因此，資中筠認為國民黨與美國該負延長內戰，進而阻礙中國改革的責任。暫不論作者偏頗的取材方法，與政治立場鮮明的臆測，不符治史原則；即以其自身邏輯而言，也很難解釋為何國民黨在擁有絕對優勢的兵力與美國全力的支持下，仍然迅速落敗，兩、三年內即被逐出大陸？所謂「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云云，只能作為政治教條，絕非理性的歷史解釋。而宣稱中共有和談誠意，恐亦言過其實。蓋政治團體的鬭爭，莫不以取得政權為終極目標；蔣固欲消滅中共，中共又豈可能因「愛好和平」而滿足於分享政權？美國學者 James Reardon-Anderson 在他的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一書中，指出中共在二次大戰結束前，也就是1945年春，即已決意以武力向南擴張其勢力範圍（見 Reardon-Anderson 書，頁78-83），此亦無異於準備打內戰。

根據筆者的觀察，美國既未決意「扶蔣」，也沒打算與中共為敵——尤其在中共控制大陸後，更不會如此不切實際。蓋美國政府相當注意保存政策的彈性，避免任何承諾，以免限制了美國未來的行動自由，危及其國家利益。故華府政策中所缺乏者，恰是本書作者所強調的「決心」二字。不可否認地，美國戰後的外交作風，反映出相當濃厚的帝國主義「心態」；它亦想藉「門戶開放」的名義，保留在中國絕對優勢的影響力。不過認為此時美國

對華政策，已具體將其帝國主義心態化為實際行動——即經由幫助國民黨打內戰，以保障美國在華影響力——則未免過於誇張，也很難從史料中找到如此「政策設計」的直接的證據。

實際上華府決策者一致認為，中國內戰將會削弱美國在華影響力，因此他們才插手調停國共糾紛，以期避免內戰。由於這個觀念一直未變，所以華府不僅未曾策劃幫國民黨打敗中共，甚至屢次被迫修改其對華政策目標，從希望戰後中國有一個親美的非共政府、到中立的聯合政府，最後甚至願意接受非蘇俄附庸的共黨政府，皆因其未曾有「具體」的「帝國主義擴張計畫」，也不願付出太高的代價，來保存其在華影響力。而在帝國主義的期望與實際力量無法配合的情況下，遂採取「有限援華」的政策，一方面爭取國內對在西歐防共各項措施的支持，一方面也免得受譏為離棄盟友。如此有限制的美援，就算對國民黨有幫助，充其量也是延長其苟延殘喘的時間（美方決策者也確實只想拖延國民黨垮台的時間而已），却不能說是有計畫的「扶蔣」；而其就算稍微延後了中共全面控制大陸的時間，也難說是有計畫、有決心的反對中共。實際上美國對中共雖非友善，却極想保有將來打交道的餘地，故不能以兩者在韓戰後的對立，而判斷美國決策者自始即決定與中共為敵。

本書是少有綜述美國對華內戰整體政策的研究，對美國政策的本質，亦有其精闢的觀察，也超脫了中共史家動輒引用馬列主義來解釋歷史的窠臼。只可惜作者雖然參考了相當多的美方文件，却仍然無法擺脫中共官方解釋的陰影，以對此關鍵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提供較客觀的解釋。蓋華府於韓戰結束後支持國民黨政權，並拒絕承認中共政權的事實，並不能證明美國自始即決意幫助國民黨、打倒共產黨。美國希望能維持其在遠東地區優勢影響的帝國主義「心態」，也不等於其有實際擴張的計畫。作者對美國政策的批判，即確定美國政策為「扶蔣反共」的基調、強調美國基於帝國主義，而採取防止中共統一臺灣的政策，甚至認為美國竟然會愚蠢到支持一個註定要失敗的政權等等，均頗有「後見之明」、「倒果為因」的味道。總體而言，若能小心過濾其政治立場過度鮮明的論點，就不難挑出本書敘述中自相矛盾之處，從而一窺美國對中國內戰政策的部分真相，同時瞭解中共學者對美、國、共三方關係的看法與立場，因此本書亦可算是治中美關係史者應讀之著作。

□中研院近史所・張淑雅□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Denis Fred Simon and Merle Goldman. Cambridge: The Council of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本書由十四篇論文集合而成，執筆的十四位歐美學者各有所專，有史學家、政治學家、工商管理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史學家、化學家及藥學家等。各篇論文皆以「後毛政權」時代，中國大陸的科技革新政策為討論中心。內容包括：一、歷史背景，二、科技機構的改革，三、科技知識的應用，四、技術的轉移等四個項目。加上導論和結論，全書共計396頁。資料豐富、敍事詳實為其優點。惟文中舉凡中國人名、地名、機構名稱、和徵引的中文刊物等，皆未附中文對照，是其美中不足之處。各文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科技革新的困難或成就，作了縱橫的剖析。而科學與技術不能獨立存在，它與政治、經濟、社會、思想都有密切的關聯。因此本書的讀者對象並不限於科技專家。一般讀者也能從中獲得一葉知秋的訊息，是值得一讀的佳作。編者在導論裏面對全書的精華作了簡潔的介紹，是閱讀本書最好的指引。本文即據以作扼要性的譯述，以期達到推介本書的目的。

當一九四九年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之初，其主要施政目標之一即為科技現代化。但是自文革以來，中國的科技已遠遠落在西方甚至開發中的東亞國家之後。要使科技邁向現代化，較前更為困難，而企圖達成目標的願望也愈益迫切。於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後，發動了科技革新運動。中共領導階層體認到經濟、軍事上的強盛，和科技發展密不可分，決意先從科技革新著手，希望在二十一世紀初躋身強國之林。

回顧中國歷史，每個時代的科技發展，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束縛。古代中國在文人官僚體系下，基本上是不重視科學的。縱有不少技術發明，亦多出自藝匠，殊少有系統的理論研究。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傳來的西方天文、數學，不僅沒有立即改變中國數學的發展方向，反在十九世紀被中國學者將量化方法轉用於考據學，對於自然科學的影響極其微小。自強運動時期，中國雖欲借用西方技術，但又引起「體」「用」之說而降低了科技的層面。總之，在傳統文化籠罩下的中國科技，很難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民國以後，隨五四運動之起而發出科學與民主的呼聲。可是當時對科學、民主的認識不够充份，連懷疑主義和探索未知等基本心態亦未普遍萌

生，徒然淪為空洞的口號。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時期，由於少數留學歸國的科學家之貢獻，總算為現代科學作了一個開端，也為後來的中共時期奠下些許基礎。

毛澤東當政後，於一九五〇年代即推動了發展科技的種種措施。中共政府一面接受蘇聯專家和設備上的協助，同時也模仿蘇聯模式建置科技機構。這一套組織系統，著重國家科學院及其附屬機構，以軍事重工業為優先研究目標。以為在中央控制下的研究成果，會自然流向其他工業，並促成經濟起飛。但是事實上在蘇聯和中國，均未達成此一預期的效果。因為科學院和政府各工業部門的經費運用、研究方針的擬定等等，都操在行政官員之手，他們對於如何應用科技知識於工業生產線上，缺乏直接的體認。而且研究機構只有上下統轄關係，沒有橫向的聯繫，整個體系相當僵化。Richard P. Suttmeier 在結論中指出，隨蘇聯模式而來的馬列意識型態，也抑制了科技創新的蓬勃氣象。認為科技知識屬於人民所共有，科學家是人民的英雄，不需用金錢去鼓勵他們。在一九五〇年代，中國和蘇聯的科學都陷於所謂「賴辛科主義」(Lysenkoism) 的困境之中，使得遺傳學研究一度誤入歧途。第二章作者 Laurence Schneider 對於蘇聯農藝學家賴辛科 (T. D. Lysenko)，如何將政治意識滲入遺傳學研究，誤導了中國科學家的研究方向，有詳細的論述。

當然，中國的科技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兩度遭受了摧毀性的搖撼。毛澤東把政治性和社會性的觀念，強加於技術和經濟活動上去。他強調科技本土化，大眾參與和自力更生，企圖擺脫外力干擾。以共黨幹部、民眾代表取代專業人員主持技術工作。推翻象牙塔主義，學者被下放到工廠、農村去向人民學習。無數知識份子包括科技專家在內，普遍遭受攻擊、批判、或接受思想改造。這一連串作法，使得中國科技研究和教育，蒙受了莫大的損害。

及至鄧小平上臺，科技救中國的論調再度響徹雲霄。為彌補過去的缺失，中國派遣大批教授、學生往西方國家和日本去吸取新知。也邀請外國專家、學者到中國來教學，重新建立起與國際科技界的聯絡。Tony Saich 在第三章就科技組織的權力分配，討論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如何揚棄蘇聯式的中央控制，而授權予較低層次的科技機構，是助長科技發展的正確做法。Leo Orleans 在第四章敘述另一相關的改革，那就是各大學校除教育功能外，將步美國大學的後塵也擔負科技研究的任務。教授們的研究成果，可以

和純研究機構一樣地爭取工商企業的合同，致力於經濟發展，且可獲取報酬。政府甚至因此得以撙節一些研究經費。反過來說，從事研究的單位亦可因此取得部份自主權，不須完全受制於政府。在上海有些研究機構，作風更是大膽，它們與生產單位組成「研究發展與生產」的聯合組織，直接參與企業冒險。*Detlef Rehn* 在第六章對此現象有所描述。此外，市場力量的運用也是刺激科技創新的新方法。第五章作者 *William Fischer* 認為市場貨物的銷售，直接反映了消費者的需求，當人民的消費能力逐漸增加時，對貨物品質的要求也在提升。這種現象將可導引技術發明進入工廠生產。

人力資源的利用方面，中國在一九七八年以後也有不少改進。留學歸國的學生，對於官方派任的工作可稍有選擇，不像以前那麼僵化。而且現在也容許研究機構和企業單位簽訂研究合同。科技人才可以充份發揮所長。私人顧問公司亦相繼成立，以優良的科技知識與設備，提供資訊、企劃等服務。科技人才的活動空間大為增加。其實這種情形在南韓和臺灣早已存在了，是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毛政權時代將科技知識據為國有資源的現象，已不復存在。一九八六年，中國仿照美國的方式，成立了「中國科學基金」，提供資金獎勵新發明。這種獎賞辦法，無疑地可以激發更多的科技創新。科學研究機構如中科院的正副院長，現在不是官方派任，而是由全院同事選舉產生。讓專家主掌行政並制定研究方針，可增進工作效率與同僚間的和諧。時日長久之後，將有經驗豐富和份量足夠的學者領導人物產生，他們可以專家身份影響中央級的領導階層，擬定更高層次的科技政策。*Nina Halpern* 在第七章對於科技專家如何進入決策圈子的過程有深入的探討。

軍事工業原來只生產武器和軍用品，現在面臨經費拮据之困境。又鑒於私人企業的商業產品獲利頗豐，遂改變方針，也生產電視、冰箱之類市場需求旺盛的民用品了。據估計目前這類非軍事性產品的生產量，已達軍用品之半數。這一個大轉變，與五〇、六〇年代所奉行的蘇聯模式已大相逕庭了。

中國自一九七八年實行開放政策以來，對外交流關係蓬勃展開，對於科技革新影響最為直接。*Denis Fred Simon* 在第十二章裏指出：從外國引進的科技，就是中國科技現代化的催化劑。經由互惠協定，中國和西方先進國家發生研究合作關係，從而促進了研究資料與論文的交流。*Gail Henderson* 在第九章有關中國藥學現代化的討論，即道出了這種雙向交流的重要性。在毛政權時代，所重者在於大眾保健和社區醫療服務，現在則加強外國新技術的引進，以及醫療人員的專業化等。而且吸取新技術的對象，除美國、日本

外，已擴大到東歐、西歐、拉丁美洲等國家。

中國對於新科技知識求之若渴，但引進之後能否予以消化並有效應用則非易事。Roy F. Grow 在第十三章指出，輸入中國的各種新技術，在實際應用上並非事事順暢。例如管理之能否配合，亦為重要因素之一。Richard Baum 在第十四章敘述引進電腦所產生的諸多困難，就是最明顯的實例。

上述多方面的科技革新，其結果無形中提升了科技人員的地位，相對之下，握有政權的非科技人員則地位下降。所以在改革過程中，中共黨內不免有人從中施以阻撓。再者，也有人內心並不反對發展科技，但惟恐科技愈往高層次發展，專家的地位愈形重要，演變成一種特殊階級而形成新的社會問題。毛政權時代把科技和人民羣體劃等號的心態仍然存在。所以，在後毛政權時代，類似文革時期貶抑知識份子的運動仍然時有所聞。例如一九七九年的反民主運動，一九八一年的白樺事件，一九八三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以及一九八七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雖然不完全是針對科學家發起的，但中共政治領袖欲藉此警告所有知識份子，不可在思想上沾染太多西方文化毒素的意圖是極為明顯的。科學家方勵之受到黨方指摘即其一例。可是，西方的價值觀常常伴隨科技知識而來，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此乃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大難題。

討論中國的科技改革，應該和第三世界的情形合併觀察。當前大多數國家，在科技方面都有積極的作法。有的用政府經費直接從事研究計畫，有的透過市場需求間接鼓勵科技發明。中國一方面用市場力量導引科技發明，一方面在中央控制下，推動軍事工業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謂為雙管齊下。這種方式和印度、南韓、臺灣頗為近似。不過這些年來中國的科技，比較偏重某些特定項目的躍進如原子武器和洲際飛彈等，而忽視了全面性的發展。日本的科技成就，是中國亟欲效法的，但我們須知日本的成功並非一蹴可幾，他們的科技是建立在原有基礎上，再以穩定步法不斷研究、改進、創新、再創新，累積而成。政府不必永遠處於主導地位，只須在關鍵時刻施以協助即可。亞洲四條龍（臺灣、南韓、新加坡、香港）政府的干預也是重質不重量。多輔導，少干預。這也許是中國必須學習的地方。

另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乃是科技革新必須要有整體的配合。換言之，文化、社會、政治各方面都要作相應的調適，與之配合無間，科技現代化才可能順利達成。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的成功，都是極好的借鏡。然而中共如此積極推動科技革新，會不會影響其政治文化呢？目前尚難預測。因為這一股

改革熱誠能否持續下去，並能克服傳統文化及馬列意識的阻撓，仍是一個未知數。有鑑於上述多次思想清算運動，間歇性地對知識份子予以打擊，其前途不免令人擔憂。美國著名科學史家席文 (Nathan Sivin) 說：現代科技要建立在獨立發展的科學家羣體上，他們必須擁有自己的價值觀和高度的客觀性，無拘無束的馳騁在科學天地裏去思考、去探索。尤其重要的是不受阻撓地與世界新知保持接觸。席文的說法非常正確。因此，設若政治控制不予撤除，中國能否在二十一世紀初成為頂尖的科技大國，仍然是值得懷疑的。

□王萍・中研院近史所□

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俞辛焞著。東京，六興出版株式會社，一九八九年，三八八頁。

孫中山致力中國革命四十年，其間曾先後赴日本八次。居留日本時日，長短不居，共達十年之久，從這數字就可佐證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日本的密切關係。此外，中國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相繼在日本成立等事實，也一再顯示日本在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中所佔的特殊地位。雖然，兩者關係密切，但以此為主題的研究，至今還不多見，Marius B. Jansen 在一九五四年所出版的 *The Japanese and Sun Yet-sen* 仍被視為是探討這段史實的經典之作，但此書過於偏重探討日本國內政治的演變，對其標榜的主題孫日關係，卻欠缺深入的探討，因此只能算是一本介紹日本近代政治史的佳作。相對而言，俞辛焞的「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無論是主題的探討上，或是史料的運用上，都有其特別值得推崇之處。

俞辛焞，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是大陸學者中研究日本問題的佼佼者。全書除序章外，共分七章。

第一章「孫文的革命運動的興起與日本」，略論孫中山的成長過程及其與日本發生關係的來龍去脈。指出孫中山一直對日本的明治維新持仰慕的態度，認為明治維新可作為中國政治改革運動的楷模。這種寄望學習日本改革運動經驗的熱忱，是孫中山樂於接近日本的重要原因。但是日本對於孫中山的政策，完全根據日本的國家需要而定。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孫中山為了籌備廣州起義，曾向日本駐廣州領事請求武器支援，但為日本所拒。原因是日本自認國力不能及於中國南方，孫中山的起義即使成功，日本也無利可圖。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日本接納孫中山，無非是想利用革命

黨。時值甲午戰後，日本想利用南方的秘密會黨來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

第二章「中國同盟會與日本」，論述同盟會成立的時代背景及光緒三十三、四年（一九〇七—八）間同盟會所領導的各地起義活動與日本的關係。同盟會成立過程中，雖有少數日本友人提供協助，基本上同盟會的成立與日本沒有關連。但同盟會的成員多為留日學生，而這些學生往往是在接受近代文明的衝擊後，思想上得到啟發，進而獻身革命運動。作者從這個角度肯定日本與同盟會的間接關係，認為日本提供留日學生一個發展革命運動的客觀環境。此外，光緒三十三、四年間革命的根據地雖然已從東京移至法屬安南的河內，但日本仍舊是提供各地起義活動的武器來源。因此日本在同盟會成長過程中，一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此，作者也強調光緒三十三年三月日本政府應清廷的要求，將孫中山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要求孫離開日本之事，是孫日關係發生變化的轉捩點。自此孫中山開始懷疑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

第三章「辛亥革命與日本」，論述武昌起義後，南京臨時政府的對日外交，以及日本政府、軍部及民間團體的對華政策。初期的日本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清廷，但自袁世凱掌權後，鑑於袁與英國日趨接近，才開始有限度地支援革命黨。但基本國策還是如何利用中國內亂以擴展日本在滿蒙、福建及長江流域的權益。而日本軍部方面卻一直躍躍欲試，武昌起義四天後，海軍省就增派戰艦急赴中國沿海及長江流域，兩天後，陸軍參謀本部也開始派遣諜報人員到中國各要地佈署出兵事宜。但因列國的牽制及中國的局勢還不到失控的局面，日本軍部才無功而退。日本民間團體方面，卻與日本政府不同，他們一致同情中國革命。這些以「支那浪人」為主的民間團體，除製造輿論要求日本政府支持革命黨人外，並組團到中國，實際支授作戰，辛亥革命初期，孫中山對日本政府持不信任態度，認為日本隨時可能出兵干涉革命。此時他歷訪歐美，為的就是要牽制日本的對華政策。他也計畫訪問日本，準備親自和日本政府交涉，但因日本政府不允許他作公開的訪問，因而作罷。也因此造成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頗為緊張，但孫中山在返國途中，在香港和宮崎滔天等日本友人會面後，受他們影響，又開始肯定日本政府的對華友誼。積極尋求日本的援助；並與日本展開借款談判，希望藉日本外資解決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但因借款條件過於苛刻，遭致國內反對及英國的抵制，與日本的借款談判，除滬杭甬鐵路外，大多無疾而終。

第四章「二次革命與日本」，探討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孫中山以國賓身份訪日的前後背景與二次革命時，孫的對日工作及日本的反應。作者指陳

孫中山能以國賓身分成行，主要是由於桂太郎首相的斡旋。雖然孫中山啟程時，桂太郎已因政爭下臺，但孫中山仍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歡迎。在與桂太郎兩次密談中，桂太郎除指責袁世凱為民國之患外，並表達希望能與孫中山攜手合作，此外他也保證日本絕無侵犯中國的企圖。孫・桂的會談以及日本朝野的款待，使孫中山一掃過去對日本的猜忌，開始公然鼓吹中日親善。他肯定日本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並為已往日本對華政策辯護，認為這是國際形勢使然。同時他也與日本的財界合組中國興業公司，準備利用日本資金，發展他的鐵路建設計畫。此時期他與日本的關係已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但這段蜜月期為時甚暫。同年七月二次革命爆發，雖然，事前孫中山一再懇求日本給予軍事、經濟的援助，但不為日本所動。日本在謹慎評估雙方的勢力後，認定孫中山不堪一擊，因此以維持中立為口實，拒絕孫中山的求援。

第五章「三次革命的準備與日本」，研討二次革命後，孫中山流亡日本，力謀東山再起的過程。並解析孫中山在此時期針對日本政界、軍部、財界所做的各項企求援助的工作及日本各界的反應。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海外，日本原無意接納，後因犬養毅出面闡說，才勉為其難的准許孫中山入境，但對孫中山持冷淡態度。而日本財界方面，除婉拒援助孫中山外，並利用改組中國興業公司的機會，達到排除創辦人孫中山的目的。因而孫中山在成立中華革命黨之初，處境相當艱辛，對日本軍部的交涉也是求助無門。此刻，中華革命黨主要活動目標是中國東北，由陳其美、戴季陶等人負責籌畫，雖然進展迅速，但由於日本政府刻意壓抑，使東北起義活動，最後胎死腹中。爾後，因袁世凱執意稱帝，雲南興起護國軍，日本政府認為有機可乘，才開始改善中華革命黨的處境。當時日本的政策是支援一切反袁的力量，中華革命黨也在此政策下，組織東北軍在山東舉兵。舉兵的財源及軍事設備都由日本提供，此外，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有兩百名左右日本志願軍直接參與戰鬥。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又在打倒袁世凱的大目標下再度結合。

第六章「第一、二次廣東軍政府與日本」，檢討日本政府的對軍閥政策及對廣東軍政府政策的相互關係，並探討此一時期孫中山的日本觀。在此章，作者強調，孫中山對日本幻想的破滅係由於寺內內閣及原敬內閣的對華政策。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軍政府。同時他也派遣張繼、戴季陶到日本訪問，尋求日本朝野的支持，但無功而還。此刻的日本，正是西原借款大馳其道，主政的寺內內閣大量經援段祺瑞之時，為了阻止日本的援段政策，孫中山請辭軍政府大元帥後，也曾親赴日本，但也一樣的鍛

羽而歸。赴日二週，連一要人也未曾見到。至此，孫中山放棄對寺內內閣的幻想，將希望寄託在政友會總裁原敬身上。民國七年，原敬果然出掌內閣。孫中山認為原的出任總理，是爭取日本支援南方的一大契機，是以，孫中山不斷透過日本駐上海領事，尋求日本的支援，但原敬不為所動。原敬雖然不贊成前任內閣的援段政策，可是對孫也不具好感，認為孫中山是一空想的理論家。他所囑意的南方代表政治人物是唐紹儀，他希望南方在唐紹儀領導下與北方和解，鑑於原敬的對華政策，孫中山開始公然嚴厲指責日本政府的不當，認為日本應對中國的分裂負歷史上的責任。孫中山對日不滿，其來有自，但把日本視為最大敵國卻是由此開始，所以孫中山也在此時正式要求廢除與日本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孫中山重返廣州，建立第二次廣東軍政府，仍不改他反日的言論，公然宣稱，北伐的目的不僅是討伐北方軍閥，而是與扶持北方軍閥的日本一戰。

第七章「第三次廣東軍政府與日本」，以國民黨改組，孫中山大力推展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運動為背景，探討此一時期孫中山的對日政策，以及他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的涵意與日本方面所採的對策。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孫中山復返廣州，續行大元帥職權，之後他與日本的緊張關係漸趨緩和。原因是親英美的直系軍閥，控制了北方政府，日本為了牽制英美，對廣東軍政府的態度日趨友善之故。作者認為，此事可從日本政府對海關關餘截留及鎮壓商團事件的態度上得到實證。當時日本政府首先在海關關餘問題上，表現出異於歐美的態度。雖然日本政府基於列國共同協調的原則，派遣軍艦到廣州參加列強的軍事示威活動，但所有的政策僅限於消極性的配合，處處留下能與廣東軍政府斡旋的餘地。這種異於歐美的對華政策，在商團事件的處理上更可得到明顯的證實。當時英國為了牽制廣東軍政府的鎮壓商團活動，曾揚言不惜以軍事干涉。此政策也得到法、葡兩國的回應。但由於日本的反對，英法等國的出兵活動才不了了之。鑑於日本對廣東軍政府的友善，孫中山與日本的交流又愈趨緊密。尤其是直系倒臺，親日派的大將段祺瑞又重新復出，雙方的交流更加熱絡。日本希望藉由支援段祺瑞、張作霖、孫中山等人擬召開的國民會議，以謀日本勢力在華的更進一步拓展。孫中山則期待透過與日本的交流，爭取對廣東軍政府的支持，以便制衡歐美列強的對華政策。民國十四年，孫中山的日本之旅以及在神戶所發表的「大亞洲主義」演講，就是在這種雙方關係又趨複合的背景下展開。在此，作者分析了孫中山所倡導的大亞洲主義與日人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的差異。孫中山的大

亞洲主義是為了追求全亞洲所有民族的獨立與自由，日人的大亞洲主義卻只是日人利用種族意識做為與美國抗衡的工具。作者認為，當時在日本所盛行的大亞洲主義，是源於日俄戰後，美日兩國為了爭奪在中國東北的經濟利權，致關係日趨緊張，日本為謀抗衡，乃利用美國國內所實施的排日移民法做為訴求對象，指責這是種族歧視，號召所有亞洲民族羣起抗爭。由於兩者基本的出發點不同，訴求的目標也不一樣，合作的可能性自然微之又微。因此，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雖然也在日本民間有所回響，但並不能影響到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對孫中山的理想絲毫不感興趣。此刻，日本最關心的還是如何鞏固段祺瑞、張作霖等親日派的領導中心。日本政府是基於擁戴段、張的心理，才願對北上參加國民會議的孫中山提供協助。因此，對日本政府而言，雙方的合作關係也僅止於此。這也象徵着雙方長達三十年的交往模式。換言之，孫中山與日本的交流史，完全是孫中山單方向的訴求與日本精打細算的現實政治考慮交織而成。

從以上的簡單介紹中，我們可以一窺俞辛焞此書的主要內容。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理論，但寫的很平實，是一本很忠於史實的著作。此書的特色可歸納出以下兩點。第一點，作者不否認日本志士及民間團體對孫中山的友誼，及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但在論述他們與孫中山的關係，卻將他們與日本政府溶為一體，用「日本」這個國家概念來做整體性的探討。在過去的研究中，為了突出日本民間與政府的態度迥異，常將兩者分別探討。但這種探討卻忽視兩者的相關性。日本民間人士援助中國革命，動機不一，並非純粹是共鳴於中國革命的理想，往往只是因對「日本國家利益」的觀點與日本政府想法有所迥異而已。換言之，很多日本民間人士也是基於國家利益而支援中國革命，其與日本政府的差異只是起因於對時局的判斷不一。此外，日本民間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度與日本政府政策是成正比關係。日本民間在實質上對中國革命最有力之時，往往也是日本政府因特殊形勢而採取支援中國革命之時。這時常因政府不便出面，而由民間代為處理。相對的，日本民間人士與政府政策不一致時，民間人士的支援也就有限了。因此，將政府與民間一起納入一個主題探討，不僅可客觀的評估日本在整個中國革命運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避免以偏概全，過份美化日本民間人士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第二點，在資料的引用上，作者除利用前人所整理出的資料外，也掌握了至今尚未出刊的很多原始史料。例如孫中山的日人好友梅屋庄吉的日記，日本外交史料館珍藏的革命黨員監視錄，日本防衛廳珍藏的「清國革命亂時

報」、「清國事變書類」、「清國革命亂關係史書」等史料。梅屋庄吉的日記及外交史料館的史料有助於我們瞭解孫中山在日本的活動情形及經濟來源等問題；防衛廳的資料則使我們對辛亥革命時期日本軍部的政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尤其是歷年來鮮少有人論及的日本海軍對中國沿海所做的戰略佈署。除了以上未出版的原始史料外，著者也從其他日文書籍中發掘出一些與孫中山有關的重要資料：例如『原敬關係文書』、『宗方小太郎文書』、『小川平吉文書』、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社報』、『天羽英二日記』等等。由於作者在搜集資料上的努力，使此書僅從史料介紹的角度來判斷，就是值得推崇的好書。而全書在主題的掌握與探討上，所作的努力，尤可譽為研究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的最佳代表作之一。

當然，此書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點，欠缺理論架構。作者忠於史實的態度是值得推崇，但下筆之際，完全跟着史料走的作法卻使本文的論述有鬆散的現像。作者在各章節裏，對各時期孫中山對日政策的介紹可謂是不遺餘力，但卻鮮少論及孫中山的對日政策的基本態度。雖然作者在序章也曾提到，孫中山的日本觀是期待→失望→批判→期待這三個週期重覆組合而成。認為孫中山的日本觀，時常隨着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但其對日本所抱持期待的基本態度卻是始終一致，以這種期待支援的情結做為解釋孫中山的一貫對日態度的說法，是作者的獨特見解，評者也深以為然。但是作者在撰寫本文時，除第六章第二節外，並沒有發揮此一論點，對史料也不加以詮釋，因此變成我們在各章節裏所見到的孫中山的對日言論不是「媚日」，就是「排日」。換言之，作者在行文之時，只專注於論述孫中山一時的外交辭令，而忽視了解析孫中山的本意。為了避免讀者「見樹不見林」，困惑於孫中山一時的言論，作者須考慮在各章節，就孫中山對日的基本態度，做一些補充性說明。第二點，作者在用辭之時，有跳不出主觀意識框框的痕跡。例如，一五二頁論述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策時，作者指陳「日本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是遭遇任何問題都優先想用武力解決問題的軍國主義國家」。二八四頁評論日本第十八任總理寺內正毅時，作者指稱「寺內是日本典型的軍國主義者，是一切都想用武力去解決問題的軍人」。但綜觀全文，卻沒有對這些評論有一詮釋，因此我們也無法確知作者筆下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及典型軍國主義者這類字眼的真正涵義。像這類先入為主價值判斷的字眼，散見於全書之中。就力求客觀的學術著作而言，均屬美中不足，值得作者再加斟酌。

□中研院近史所・黃自進□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 博碩士論文目錄 (1988-1990)

一、博士論文

<u>畢業學校</u>	<u>畢業年月（民國）</u>	<u>作 者</u>	<u>論 文 題 目</u>	<u>指導教授</u>
文化大學	七十八年十二月	陳立文	宋子文與戰時外交	孫同勛

二、碩士論文

<u>畢業學校</u>	<u>畢業年月（民國）</u>	<u>作 者</u>	<u>論 文 題 目</u>	<u>指導教授</u>
臺灣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鍾淑敏	日據初朝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 (1895-1906)	張玉法 曹永和
臺灣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邱澎生	18、19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	徐泓
師範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潘自蓮	奉天早期移墾區社會菁英的形成與發展 (1634-1916)	李國祁
師範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李欣芬	基督教與臺灣醫療衛生的現代化——以彰化基督教醫院為中心的探討 (1896-1936)	張朋園
師範大學	七十八年七月	徐素貞	「食貨半月刊」研究(1934-1937)	陸寶千
師範大學	七十八年七月	王孝先	清代前期 (1698-1795) 永定河的例行性防洪活動	王家儉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陳曉慧	閭錫山與抗戰	蔣永敬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李貌華	東北鐵路問題與中日關係 (1905-1931)	林明德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陳昭順	五四時期的反儒思潮	張玉法 林能士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楊維真	唐繼堯與西南政局	林能士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金鶴俊	馬建忠維新主張之研究	閻沁恒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林蘭芳	資源委員會的特種鑛產統制 (1936-1949)	王樹槐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鄭麗榕	九一八時期上海的對日經濟絕交運動	黃福慶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李麗燕	甲午戰後李鴻章的聯俄外交政策	李國祁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柳麗敏	從佛到儒——梁漱溟之思想及其轉折	張玉法
政治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陳玉貞	清代臺灣吏治研究——以刑名、錢糧職責為例	李國祁 周虎林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蘇梅芳	李鴻章自強思想之研究	呂實強 吳振芝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蕭瓊瑞	五月東方兩畫會之研究	袁德星
政治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劉淑玲	臺灣總督府的土地放領政策——以日籍退職官員事件為例	梁華璜
東海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何孟興	清初巡臺御史制度之研究	
東海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陳清敏	清季自強運動時期「清議」之研究	
文化大學	七十八年六月	李仕德	北伐前後中英外交關係之研究	王綱領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一覽

(1989年10月～1990年3月)

七十八年

- 十月五日 朱浤源：「廣西的貨幣現代化」
 十月十四日 張淑雅：「政策走卒？1950～1951冬春間美國對臺政策轉變的考察」
 十月二十六日 趙中孚：「奉系的軍事現代化（1922～1929）」
 十一月九日 林明德：「日本對華北的經濟侵略（1933～1945）」
 十一月三十日 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罂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十二月二十三日 黃自進：「犬養毅與孫中山革命運動——援助動機的探討」
 十二月二十八日 陳儀深：「太虛法師的政治思想」

七十九年

- 一月十一日 唐德剛（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胡適和他的朋友」
 二月十日 姬田光義（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現狀和教科書訴訟判決」
 二月二十四日 李孝悌：「一九〇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的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化——導論」
 三月三日 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問題——戰時日軍暴行的研究之三」
 三月十五日 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傳播之圖說形式一點石齋畫報例」
 三月三十一日 Prof. Philip A. Kuhn (美國哈佛大學)：“The Case Against Reform: ‘Conservative’ Reactions to Feng Kuei-fen's *Chiao-pin-lu k'ang-i*”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88年7月～1990年3月)

李宇平輯 *

(1988) 7.27 中共中國史學界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各省、市、自治區歷史學會和有關史學機構共推選95名代表出席，會期四天(7.30)，除修訂章程、改選理事外，並討論如何加強與改進歷史科學研究工作等問題。

8.15 中共中國民族理論學會、新疆等省區社聯共同召開的「第四屆全國民族理論學術討論會」在烏魯木齊市舉行，會期六天(至8.20)，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分屬二十多個民族成分的一百五十名代表與會，發表論文一百二十篇。會議中心議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民族問題，分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族問題的實質、特點、民族關係、區域自治、民族經濟以及學科建設等問題展開討論。

10.6 中共中國民族史學會在雲南大學舉行第二次學術討論會，會期六天(至10.11)，分屬漢、滿、蒙、回、藏、納西、白、苗、朝鮮、畬、柯爾克孜等十一個民族的一百二十二位民族史學工作者及各單位代表出席會議，發表論文、資料七十餘篇，主要討論當代中國民族史學的任務、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對歷代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評價，以及如何加強對近現代和當代民族史的研究等問題。

10.6 由中共安徽省社科院歷史所、安徽省歷史學會、合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合肥市社聯、合肥市歷史學會等單位聯合舉辦的「李鴻章與近代中國經濟學術討論會」在合肥市召開，會期四天(至10.9)。計有六十多位專家學者與會，提出論文三十餘篇。會議主要從中國社會近代化、中國走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向世界、中國對外開放的角度重新評估李鴻章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

10.22 由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中國邊疆史地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會期五天（至 10.26），共有107名專家學者參加，宣讀論文六十四篇。會議主要議題有三：(1)中國邊疆史地學的研究對象、功能、現狀與展望；(2)中國歷代邊疆政策和邊疆發展；(3)中國近代邊界研究。

10月 中共「中國近代軍事史第二屆學術討論會」在上海空軍政治學院召開，百餘名專家學者與會，提交近七十篇論文。會議以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為討論主題，分從近代國防、近代軍隊建設與發展、近代軍閥、近代後勤、近代戰事作戰指導、近代戰術演變與發展等方面探討。

11.22 中共「中國少數民族經濟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在湖南省長沙市舉行，會期五天（至 11.26），來自十六個省、市、自治區，分屬蒙古、回、朝鮮、土家、壯、彝、苗、傣、侗、白、哈薩、漢等十二個民族的專家學者、實際政務工作者和有關方面代表近七十人與會，發表論文及調查報告九十餘篇。會議主要探討生產力發展與所有制的關係，以及如何發展商品經濟，發展「外向型經濟」與發展邊境貿易等問題。

12.29 由中共湖南省政協、省社聯、省社科院、省歷史學會、民革湖南省委等十三個單位聯合發起舉辦的首次「黃興研究學術討論會」在長沙舉行，會期五天（至 1989.1.2），共有中外學者一百多人與會，宣讀論文五十八篇。主要議題有：(1)對黃興的總體評價；(2)關於黃興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實踐活動；(3)關於黃興的思想品格；(4)黃興與其他革命人物的人際關係；(5)黃興研究的回顧與方法上的反省。

(1989) 4.24 由中共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技術史委員會、中國工程師雜誌社和華中理工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五屆全國技術史學術討論會」在湖北宜昌葛洲壩工程局黨校舉行，會期七天（至 4.30），與會專家學者三十八人，發表論文三十六篇。大會以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史為中心議題，討論焦點集中在中日近代技術發展的比較，洋務運動與當前的技術引進、洋務運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洋務運動對中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的影響、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的文化思想和社會背景等問題。

5.3 中共《民族研究》編輯部在北京召開「西藏問題專題學術討論會」，會期兩天（至 5.4），從事藏學和西藏問題研究教學的學者專家四十餘人與會，會議重點圍繞在藏學研究的現狀與前景，以及西藏的主權、人權與

文化人類的一些問題。

5.10 由臺灣私立淡江大學和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北京大學哲學系共同舉辦的「海峽兩岸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會期三天（至5.12），宣讀論文近四十篇，主要討論傳統與反傳統、五四與文學、五四與文化、五四與現代化等四個問題。

7.13 由中共北京大學和煙臺師院等五院校共同發起籌備的首屆「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研討會」在山東省煙臺市召開，會期五天（至7.17）。主要討論關於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的學科建設、功能、特色及研究方法等問題。

8.14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邀請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山根幸夫教授、東京大學教養部並木賴壽教授，東京大學文學部岸本美緒教授舉辦聯合學術研討會，研討主題為：「明清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8.31 由德國海德堡大學主辦之「十五至十八世紀亞洲海上貿易的包辦商、互市場和商品研討會」(Symposium on Entrepreneurs, Emporia and Commodities in Asian Maritime Trade, 15th to 18th Centuries) 在海德堡舉行，會期四天（至9.3），宣讀論文21篇。

8月 中共湘潭大學主辦的「中國近代史宏觀學術研討會」在湘西大庸市舉行，來自二十二個省市的專家學者一百三十多人與會。會議主要討論：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帝國主義入侵與中國近代化的關係。

10.6 中共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哲學及社會思想史學會第四次年會暨學術討論會在遼寧省丹東市召開，會期五天（至10.10），來自滿、蒙等十餘個民族的專家學者、理論工作者及有關方面代表計七十多人與會，提交論文近三十篇。會議主要討論如下問題：(1)關於研究北方少數民族哲學史的邏輯起點問題，(2)研究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與宗教的關係，(3)發展商品經濟與保持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問題，(4)研究少數民族的社會心理、民族意識與現實的結合問題。

10.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舉辦討論會，邀請中共南開大學教授李競能先生發表演講：「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概況」。

10.12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歷史組與經濟組合辦研討會，邀請美國 Kent State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王業鍵先生發表演講，講題是：「近三百年長江三角洲的糧價」。

10.14 美國亞洲學會新英格蘭區分會 (New England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89年年會假 Cambridge 市的哈佛大學舉行。會中宣讀論文與近代中國研究相關者，其議題、宣讀者及論文名稱分別如下：①Masato Nishimura, “Intellectual Circles of the Ming-Ching Transition,” ②Eliza beth de Sabato Swinton, “Tears for the Great Japanese Empire Prints of the Sino-and Russo-Japanese Wars,” ③Peter Harrington, “Japan at War, 1894-1905: Reflections on the Sino-and Russo-Japanese Wars,” ④Joanna Walely-Cohen,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in Qing Law,” ⑤Tahirih V. Lee, “The Role of Courts in Setting Private Disputes in Urba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Shanghai,” ⑥E-t'u Zen Sun, “Role of the Finance Ministry (Hubu) in the Qing Economic System,” ⑦Dorothy Borei, “Strategic-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Northwest During the Qing Period,” ⑧Jane K. Leonard, “Economic Imperatives and Imperial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Grain Transport System,” ⑨Vera Schwarcz, “Science and Democracy, 1919/1989: Some Personal Observations from China.”

10.17 由中共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辦的「第二屆抗日戰爭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宛平城舉行，各省研究抗日戰爭史的專家學者有三十餘人參加，另有蘇聯及日本學者五人與會，會期四天（至 10.20）。

10.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力先生，應邀出席在美國海軍官校歷史系舉辦之「第九屆海軍史國際研討會」，並於會中宣讀論文：「一九四〇年代美國與中國新海軍之創建」。

10.19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歷史組舉辦學術研討會，由該所副研究員湯錫勇先生演講「臺北石牌番漢分界碑之研究」。

10.28 由 Cheng Society of America, Chinese Culture Foundation 以及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等機構主辦的「家族史與系譜座談會」(Chinese American Family History and Genealogy Symposium/Workshop) 在美國舊金山中國文化中心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舉行。該座談會主旨旨在齊聚各家華裔美人的家譜以建立一家族親屬樹系，並提供重建或研究家族史料時之參考資料。

11.17 「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在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歷時二天（至 11.18）。該會由臺南市政府、成大歷史系合辦。會中共宣讀論文十八篇，演講者及講題分別如下：①莊吉發：清代閩粵地區

的人口流動與臺灣秘密會黨的發展；②丁煌：臺灣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③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中華會館之研究；④鄭梓：復臺前夕祖國派臺籍人士的最後言論與主張——以「臺灣民聲報」為中心之初步分析；⑤高志彬：清康熙朝臺灣府志創修考；⑥陳炎正：難得一見的臺灣縣採訪冊；⑦石萬壽：明鄭時期臺灣漢人的墾殖；⑧張守真：康熙領臺時期鳳山縣治設置問題探討；⑨湯熙勇：清代臺灣的循吏曾日瑛事蹟；⑩葉振輝：安平礮擊事件的地方交涉；⑪孫全文：安平聚落的發展；⑫賴志彰：建築創生實踐歷程中的形式表現——以崎腳、月眉池劉姓建築組羣為例；⑬徐明福：論臺灣傳統中國民宅之地方性史料——以新埔為例；⑭陳信雄：宋元澎湖人文活動的特色——中國海外貿易的轉運站；⑮詹素娟：岸裏社羣遷移活動研究之一：麻裏蘭社與鯉魚潭關係初探；⑯鄧相揚：平埔族古文書溯源；⑰溫振華：天花在臺灣土著部落初探；⑱藤井志津枝：日據時期對臺灣先住民族的「教化」與「同化」。

10月至11月 美國哈佛大學舉辦數場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相關之討論會，茲將講題及演講者及演講日期報告如下：①Qingcheng Wong, "The Attitude of Taiping towards Confucianism and Its Change," (10.13) ②John Schreckers, "Karl Marx's View of China: Another Look at a classic Question," (10.20) ③Benjamin Schwartz,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11.13) ④James L. Watson, "Feeding the Revolution: Public Mess Halls and Family Kitchens in Maoist China," (11.14) ⑤Akira Iriye, "Power in Chinese -Japanese Relations, 1800-1980," ⑥Akira Iriye, "Economics in Chinese -Japanese Relations, 1800-1980," (11.17) ⑦Chen Kui-de, "Chinese Culture & Law," (11.18) ⑧David Strand,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Politics in China in the 1920's." (11.20)

11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舉辦數場有關中國近代史之學術研討會，演講者、題目及日期分別如下：①Melissa Macauley, "Pondering the 'Pernicious' Pettifogger of Late Imperial China," (11.18) ②Thomas Buoye, "Violent Disputes Over Property Rights: The Case of Rent Defaults," (11.18) ③Tahiri V. Lee, "Courts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in Early 20th Century Shanghai," (11.18) ④Mark A. Allee, "Before the Bench: Hearing, Verdict, and Sentencing in a Local Cour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1.27) ⑤Barbara N. Sands, "Incidence of Famine in Chinese History: A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1958-1962 Agricultural Crisis." (11.21)

12.6 由香港大學主辦、查良鏞學術研究基金會贊助之「中國學術研究之傳承與創新研討會」假香港大學陸佑堂舉行，會期三天（至12.8），會中宣讀論文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相關之論題如下：①韋慶遠：雍乾交替與治道同異；②湯志鈞：維新與守舊；③劉鳳翰：清末袁世凱治兵之道；④葉顯恩：從對珠江三角洲的研究看社會史研究方法之演進；⑤王玉棠、余炎光：梁啟超的「新史學」——承傳與創新的範例。

12.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座談會，邀請美國 St. Louis 華盛頓大學教授石錦先生主講：「明清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

12.16 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與國學文獻館假中央圖書館舉行「第五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中共發表論文二十五篇，與中國近代史相關之論文分別如下：①段柏林：族譜的功能與五四的反省；②陳亦榮：從族譜看清代漢人在臺灣地區遷徙之特質；③黃典權：石井本宗族譜考索；④石萬壽：明鄭以前二層行溪流域中下游的漢移民與系譜；⑤戴玄之：灘州石佛口王姓——白蓮教世家——族譜之研究；⑥片泓基：從族譜學看韓中交流史。大會歷時四天（至 12.19）結束。

12.18 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假三民所會議室協同舉行「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發表論文共有六篇，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相關之論題，其報告人及篇目分別如下：①高志彬：淡水廳志纂修考——兼論「陳培桂篡改林豪底稿、修改楊浚草稿」；②湯錫勇：清乾隆十六年彰化內凹莊柳澍南之番殺兵民事件及其影響；③賴志彰：寫真相片作為一種意象與語言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攝影寫真發展——從霧峯林家寫真談起（1895—1945）；④李安如：從臺灣天主教音樂史料中探討臺灣閩南語聖歌與臺灣民俗音樂的相互關係。

12.27 由佛教法住學會主辦、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及臺灣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協辦之「第二屆法住學術會議——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假香港佛教法住學會舉行，會期五天（至12.31），宣讀論文三十二篇。

12.27 第 104 屆美國歷史年會假舊金山希爾頓飯店舉行，會期四天（至 12.30）。會中宣讀論文與中國研究有關者，其論文議題及宣讀者分別如

下：①Susan Mann, “The Cult Domesticity in Shanghai’s Middle Class,” ②Emily Honig, “The Making of an Urban Underclass: Subei People in Republican-Era Shanghai,” ③Gail Hershatter,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hanghai Prostitution, 1920–1958,” ④Chang Chi-fa, “The Spread of Sedition as Reflected in Ch’ing Statute Revisions,” ⑤Robert Artony, “Ch’ing Efforts to Eliminate Banditry in Kwangtung, 1780–1840,” ⑥Harry J. Lamley, “Crimes of Violence and Summary Executives: A Late Ch’ing Issue,” ⑦Marilyn Young, “Ancient Virtues : Women Under the Goumindang,” ⑧Roxann Praznik,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1895–1912,” ⑨Lung-Kee Sun, “Imag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Republican China,” ⑩Maurice Meiser, “The Communis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⑪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and Society in South China: The Origins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Jiangxi,” ⑫Joseph W. Esherick,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the Bottom Up: Shaan-Gan-Ning,” ⑬Odoric Y. Wou, “Mobilizing the Peasant Masses: The Case of Eyuwan,” ⑭Timothy Cheek, “The Honorable Vocation: Organization and Staffing of CCP Propaganda Organs in North China, 1937–1949,” ⑮Lucy E. Stalfer, “Contesting Exclusion: Chinese Litigation Before the Federal Courts, 1891–1924,” ⑯Qingzhao Hua, “Truman’s China Policy as Viewed through Chinese Eyes,” ⑰Marc Gallicchio, “the New China Hands: American Military Officer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volution.”

12.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熊秉真女士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問研究一個月。

12.18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柯志明先生在該所第二會議室發表學術演講，講題是：「日據臺灣農村的商品化與小農經濟的形成」。

(1990) 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永發先生應邀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與萊頓兩地出席「中共革命的新透視國際學術會議」，並宣讀論文「紅太陽下的罂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會後前往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作短期研究。

1.4 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假該院近代史研究所會議廳舉辦「過

去十年中美關係之檢討與展望研討會」，國內外學者專家一百餘人與會，宣讀論文十六篇，會議歷時三天（至 1.6）結束。

1.8 由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現代中國資料研究中心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及荷蘭國際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聯合主辦的「中共革命的新透視」研討會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在萊頓及阿姆斯特丹舉行，共邀請歐、美、臺灣及大陸學者四十餘人參加，發表論文二十篇，大會歷時五天（至 1.2）結束。

1.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朱濬源先生前往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訪問研究，為期一個月。

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邀請法國遠東研究院教授陳祚龍先生發表演講，講題是：「中法文化關係」。

2.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三井先生，應邀前往美國出席夏威夷東西中心召開之「民族主義與東亞歷史寫作計畫工作會議」。

2.24 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邀請中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席澤宗先生，在該院數學研究所演講廳發表學術演講，講題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12月（1989年）至2月（1990年） 法國當代中國研究與文獻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曾舉行數場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學術討論會，其主講人、講題及日期分別如下：
 ①Tony Saich, "New Sources and Research on Pre-1949 Party History," (12. 5)
 ②Li Bozhong, "Le Problème des Engrais Dans la Production Agricole au Jiangnan Sous les Ming et les Oing," (12. 11)
 ③Li Bozhong, "Economic de la Petite Exploitation Rurale en Chine du Nord à L'époque Impériale," (12. 14)
 ④Chen Chiu-Kun,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2. 14)
 ⑤Wong Xi,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Its Reasons for Its Failure," (1. 25)
 ⑥Wang Xi, "The Comprador: "Unacknowledges China's Bourgeoisie." (2. 1)

3.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存武先生，在該所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計畫下，前往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三個月。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

• 李宇平輯 •

一九八八年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史研所編 清代邊疆史地論著索引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王三欣 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 北京 國際大學出版社

王年一 大動亂的年代（1949-1989 年的中國）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六四八頁

北京軍區後勤部政治部主編 抗日洪波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市檔案館編 北平和平解放前後 北京 檔案出版社

徐輝琪編 李烈鈞文集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十月 八七八頁

陳谷嘉 岳麓書院名人傳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八月 二五三頁

陳有清 張謇 南昌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七月 九八頁

張憲文、陳興唐、鄭金欣編 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北京
檔案出版社

莊福齡主編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程道德等編 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1911-1919）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覃高積編著 太平天國時期壯族農民起義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八月
一五五頁

黃嘉謨主編 韋國恩、張珍琳編輯 中美關係史料 光緒朝 四冊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顧大全等編譯 貴州現代革命史講座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入江曜子 我が名はエリザベス——滿州皇帝の妻の生涯 東京 筑摩書房
九月 四〇〇頁

- 大澤昇 中國はどこへ 東京 三一書房 五月 二九四頁
- 天兒慧 中國改革最前線 東京 岩波書店 九月 二二四頁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編 中國の經濟改革 東京 東洋經濟新報社 十月 二七六頁
- 矢吹晉 ポスト鄧小平 東京 蒼蒼社 三月 二四八頁
- 矢吹晉編譯 中國のペレストロイカ——民主改造の旗手たち 東京 蒼蒼社 八月 二五一頁
- 朴永錫 在滿韓人獨立運動史研究 漢城 一潮閣 一月 三五一頁
- 佐佐木倍彰 多民族國家中國の基礎構造——もウひとつの南北問題 東京 世界思想社 五月 二四八頁
- 武田雅哉 翔べ！大清帝國 東京 リブロポート 十一月 一〇三頁
- 間宮林藏 東韓地方紀行 東京 平凡社 五月 三〇〇頁
- 閔斗基編 中國國民革命 指導者と思想行動 漢城 ソウル知識產業社 一月 三二二頁
- Baird Callicot, J. and Ames, Roger T. *Nature in Asian Thought: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335pp.
- Barton Woodside, Alexander.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64pp.
- Bastid, Marianne.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331pp.
- Bawden, C. R.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476pp.
- Bramall, Chris. *Living Standards in Sichuan, 1931-1938*. Londo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 Chaliand, Gerard ed. *Minority People in the Age of Nation-States*. London: Pluto Press, 160pp.
- Chang, David Wen-Wei. *China under Deng Xiaop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304pp.

- Chen, C. C. and Bunge, Frederica M. *Medicine in Rural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47pp.
- Cheng, Peter. P. ed. *Marxism and Capit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70pp.
- Cotton, James and Neary, Ian eds.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88pp.
- Ellman, Michael. *Socialist Plan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2pp.
- Gaw, Kenneth. *Superior Servants: The Legendary Cantonese Amahs of the Far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7pp.
- Goodman, David S. G. ed.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4pp.
- Jaschok, Maria. *Concubines and Bondservan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hinese Custom*. London: Zed Books, 156pp.
- Kazuko, On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55pp.
- Lai, David Chuyen. *Chinatowns: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 Lond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347pp.
-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86pp.
- Lieberthal, Kenneth G. and Dickson, Bruce J., *A Research Guide to Central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China, 1949-1986*. New York: M. E. Sharpe, 339pp.
- Lo, Chi-Kin. *China's Policy Towards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Cas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London: Routledge, 212pp.
- Beng Tan Chee.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shers, 297pp.
- Bruun, Ole.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Family as an Economic Unit: A Sample Survey of Individual Households in Workshop Production and Crafts,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China*. Copen-

- 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Center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37pp.
- Chang, Jaw-ling Joanne. *Settlement of the Macao Issu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Beijing Negotiating Behavior*.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37pp.
- Carter, Colin A. and Ehong, Fu-ning.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and Trade: An Economic Analysi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24pp.
- Coates, P. D.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31pp.
- Copper, John F. *A Quiet Revolu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 C.: Ethic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76pp.
- Cushman, Jennifer and Wang Gungwu.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44pp.
- Day, Alan J. 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84*. Harlow: Longman Group, 203pp.
- Demao, Kong and Lan, Ke. *The House of Confuciu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Gianini, Giangiacomo. *Le Comuni Cinesi: una Via al Comunismo*. Vico Morcote: Giangiacomo Gianini.
- Goldenberg, Susan. *Hands Across the Ocean: Managing Joint Ventures with a Spotlight on China and Japa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42pp.
- Newby, Laura.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ina's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96pp.
- Nolan, Pet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Farm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59pp.
- Hamilton, John Maxwell. *Edgar Snow: A B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343pp.
- Harding, Harry.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82pp.
- Hayhoe, Ruth.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the Open Door*. London: M. E. Sharpe, 249pp.
- Hayhoe, Ruth and Bastid, Marianne. eds.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369pp.
- Tsang, Steve Yui-Sang. *Democracy Shelved: Great-Britain, China,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6-195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4pp.
- Tuan, Chi-hsien. *Wuxi City and Wuxi County: An Analysis of a Pilot Census*.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290pp.
- Yue, Daiyun.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Berkeley: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43pp.
- Wickeri, Philip L.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 Movement, and China's United Front*. Maryknoll, N. Y.: Orbis Books, 356pp.
- Wong, Siu-I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4pp.

一九八九年出版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會編 共產國際大事記（1914-1943）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五月 五六〇頁
- 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局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9）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九月 六二六頁
- 中共重慶市黨部 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抗戰文藝活動 重慶 重慶出版社二月 六四一頁
-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主編 五四運動在四川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五月 七四二頁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黃岡縣委員會編 回憶熊十力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二月 二七七頁
- 中國人民解放軍84810部隊政治部編 解放杭州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三月 二三一頁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錫伯族檔案史料 潘陽 遼寧民族出版社

-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計畫司編 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1948-1986）北京 農業出版社
- 孔令聞編著 還在爭訟的若干抗戰史問題研究 北京 航空大學出版社 十二月 二四二頁
- 王明權主編 武漢企業家傳略 武漢 武漢出版社 四月 四一一頁
- 王晶垚等編 柳亞子選集（全二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一月 一二三八頁
- 王增炳，駱懷東編著 教育事業家陳嘉庚 北京 教育科學出版社 四月 四二三頁
- 王野平主編 東北淪陷四十年教育史 長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五月 三一五頁
- 田子瑜等主編 中國近代史軍閥辭典 北京 檔案出版社
- 石柏林 從長沙大火到衡陽失陷：國民黨抗戰內幕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五月 三四八頁
- 甘海瀾編撰 老舍年譜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七月 五二八頁
- 江燦騰 人間淨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 臺北 稲鄉出版社 十一月 二八〇頁
- 光明日報新聞研究所編 中國知識份子四十年掠影（1949-1989）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 光明日報四十年編輯組 光明日報四十年（1949-1989）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五月 三八〇頁
- 任光亮、朱仲岳整理 左宗棠未刊書牘（湘軍史料叢刊）長沙 岳麓書院 二月
- 李文榮、邵雲瑞編著 華北事變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五月 二二四頁
- 李國雄口述 伴駕生涯——隨侍溥儀33年紀實 北京 工人出版社 七月 三八四頁
- 何理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北京 檔案出版社 九月 四八六頁
- 肖瑜著 陳重等編譯 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原名：毛澤東和我曾是「乞丐」）北京 昆倫出版社 六月 二二四頁
- 宋晞 中國現代史論叢 臺北 正中書局 五月 一九三頁
- 吳豐培、曾國慶編著 清朝駐藏大臣制度的建立與沿革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 周婉窈 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 臺北 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 十月
- 周國全 王明評傳 蕪湖 安徽人民出版社 五月 五八一頁
- 周韋峨、陳紅民 胡漢民評傳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十月 三一八頁
- 茅家琦主編 太平天國史研究（第2集）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一月一六九頁
- 茅家琦 晚清史論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六月 四七五頁
- 許道化、吳克文主編 被錯殺的將軍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三月 二六五頁
- 陳乃文、陳燮章編 藏族編年史料（一） 北京 民族出版社 十一月 二六二頁
- 馮玉祥 馮玉祥自傳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一月 一七七頁
-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 鄭成功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八月 四〇四頁
- 浙江省總工會編 浙江工人運動史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施宣岑 王可風檔案史料工作文集 北京 檔案出版社 五月 三〇九頁
- 倪忠文主編 北洋軍閥統治湖北史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五月 二六八頁
- 韋敏士、田曉光編 劉鄧大軍進軍西南 重慶 重慶出版社 二月 三〇四頁
- 馬建儒 謝覺哉評傳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五月 四〇七頁
- 馬輶等著 國防部長浮沉記 北京 昆倫出版社 八月 三三三頁
- 徐慈壽編著 中國近代工業史 重慶 重慶出版社 七月 九七二頁
- 黑龍江省總工會工運史誌研究室編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五月 五六〇頁
- 郭明、廖自力、張新鷹著 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 成都 巴蜀書社 十月 三九二頁
- 郭漢民 中國近代史實正誤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九月 五三九頁
- 郭濤 四川城市水災史 成都 巴蜀書社 四月 三七八頁
- 許有成編著 于右任傳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五月 二三六頁
- 莊永明 臺灣名人小札(一)(二) 臺北 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
- 湯一介編 論傳統與反傳統——五四70周年紀念文選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五月 四二八頁

彭澤周 近代中國之革命與日本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十月 三六八頁
楊大辛主編 北洋政府總統與總理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四月 五〇〇
頁

雷夢辰 清代各省禁書彙考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五月 二七四頁
葛劍雄 億兆新民——中國人口史再認識 香港 中華書局 十二月 二四
九頁

楊國宇編 劉鄧大軍風雲錄（上、下）北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

楊樹標 蔣介石傳 北京 團結出版社 六月 五〇五頁

鄭宜、賈梅編 一九四六～七六毛澤東生活實錄 南京 江蘇文藝出版社
六月 二八一頁

盧燕貞 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1865-1945）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二月二
四六頁

劉問文俊編 立ちめがる中國知識人 東京 凱風社 五月 九五頁

小宮隆太郎 現代中國經濟——日中の經濟、企業の比較考察 東京 東京
大學出版會 二月 三五二頁

田辰夫編 近代中國人物研究 東京 慶應通信 二月 四五九頁

山腰敏寬編 清末民初文書讀解辭典 東京 古今書院 一月 一三九頁

中央新光監查法人監譯 中國の會計と監査——その實務、制度、教育およ
び發展の研究 東京 中央經濟社 二月 三〇二頁

中野美代子、武田雅哉 世紀末中國のかわら版——繪入新聞〔點石齋畫
報〕の世界 東京 福武書店 二月 二〇八頁

岡部達味 中國近代化の政治經濟學 東京 PHP研究所 三月 二四九
頁

若林正丈 轉形期の臺灣 東京 田畠書店 四月 二七三頁

若林敬子 中國の人口問題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四月 二七四頁

越沢明 哈爾濱の都市計畫（1895-1945） 東京 總和社 四月 三八五頁

Hendrischke, Hans J. *Populäre Lesestoffe: Propaganda und Agitation
im Buchwese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ochum: Chinathemen,
353pp.

Henriot, Christian ed. *La Femme en Asie Orientale.* Lyons: Centre
des Publications Université Jean Moulin, 50pp.

- Kates, George N.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 1933-1940.* Hong Kong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68pp.
- Kim, Samuel S. *The Third World in Chinese World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67pp.
- King, Frank H. H.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Vol. 2: 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Imperialism and War 1895-19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20pp.
- Kreissler, Francoise,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357pp.
- Kwong Shum Kui.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oad to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12pp.
- 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pp.
- Litten, Freddy. *Otto Brauns frühes Wirken in China 1932-1933 (Otto Brauns Early Activity in China 1932-1936).* Munich: Osteuropa-Institut, 133pp.
- Littrup, Leif ed. *Analecta Hafniensa: 25 Yea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Copenhagen.* London: Cnrrzon Press, 194pp.
- Lo, Fulang. *Morning Breeze: A True Stor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 243pp.
- Marinelli, Maurizio. *Intellettuali e Dissenso nella Cina del Dopo-Mao: Una Ricerca Bibliografica in Quattro Biblioteche di Bologna.* Bologna: Centro Amilcal Cabral, 182pp.
- Mena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58pp.
- Middelhoek, Ja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1980-1988).* Nijmegen: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78pp.
- Morrison, Charles E. and Dernberger, Robert F. *Asia-Pacific Report*

- 1989: *China in the Reform Era*.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125pp.
- Mungello, D. 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408pp.
- Neterowicz, Eva M. *The Tragedy of Tibet*. Washington: The Counci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96pp.
- Ross, Robert. *The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61pp.
- Saich, Tony. *China's Science Policy in the 80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50pp.
- Schell, Orville. *Discos and Democracy: China in the Throes of Reform*. London: Random House, 384pp.
- Senger, Harro Von. *Strategeme. Lebens- und Überlebenslisten der Chinesen - die berühmten 36 Strategeme aus drei Jahrtausenden*. Bern, München, Wien: Scherz Verlag, 447pp.
- Simon, Denis Fred and Goldman, Merle. e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76pp.
- Snow, Philip.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49pp.
- Sit Victor F. S. ed. *Chinese Cities: The Growth of the Metropolis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9pp.
- Uhalley, Stephen.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340pp.

近史所出版邊疆史研究專刊四種

(1) 李毓澍著：外蒙古撤治問題	精130元 平 80元
(5) 李毓澍著：外蒙政教制度考	精160元 平 90元
(2) 王樹槐著：咸同雲南回民事變	精160元 平 110元
(3) 黃嘉謨著：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	精120元 平 100元

函購七折，郵摺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圖上：「徐永昌日記」手稿（中研院近史所最新出版）
圖左：「袁世凱家書」手稿（中研院近史所最新出版）

二十二年
二月一日

節 喜極

端恭令似抑節似厚不是的一些行為後來竟不為今日思之為何我不知如何才能換用當時吟長這去而於端陽半并送我在中和嘉慶會詒閣去日多終患（認為得馬先生此垣而更開心矣其教訓先報喜悅也）
欲宣開喜之行並付處事已後度德

(3.17) 6-7(3)
季日 130×100 200
27.3.17 不及一月

端恭以口修毅武來晚同在省府請并給生後乳
序孝子

12=10 這是期二例 11 會先解
決乙另局乞向急（向毛局
員打架了）12 即之大飯
庄酒竹

昨日（初八）早暮為未疾
久懶醉哉問題是
昨晚向西施族久之兩
方誤次

誠為睡能否中旬曾寄一函至網河行可
得還贈紅茶蜜餞并請安好即行
又謂掉色甚窘絃酒三百金似是又由老六
而者却取累數百以待不虛可寄向三種
蜜酒結形果甚窮叩空零漢似有佳蜜電
鳴而用接許多和豐續充百全的至為前
者六者重謂措石屋由斯裏明網大不知
起後經何者六離掉時叩空零空知任香烟
肺躁令人不能放心又空招此者送紅財而
未知經期空在何時好經期東零者空委
用經期指空叩空錢也送此阿萬靜
臺上以不拍將空零空慕烟空乾作外海空
者而空之句、趕早郵折此詢
如往
審收 貨物 空音 大利酒
萬事如意東零是整款魚鹽久洞空佈而陸空
萬事如意東零是整款魚鹽久洞空佈而陸空

本期要目

- 「中共革命的新透視」研討會
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質
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現況和教科書
訴訟判決問題
戴玄之、Hommage a Wolfgang Bauer
關於戰前十年舉借外債的基本估計
Papers on China
近年來美國的中華民國史研究
山東文史資料的內容分析
「王世杰日記」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
與整編概況(六)
「謝彬先生遺著」簡介
政大社資中心有關中國近現代史資料介紹(二)
章太炎先生研究論著索引初編(二)
四川保路運動中極其重要的史料——西顧報
新書三本評介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
博碩士論文目錄 (1988—1990)

191.51081

\$100